

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

宗 華 譯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宗華譯

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

上海北新書局發行

譯者序言

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佔整個國民經濟中統治地位的，便是農村經濟。甚至自從列強侵入中國後，八十年來演進的歷史，雖然開闢了中國城市大工業發展的道路，可是這種畸形的病態的發展不能夠使城市大工業握有整個國民經濟的支配權；而農村經濟依舊成爲全國經濟上統治的部門。中國農村經濟經過了這八十年演進的歷史，不但沒有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反而走向低落的傾向，以致形成全國農業普遍恐慌的現象。農村中灌溉的設備祇有破壞而沒有建設。地力祇是日趨枯耗而沒有改進。耕畜日漸降低其意義。人力勞働在農業生產中所佔的比重却不斷的增強。在北方的黃土區域，因了氣候條件的劇變和灌溉的破壞，以致釀成空前的飢荒。在邊防的移殖區域，農業生產同樣的處在停留的狀態。總言之，中國的農村經濟已走上

了普遍恐慌的階級。這種恐慌就引起中國經濟一般的衰落，而成爲中國社會各階級面前最嚴重的問題。帝國主義侵入了中國的農村，吸盡中國土地上所有的精華，保存中國現有的土地關係；再加上本國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和軍閥制度的慘酷的剝削，使中國農業在生產的前提不斷的破壞，勞働的方法逐漸的退化；所以恐慌和衰落的過程一天一天加深，而最急切的需要一個澈底的解決。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解決纔能開關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往前發展的前途。不然，中國的農村將永遠變成爲帝國主義國家的農作場；中國的農民將永遠呻吟於現有土地制度下，而陷于無權無力，困頓慘暗，破產流離的狀態。

馬嘉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多年。本書分析中國農業的特性，描寫中國農業衰落的情形，目光銳敏，理論透澈，確是歐洲罕有的巨著。不過中國方面的材料，因爲文字的阻隔，國籍的不同，沒有能夠充分的利用。然而即是照這樣的著作在國內還不容易找得。

現今國內專門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組織，除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社會組外，不聞有其它的機關。希望國人對於這個當前最嚴重的問題羣起努力，在最近期內，能夠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和切實的解決。

譯者。

一九三〇，四，二〇，上海。

作者序言

首先須向讀者道歉的，便是本書祇能看做對中國農村中的土地問題的研究，而絕談不到對問題的解決，這或許使讀者引起很大的失望。本文的研究的方法，是從中國整個經濟的性質的估計入手，然後進而敘述中國的土地關係，階級分割，國內市場，以及帝國主義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或許會引起人家的批評。可是在缺乏必要的統計材料的中國，採用其他的研究方法，那一定更會感到困難。本書敘述的方式，繁複的引證，考據和解釋，或使讀者感到厭煩，然而在缺乏可靠的統計和正確的記載的中國，我們認為採用考據方法最是適當，就是那些無庸置疑的事實，也須詳細考查其淵源。或有人認為祇須記載事實而不必下估量，說明和結論，然而我們覺得提出了問題後，應當給以說明，才是正確。甚至錯誤的提法，謬誤的解答，也是比默而不述好得多。

本書中確有很多的缺憾。這是由於本書的材料的收集，完全在中國嚴重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下進行的緣故。然而就在這槍林彈雨底下，我們還能夠搜得不少有價值的材料，發見很多極重要的問題，華林，姚爾克，達爾罕諾夫，西非林諸同志，實與以很大的助力，作者甚為感激。此外，中國許多參加農民運動的同志，他們親身的閱歷和記述，也給作者以不少的幫助。本書內一切材料的編製，所下的估計和結語，則完全由作者個人負責。

目次

譯者序言	一
作者序言	一
緒論	三
第一章	
中國農村經濟的統計	三七
第二章	
水的意義	九五
第三章	
爲土質膏沃而作鬥	一三五
第四章	

黃土區域……………一五九

第五章

牲畜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一八一

第六章

手工勞動……………二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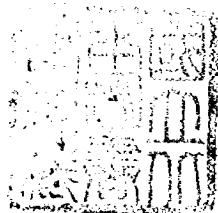
第七章

移殖的區域……………二三七

緒論

亞細亞式生產方法和帝國主義

我們對於本書中的缺憾，已經在上面很明白地指摘出來了，我們自己知道有許多問題，祇是提出來而沒有與以解答。這種缺點，一部分由於主觀上的原因，另一部分是客觀的。全中國缺乏比較可靠的統計，祇是其原因之一種。中國的土地私有財產，土地佔有形式，和租佃關係的形式等等問題，從來便是缺乏研究的，加之各省土地佔有形式和租佃形式的不斷的變化，更使我們感到研究上的困難。並且有許多省份，我們完全找不到已經證實過的材料。尤其關於這方面的一切歐美文字的材料亦不能給我們應用，因為這些材料不但不能幫助問題上的說明，反而使問題弄愈



糊塗。主要的就是因為他們的研究方法的錯誤，這種方法，祇能適用於歐美的條件，而完全藐視了中國經濟上的特性。

我們已儘量地搜集了中外專家調查的材料，應用了許多親身參加中國農民運動和親眼看到中國晚近事變的俄國學者的體集的經驗。中國的革命浪潮並沒有波及全國的農村，所以各省內的土地問題，也並沒有那樣明顯地提示出來。我們研究和調查的範圍，也祇能限於單個的省份。至于雲南四川諸省，我們也不能與以解答，自然更不用講新疆等省了。

第二種的困難，是帶着理論和歷史性的。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評上說：『人體解剖學，便是研究猿猴類解剖學的鑰匙。研究每一個社會，同時就使我們能夠了解過去一切社會的結構形式和生產關係。新的社會，就是由舊的社會中的斷片和原素造成的。一部分保留舊社會遺留下來而不及消滅的殘餘。一部分引伸舊社會中尚不過是萌芽的使其充分的發展』。然而猿猴類解剖學，也就是人體解剖學的鑰匙。

現在的中國，是由舊的中國發展出來的，它並不是機體演進那樣，而是經過了巨大的革命的波動和劇變而發展出來的。研究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我們就不容不去探求現在充滿在我們面前的各種斷片和殘餘。研究中國的土地關係，尤其不能離開中國整個的經濟。中國的農村，早已脫離了自足的經濟生活，它與城市，商業，手工業，家庭工業，工廠，以及世界商品流轉的潮流相接連了。所以要了解中國的土地問題，必須要看清中國社會上各階級，以及各階級間的相互關係，相互影響和相互的爭鬥。這樣，我們又需要去研究中國國家性質的過去和如何的蛻化。中國既已捲入了世界商品流通的範圍，那麼我們就要去研究帝國主義以及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同時我們更要去研究資本如何來驚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生產關係，如何來破壞舊有的關係，造成新的關係，如何在帝國主義時代去完成殖民地解放的革命。

這裏我們自然不能將這些複雜的問題一一地解答，我們先來敘述幾個重要的問

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遇到的是那一種社會，那一種生產方法？帝國主義如何來影響中國的社會？

馬克斯會將所有的生產方法劃分為四種：

『當資產階級社會開始自己批評時，資產階級經濟才會懂得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社會。』

『一般講來，社會經濟形成上可劃分為四個進化的時期：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古代的生產方法，封建的生產方法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

按馬克斯講來，中國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前，是不是存在着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不是統治着東方社會特有的生產關係？還是馬克斯所指的舊亞細亞的在巴比倫，亞細亞，波斯等國所存在的社會制度？在我們看來很明顯的，據馬克斯的意見，在印度所存在的，就是這個制度，英國在印度所破壞的，也就是這種生產方

法。毫無疑義的，據馬克斯的意見，列強的殖民地政策，在中國所破壞的，也就是這種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經濟基礎。馬克斯主義的大思想家如列寧，樸列罕諾夫輩，不但不否認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存在，而且把馬克斯的這個理論，更加以擴充和發揮。很明顯地，在馬克斯和昂格斯的腦海中，確有東方社會和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印像的存在。

要解釋這一個問題，必須把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生產方法的異同點加以詳細的分析。

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評上說：『經營固定的農業生活的民族——他們這種固定生活，已可稱為很大的進步了。農業便是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的主要的事業。當時的工業和工業的組織，以及適應此種工業的財產形式，多少都帶有農業的性質，這樣的社會，或者完全依靠農業，如古代的羅馬，或者按照當時社會中所存立着的關係而組織城市，如中世紀時。中世紀的資本，還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的形

式，它祇是一種手工業的統傳的工具的形式，還具有農業的性質。』

他更在資本論上說：『這些城市中的資本，還是一種自然所形成的并帶有等級性的特殊的資本……這種資本不像現代的貨幣資本，可以隨便變成爲什麼東西，它直接與其佔有者的某種勞働不可分割的相互連結的，所以稱之爲帶級等性的資本』。

這些話對於亞細亞社會中資本的特點講來，也是完全可以適用的。在亞細亞社會中，『固定在每個生產部門的生產工具，不容易把它從這一部門搬移別一部門，因之各個不同的生產範圍，彼此間甚至好比不同的國界和不同的公社那樣的分隔』（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一五六頁）。

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共同點，第一就在於：『在亞細亞的，古代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產方法底下，生產品的變成爲商品，生產者的變成爲商品生產者，祇是盡其副助的作用，可是隨着了農村公社會的破壞，而其作用也愈爲增強。』

（註：見資本論第一卷第四八頁）

這樣看來，在亞細亞生產方法底下，並不是完全沒有商業。中世紀時代，印度商業的興隆，實遠過於歐洲許多國家。當時中國的商業，更較印度為興盛。所以農村公社的崩壞，中國亦早過于印度一世紀。中國商業的高度的發展，確加速了中國農村公社的崩潰。在舊亞細亞的專制國家中，如印度中國，在它們的歷史上，已知有貨幣，甚至銀行和手工業。然而在整個的國民經濟中，貨幣也祇盡其副助的作用。貨幣本來不是資本主義所創造的。資本主義祇是使貨幣發展而已。資本主義也並不從使用價值中去創造交換價值，它祇是使商品生產更發展成爲可能而普遍的部門而已。剩餘勞働同樣也並不是資本主義所「發明」的。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產方法，已早知有分工，交換，商業，手工業和剩餘勞働了。

這樣看來，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同樣有商品，但是並非一切生產品都帶有商品性質；同樣有貨幣，但是貨幣關係祇盡了副助的作用；同樣有僱傭勞働，但

是僱傭勞働祇是例外的和補充的勞働，并並還在過渡的階段中。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同樣有市場關係，但是在市場中所出售的，祇是剩餘生產品，用來供給經營自給經濟的直接生產者的需要。大部分的生產品，都是供給直接生產者自己的要求。貨幣和商品，本身還不成爲資本，生產工具和消費品同樣還不是資本。可是終久要轉變爲資本的。轉變的前提，一方面要有貨幣和生活資料的佔有者存在，另一方面要有『自由』的勞働力。古代的羅馬帝國的末期，曾存在過這二個前提，可是却沒有發展成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其原因就在於這兩個前提，因了歷史的以及其她種種的條件而不能互相銜接的緣故。在中國的歷史上，也屢次可以看到一方面有貨幣和生活資料的積聚，另一方面有生產者（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脫離生產工具。然而這般從生產工具中解放出來的人們，却完全離開了生產過程，都降而爲流氓。在東方社會中，不斷地會發生大批農民的脫離生產工具，形成了廣大的未變成爲無產階級的流氓隊伍，以作爲東方社會帶時期性的恐慌的先聲。

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社會，不但有國內貿易，而且還有國外貿易。羅馬曾進行過廣大的對外貿易，印度會與當時一切無名的國家發生貿易，中國在歷史上，屢佔古代商業國家間的第一位。然而當時社會內部的分工，和各國間的分工，還帶有自然形成的性質，還沒有像現代那樣發展的世界市場。

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第二個共同點，就是：在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產方法中，資本大部分都是高利貸和商業資本。就是這種資本的形式，構成了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特點。

馬克斯在資本論上寫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以前的時期，高利貸資本具有兩種特殊的形式……第一種，用金錢借給浪用的貴族，特別是佔有土地者；第二種，用金錢借給自己勞動的小生產者，如手工業者，特別是農民。』

高利貸資本，有時還能以債主的資格而對國家施以剝削，有時成爲國家稅收的代辦人。在古代羅馬希臘的歷史中，在中國印度以及歐洲中世紀的史冊上，不知載

着多少酸痛的事蹟，描寫高利貸資本的殘酷的剝削。

商業資本便是一切的生產方法所共有的現象。商業資本對於生產方法的關係是由於外部的。它便是一切生產方法——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下商品交換的媒介。商業資本的財產便是貨幣的財產，它的貨幣才真正起了貨幣的作用。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佔統治地位的地方，便會排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

商業和手工業的組織形式，也成爲各種不同的生產方法的共有的現象。印度，日本，英國，阿喇伯和中國，都有行會的存在。雖然東方的行會不限制會員的人數，而歐洲在它發展的後半期則有限制，然而這是不重要的區別。

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第三個共同點，就在於：農業與工業的合併。鄉村的紡車和手織的布機與農業聯結起來，以滿足農村的需要。甚至當着紡織業分裂出來而成爲單獨的手工業的時候，也不足以動搖這種資本主義以前的經濟基礎。

祇有蒸汽機的出現，才能够完成這個任務。交通道路的缺乏，使各個鄉村互相隔離，且亦有老死不相往來者。市場普通都帶着區域的性質，而相互間的連繫亦是異常薄弱。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海洋和內河的交通，雖然減輕了各個區域和各個國家間的分隔，可是終久不能完全消滅這種分隔。一切歷史上所開闢的商業要道，也不足以補救其萬一。祇有海洋和內河的汽船，鐵道的建設，才能開闢東方社會中工業發展的先聲。正好像在西歐一樣，鐵路和汽船給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和現代新工業的創造上極有力的推動。

甚至公社形式的存在（氏族公社，農村公社，或是宗教公社），也不足以解決生產方法的性質問題。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制度中，都可以有而且確實有各種形式的公社的存在，現在大家都知道，氏族公社便是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起點。

如果我們把歷史發展的過程看一看，把一切現象總結起來化為簡單的公式看一

看，那就可以知道，古代社會都是從氏族社會的崩壞中發展出來的。古代社會的特徵，便是奴隸。普列漢諾夫曾說過：『奴隸便是這樣一種生產關係，自從它出現後，社會便分裂為各個階級，而在過去，社會上祇知有年齡與性別的劃分。當着奴隸制度充分發展的時候，它就影響到社會的整個經濟，由經濟而影響到其他一切的社會關係，自然首先就是政治制度。古代的國家，按政治制度上講來，彼此間絲毫沒有區別，每個古代的國家的政治制度上的主要的特徵，便是代表和擁護自由人的利益』。

中國的歷史以及整個亞細亞的歷史，都知有奴隸制度，甚至現在還有奴隸制的各種形式的存在。然而在那些發展的東方社會中，奴隸制已成爲副屬的門類了。

東方社會發展的起源，同樣的就是氏族公社，宗教公社和農村公社，然而必須加上這一點：『東方國家農業上的首要條件，便是人工灌溉。自動地去調節水量供給，就是公社，或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的事業』註：見昂格斯一八五三年七

月六日致馬克斯書）。普列漢諾夫對東方社會的特點的觀察，也就于這一點上。普列漢諾夫很正確地指出，新的歷史的探求，把馬克斯所認為東方的，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現在資本階級的生產方法，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進化的時期的這種論據加以修正。氏族社會組織的發現，對於社會學上所給的影響，正好比細胞發明對於生物學上的貢獻一樣，然而它並不是把馬克斯整個的生產方法的論理加以修正，而祇對於馬克斯所認為這一切生產方法的進化的問題上給以修正而已。

普列漢諾夫在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說：『我們可以想得到，當着馬克斯讀了茅爾根論原始社會一書後，他便更變了古代的生產方法與東方的生產方法的關係的觀點。實際上，封建的生產方法的經濟發展的邏輯，便會引到展開資本主義勝利的社會革命。然而中國或是埃及古國的經濟發展的邏輯，並沒有引到使古代生產方法的出現。在前一種情形下，就是講到兩個發展的階段，其中一個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階段）隨着另一個階段，並且由這另一階段（封建的生產方法的階段）

中生長出來的。在後一種情形下（中國和古代埃及），就代表着經濟發展中的兩種主要的形式。古代社會是代替了氏族社會組織而興起的，而同樣的這個氏族社會組織，又成爲東方社會制度出現的先聲。這兩種經濟組織中的任何那一種形式，都是由于氏族社會內生產力發展而造成結果，而這氏族社會終久要崩潰的。如果這兩種形式彼此間具有極大的區別，那麼它們的分歧點是由於地理的影響所造成的；其中一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了某種程度而形成爲這樣一種生產關係的集團，另一個社會則有另一種生產關係的集團，而且大異于前者』。

就是這種地理的影響，可以解釋在東方的土地私有財產之所以成爲統治的門類，乃是由於其發展遲過於歐洲的結果，並且表現出完全與古代的，封建的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的財產不同的形式。而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意義下的土地私有財產之成爲統治的門類，却是從歐洲輸入到亞洲來的。

『財產的第一種形式，便是氏族財產。第二種形式，便是古代的，公社的和國

家的財產。與公社的財產同時發展的還有動產，後來又有不動產，然而後者乃非經常的而且附屬於公社的財產的形式。第三種形式，便是封建的或是等級的財產。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私有財產，便是財產的第四種形式（註：見馬克斯昂格斯論弗爾巴黑）。

在東方社會中，土地私有財產甚至還沒有發展到封建的財產。馬克斯就在這一點上看做『了解東方社會的鑰匙』。

昂格斯在 Anti-Du-ring 一書上說：『在整個的東方，土地私有財產的主人，就是公社和國家』。

東方祇有當着土耳其稱霸的時候，才創造了封建制度的形態。祇有日本因了特殊的歷史條件而發展成爲純粹的封建制度，其封建主義的力量，不以農奴數量而以地租數量來決定。印度在英國沒有侵入以前，也已經形成了整批的收取地租的階層。然而印度的半封建半資產階級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却是英人所創造的，同樣

的，印度支那的半封建半資產階級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則是荷蘭人創造的，阿耳日利亞的——乃是法國人創造的。

要了解中國的歷史，必須將這一要點弄清楚。人工灌溉，也就是中國農業上首要的條件。然而要進行人工灌溉，必先要使土地平坦，建立排水的系統，使土地能曬乾，創辦大規模的建築工程，以防止河水的汎濫。這一切浩大的工程，個別的農民是決不能擔負的。氏族社會因了交換發展而日漸崩潰，更加上了與遊牧民族的作鬥，如是使這般擔負公眾事業，舉辦水利和建築的社會公僕，一變而為社會上統治階級中的人物了。在這一點上便引起了一種爭論，中國在紀元前三世紀前所存在的諸侯制度，是不是像封土上的諸侯，還是像古代希臘式的氏族國家，這讓歷史家去研究吧。主要的就在于中國社會發展的起點，便是東方社會。中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前，早就破壞了這種東方社會，搗毀了這種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帝國主義的侵入，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把這種破壞的過程更迅速地往前

推進。然而這舊社會的斷片和殘餘還是遍佈於全國。它們直到現在還是在糜爛和損害全國的經濟生活，正好比商業高利貸資本一樣，它破壞了中國的舊式的東方社會以及東方社會的最主要的基礎——沒有土地私有財產的存在，它更破壞了中國的生產關係——財產關係。在這方面講來，商業高利貸資本確是對生產方法上盡了革命化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它卻沒有力量去創立新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土地私有財產。要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那就需要帝國主義的深入，和中國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自然，東方社會也從來沒有『純粹的形式』，正好像從來沒有完成的封建制度一樣。如果俄國，德國，英國的封建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如果各國的封建制度因了許多自然的，歷史的，戰爭的，入寇的原因而形成爲各種不同的變態，那麼亞細亞生產方法同樣也表現出各種相異的變態，例如在近東，沙漠田的經濟，耕種者和畜牧者不斷地結合，給了亞細亞生產方法上以特殊的性質；在印度，因了各種歷史的原

因，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等級；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具體的過程也給了此種生產方法以特別的影響。

亞細亞生產方法，不但沒有純粹的形式的存在，而且在某種歷史和社會的條件下，還能夠出現於那些農業生產的條件完全異於東方所特有的前提的地方。這便是列寧對於此種生產方法的特性的觀察。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聯席會議上，關於土地國有化問題，列寧曾與普列漢諾夫有一段辯論的話：

『在莫斯科的俄維斯時代（註：當時俄羅斯祇佔據了莫斯科附近的疆域），既會有土地國有化的存在，那麼它的經濟基礎，就是亞細亞生產方法。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在俄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已經鞏固了，及至二十世紀時它無條件的已成爲統治的形式了。普列漢諾夫把建築在亞細亞生產方法上的國有化，與建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上的國有化混爲一談。同樣一個名詞，他却忽視了根本上相異的經濟關係——生產關係』（註：見列寧全集第九卷）。

所以當我們講到東方的土地國有化的時候，那就應該看清這個國有化是建築在東方社會身上的。

當着西班牙人在西班牙破壞了摩爾 Moor人所創造的巨大的灌溉的建設，按馬克斯的意見，認為在西班牙人佔勝利後的西班牙的一切具體的歷史和社會的關係，已不像歐洲式的封建制度，反而更像亞細亞的社會制度。

在俄國，因了外部的影響和內部的發展，使大彼德以前的俄羅斯形成爲『半亞細亞的制度』。

就是東方本身也沒有存在過純粹的亞細亞生產方法，而且表現出各色各樣的變態。

一切東方社會所具有的共同點，便是適應於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國家形式——東方和亞細亞的專制政治。一切東方的專制國家的特點，便是：

第一，一切社會事業，都由中央政府來辦理。

第二，整個的國家，除了一二大城市外，分成爲很多的完全經營自給經濟的農村公社，這些公社便是他們的小的世界。

這就是馬克斯對於亞細亞專制國家的估量。昂格斯也屢次地指出來，認爲辦理社會事業，特別是創設人工灌溉的大工程，便是亞細亞專制中的主要的特點。

在整個的東方，特別在遠東，這種東方式的專制，不但成爲一切社會事業的組織者，而且也就是保護全社會以抗禦天災的組織者。這我們就是指東方社會中所特有的積穀倉的組織。

『東方的專制，祇有當着地方妨害了專制的利益的時候，才起來反對地方自治，但是地方自治如能取消專制政府對地方所應負的責任，或是減省了它對地方行政上的操心的時候，那麼它也願意有這樣自治機關的存在』（註：見馬克斯與昂格斯書札）

專制的對於農村公社，氏族公社，同樣是如此。奇怪的傳統和習慣，已足以調

濟公社內部的生活，如果它不違反專制的利益，並能夠供給剩餘的生產品，那麼專制政府也決不來干涉它們的。然而隨着了市場的擴大，加強了對農民的剝削，傳統的有限的剝削受到了破壞，那麼農民就會起來暴動。東方社會中有沒有階級的存在？這裏就可以不用置答了。除了氏族社會外，任何那一種社會制度都有它自己所特有的階級，如果馬克斯嘲笑古代社會中去找求資本的蒙材，如果馬克斯警戒我們不要把封建時代的城市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相混合，並特別指封建社會中的資產等級與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下的資產階級間的歷史上的銜接性，如果昂格斯警戒我們不要把中世紀的無產階級的祖先與資本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相混合，那麼我們在東方社會中去找尋東方社會所特有的階級，定是很合理的。回教的東方社會中，軍事和宗教的貴族，商人和高利貸者，就是社會上的統治階級。土耳其因其特殊的歷史的條件，所以生長了類似歐洲的封建主。印度則有英人所謂的『地租收取者』的存在。帝國主義在中國所遇到的地主，商人，高利貸和官僚的混合

體，就是中國社會中的統治階級。隨着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而這些階級漸漸地變成爲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並且又形成了新的階級——現代的無產階級。而各階級的社會面目和整個的社會都隨之亦皆變遷。

東方社會中，自然品形式的地租，成爲國家稅收上主要的來源。就是這種支付的形式，鞏固了這個社會制度。地租的形式，從自然品轉變到貨幣的時候，不啻就宣告這個制度沒落的第一聲，正好比交換價值過於深入到公社的經濟生活後所引起的結果一樣，更好比農業與鄉村家庭工業分離後所發生的影響一樣。

在中國這些過程的發生，正當着世界市場，資本主義，殖民地政策，以及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的發展的時期。講到帝國主義如何來影響中國的經濟，我們在本書中祇能詳述其一部分——農村經濟。自然，這是不完全的，我們不能把農村經濟與整個的經濟分割開來。帝國主義所影響的乃是中國全部的經濟。

馬克斯在一八五三年時，已經講到英國在印度的作用，正好比一個『無意的歷

史的工具。」他又說：

『英國在印度要執行兩種任務：一是破壞，一是創造。一方面破壞亞細亞的社會，另一方面在亞洲創造西方社會制度的前提。』

英國的這個無意的歷史工具，在印度引起了亞洲的唯一的社會革命。帝國主義在中國，同樣的在推動此種社會革命。

馬克斯說：『閉關自守，便是保持舊中國的首要的條件。自從英人用強力來使這種閉關自守宣告了終結，隨後的破壞乃是不可避免的，正好比被封閉着木乃伊，等到一接觸了新鮮的空氣，就在傾刻間分解了。』

這種破壞固然到來了。舊的中國曾給以頑固的反抗。馬克斯在一八五八年說：『很快的發展中國的市場的計劃，已受到了挫折。這個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鴉片貿易，對華出口的增加完全依靠着鴉片，更在於中國的經濟組織，以及小農經濟的制度。這樣挫折，將引起更浩大的強力』。

蘇彝士運河和航海的汽船，漸漸使中國與大的資本主義生產的中心相接近。一八九四年昂格斯給查爾其的信上說：

『戰爭給了中國以致命傷的打擊。鐵道，蒸汽機，電汽，和大工業都建築起來了，站在戰爭的防禦上雖然是必要的，然而這樣一來，使閉關自守再也不能繼續。結果使舊的自給的小農經濟的制度發生破壞，而整個的舊社會制度都開始動搖。』

資本主義已開始征服中國了。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發源於舊有的生產方法，在舊的生產方法底下，直接生產者事實上與法律上都還沒有完全與生產工具分離。祇有工業資本才能執行這樣的機能：不但享有剩餘價值與剩餘生產品，而且還能夠創造它們。祇有工業資本才能使生產具着資本主義的性質，祇有工業資本才能使資本家與勞動者對立起來。宗主國的工業資本在中國，開始祇是一種商品交換的形式，或是貨幣商品的形式，祇有在英國美國日本甚至印度，它才真正行使了生產資本的機能。它祇是破壞了中國的手工業者與農民，然而不能把他們變成爲產

業無產階級。破壞中國的手工業以發展其他國家以及印度的機器生產。中國的農民經濟被破壞了，然而其他的國家的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却發展了。馬克斯在資本論上說：『當着機器生產踐着手工業而擴大，那麼其進步一定很可靠的。這一個時期能夠給出大批的利潤，所以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可惜在中國，這第一個時期却便宜了其他國家，因為它們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早過于中國。中國起得太遲了，這也就預先決定了中國今後發展的道路。資本主義固然征服了舊有的生產方法，然而這一個過程却在帝國主義時代與殖民地政策下進行的。

祇在第二時期中，外國資本在中國才算真正行使其博取利潤的機能（例如國際借款），然而其大部分則不能盡其生產資本的機能而都用在借款（例如日本借款，庚子賠款等等）援助反革命（例如袁世凱借款）和收買中國的國家機關。外國的銀行資本，在中國還募集中國的存款，然而它仍舊祇行使了商業資本或是商業高利貸資本或是貨幣商品資本的機能。外國資本與一部分的中國資本現在已投向交通工具

(鐵道，內河和海洋的航輪)和消費品的生產部門(紡織，絲，烟艸)。中國現在也漸有製造農產品的工業(如食品工業，榨油，磨粉，製糖等等)這部分資本才行使其生產的機能。鄉村的家庭工業亦變成爲資本主義的工業部門了。創造了新的社會的階級——無產階級。整個社會的面目亦隨之而一變。然而製造生產工具的工業部門至今却沒有發展。這原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上一般的弱點。甚至那些工業最發達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樣地免不了此種缺憾。印度雖已有若干五金工業的發展，然而亦無濟于全局。製造生產工具的工業是需要大批資本的投入，并且這些資本要延長很久的時期，需要培植整批的熟練工人和技術人材，凡此種種，無論高度的利潤，無論模仿先進國的新技術的可能，都是得不足以償失的。

所以直到現在，生產工具的製造還是成爲帝國主義的宗主國的壟斷事業。

大戰後帝國主義間攫取市場的競爭，愈趨劇烈，致引起亞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業上普遍的恐慌。大戰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輕工業很快的發展，現在

已告終止，而且有些地方已趨於衰落了。

一般講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城市的人口分農村人口而相對地增加。然而在印度恰是相反，農業人口反而分城市人口而能相對地增長。英國的城市就分印度而發展起來。毫無疑義的，中國也就是走上這種過程。當西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破曉的時候，商業高利貸資本就破壞了封建的土地私有財產，和農奴制度下的農民。把封建的財產變成爲現代資產階級的財產，破壞了行會，解放了農民，並且同時又發展了大工業。然而在中國，新的生產方法遇到了完全異於歐洲的土地關係的特殊條件。除了『獨立的土地佔有的農民』，它又遇着了商人地主，高利貸地主官僚地主以及半成租的佃農』（註：地主與佃農各得收成之半，更不用講其他土地私有的特殊形式（例如旗人，氏族和公社的土地等等））。當時歐洲的封建地主，爲了箝制農奴而作爭鬥，而在回教的東方，半成租的佃農，則爲了享有永久租佃權而作鬥爭。在西方土地多而勞働力少，在東方適是相反，因了需要人工灌溉，所以土地較少，

而勞動力則較爲多。地主握有收租權，佃農則享有耕植權，以作爲生活的條件。一般地講來，半成租的形式，並不能稱爲中國租佃關係上的特點，這種形式甚至在現代的美國南部，法國，意大利和匈牙利都盛行的。

當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下，此種租佃形式必含着新的社會經濟的實質。半成租的佃農可以變成爲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平分收成的佃農的以自然品形式來支付地租的事實，並不就是說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形式已不能掩蔽資本主義的實質了。平分收成的佃農，祇有當他的地租（貨幣的或是自然品的）並沒有吞去他的資本的利潤的條件下，才能稱爲資本主義的佃農。然而在中國祇有很少的『平分收成的佃農』變成爲資本主義的企業者。在印度，爪哇，高麗，印度支那，波斯，埃及以及阿爾日利亞等處，同樣有這種現象，並且其非資本主義的租佃關係完全與地租的自然品形式相適應的。

中國有許多省內，『平分收成的形式』與『土地合有』的形式相聯結的。所謂

『合有』，就是田底屬於地主，田面屬於佃農。這種特殊形式的土地財產，歷史上祇有在中世紀時代的英國的色列特 Colt 以及法國曾存在過。

中國租佃關係上最顯著的特點，便是永久承繼的佃租。古代社會同樣的有這樣的佃租形式。古代的希臘羅馬的公家和教會的土地，可以出租而享有永久承繼的權利。中世紀的封建，同樣的仿倣了古代社會中這種租佃關係的形式。在德國，特別是皇族的，國家的和教堂的土地的出租，都是採用此種佃租的形式。在東普魯士，特別在波蘭，地主常常把自己私佔的土地出租，而一般下級的貴族就成他們的永久承租的佃戶。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大革命，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德意志大革命，把這種永久租佃的形式宣告了終結。在意大利的南部，在西班牙，特別在西班牙的西部，至今還是有永久租的存在。在瑞典也存在過此種形式。英國人在印度各省中也造成各種永久佃租的形式。荷蘭人在爪哇亦是建立這種租佃形式。在倫敦的東方，如在阿耳日利亞，通尼斯，土耳其，波斯以及日本的許多落後的地方，土地

使用上的這種形式還是有極大的作用。在中國的土地關係上，它同樣地也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在並不是『土地物質』（就是土地面積）而是『土地資本』出租的東方，永久承繼的租佃制就成為租佃關係上統治的形式。在回教的東方，土地財產的募集的法律上的形式，和土地的抵押，適與中國的完全相符合。

中國所特有的（更正確地說是在東方的）永久租，便是中國租佃關係上最顯著的形式。在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道路中，所遇到的並不是封建的等級的土地財產，而是還沒有與氏族社會的殘餘分開的農民財產（這在土地買賣和抵押形式中都可看出來），以及還沒有與中世紀的遺跡分開的地主的財產。過渡到現代資產階級的財產，又是在工業很滯緩的發展，它表現在無地的農民不能變為無產階級，以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影響下進行着。在東方，資本主義發展中最主要的特徵，就在于資本主義還不能撲滅和排擠商業高利貸，反而更擴大它的活動的範圍，加深它的操縱，以及受制於它財政的勢力。東方各國中祇有日本的資本主義才發展到此種階

段，使工業資本與銀行資本不但制服了商業高利貸資本，而且排擠它到最落後的生產部門中。

同時在歐洲的過渡到資本主義，却隨看了舊的封建的領地的減縮，而有利于土地私有的農民，就是說，分了地主的土地以擴大農民的土地。在中國和印度，恰是相反。農民的土地漸漸落入于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手裏。自耕農降而為佃農。資本因受到帝國主義排擠的影響，都投入到農村中來了。這些國家的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都是建築在農村經濟普遍的衰落的基礎上。英國『皇家委員會』在印度，也不得不大聲疾呼地講：『印度的人種退化了，牲畜也退化了，甚至植物——麥，棉，甘蔗，和油質種子等等也都退化了。雖然英政府想大興灌溉建築，舉辦合作事業，然而終不能阻止此種趨勢』。然而在中國，這種過程特別表現得明顯，因為中國的生產條件——灌溉系統，其江河日下之勢，愈不堪問。這種過程，更因了建築在殖民地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財富的外流而得不到等量的代價的基礎上而更趨

于完成。

『平分收成的佃農』在市場統治的條件下用生產品來支付地租，農民使用的土地的轉變爲地主的財產，農民土地的使用日漸減縮，農民的土地的喪失而在大機器工業滯緩的發展下不能變爲城市無產階級……這一切均足以使貧苦的農民的食料上愈趨惡劣，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使幾千百萬的破產流離的農民，不能容身於天地間。在中國，印度，馬來羣島，爪哇，菲律賓，和高麗，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這種過程。如果國際修正派，否認馬克斯關於『貧窮化』的論據，那麼亞細亞國家中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完全證實了他的理論。印度有一千六百萬人都脫離了生產，中國恐不祇此數吧！如果當歐洲過渡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時候，到處都蔓延着流氓，那麼在人烟稠密的東方，恐有幾千萬人都降爲流氓，苦力甚至土匪。這樣浩大的人衆，便是一種蘊藏的力量，祇要工業發展起來，他們都是產業的後備軍。

世界的分工，把殖民地地上舊有栽培植物破壞了（例如蔗糖，中國的與印度的靛

青，中國的茶葉），同時又發展了新的栽培品（如印度爪哇的茶，爪哇的咖啡，印度中國的油質植物）。在過渡到商品經濟中，更蔓延了牲畜的染疫和植物的病態。這種種都籠罩在不可捉摸的市場關係的影響下。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國家的生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又遇到了在更順利的條件下，較高的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的生產費下所製造出來的生產品。在國內市場，又遇到了生產費很低的舶來品。農民和手工業者受了競爭的影響，便不得不減低他們的消費以至於低過於生活必需的限度。並且這個過程的發生，更在於東方國家中主要的金融——銀，從國際的貨幣降而為簡單的產品，並且銀價雖時漲時落，然終趨于低落。

除此以外，帝國主義還用非經濟的手段來攫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剩餘生產品。自大戰後，這種非經濟的榨取，在有些地方，已發生了動搖（如阿富汗，土耳其）。帝國爲了要阻止和轉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所以便採用改良，妥協，讓步，再讓步（如在印度，埃及，波斯，荷屬印度，菲律賓以及在中國亦有

「一些」的方法，以暫時緩和革命的浪潮。然而非經濟的侵略至今還不能放棄。

在中國，這種種過程的發生，就在于舊的國家的崩壞的條件下，在民族革命的變成爲國內戰爭的條件下，而且這國內戰爭就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爭鬥的時代，所以就構成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列寧說：『俄國，印度，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最大多數，他們在近年來都捲入到爲了爭自由的狂潮中，我們毫無疑義的敢斷定，他們的爭鬥，就足以決定世界的最後的命運』。

這種種便是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一般的輪廓，在這中間我們去研究中國的農村經濟，去觀察它發展的傾向。

第一章 中國農村經濟的統計

許多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書籍中間，對中國土地關係的分析，常以中國農商部的統計做出發點。中國農商部的統計，是按土地面積來劃分經濟的門部。然而「團糟的農村經濟的土地面積的統計，很少是可以證實的」（註；見列甯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很小的土地，在強度耕種的條件下，能夠產出多過於廣度耕種那樣大的土地。列甯說：『生產的範圍，才是確定經濟範圍的惟一正確的標準』，「單單土地面積的統計，還不足以論及生產的範圍，按照土地數量來劃分經濟的門類，常常會對於農業發展上，特別是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上，發生極膚淺極含糊的了解」（見列甯全集第九卷）。列甯認為農村經濟的統計，最低限度要包含下列的材料：
耕地的面積，用來證明廣度經濟的範圍；不變資本的統計（農具和機器的價值，肥

料的費用)，用來證明強度經濟的程度；可變資本的統計（僱傭勞働的費用），用來證明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性質；最後，生產品的價值，作為決定生產範圍上唯一正確的標準。然而甚至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經濟的統計，因了官僚機關的舊習和拙笨，遠不足以滿足上列的要求。中國的農村經濟的統計，祇是爲了國庫上行政上的目的，所以充滿着官僚的愚拙的舊習，自然決不會好過於歐美的模樣。如果把中國官廳關於土地劃分的統計用心看一看，那就可以得到下列的材料：

土地佔有的數量	戶口數量	百分數
十畝以下者	17,805,125	36.1
十畝——三十畝	13,248,274	26.9
三十畝——五十畝	10,122,214	20.5
五十畝——一百畝	5,348,314	10.8
百畝以上者	2,835,464	5.7
總計	49,339,591	100

同樣還有一張統計，把農民分割為三個門類；自耕農，佃農，半佃農——一方面耕自己的土地，同時又租地來耕種。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中國農商部按這三類的統計，列之如下：——

類別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戶口數量	百分數	戶口數量	百分數
自耕農	24,587,585	50	25,381,200	53.2
佃農	13,825,546	28	11,307,432	25.7
半佃農	10,494,722	22	9,246,834	21.1
總計	48,907,853	100	43,935,475	100

中國官廳關於各省的統計，也是按照土地的面積，來劃分經濟的門類，也有自耕農，佃農，半佃農的分類。爲要減輕讀者數字的麻煩起見，茲引用牙什諾夫根據官廳材料所製成關於各省面積，人口，戶口和耕田的數量的統計。這個統計，更好

在把中國的里化成爲俄國的平方里（見牙什諾夫著：北滿的中國農村經濟一書）：

各省和特別區	面積	人口	每平方俄里的人數：	調查年份	農戶	耕田面積	平均
							每戶耕田面積
直隸	263,513	34,186,711	130	1920	4,691,671	6,364,114	1.4
山東	127,361	30,803,245	242	1920	5,487,158	6,920,356	1.2
河南	154,95	20,831,909	139	1921	6,321,009	26,000,000	1.6
山西	186,216	11,080,827	60	1921	1,523,546	2,381,804	2.2
江蘇	87,838	23,786,064	285	1921	4,525,308	5,886,436	1.3
安徽	124,927	19,832,665	159	1921	2,749,824	2,785,696	1.0
江西	158,108	21,466,800	155	1918	4,064,956	2,722,802	0.7
福建	105,405	13,157,790	125	1919	1,530,695	891,750	0.6
浙江	83,447	22,043,300	264	1918	3,339,556	2,077,488	0.6
湖北	162,492	27,167,244	167	1918	3,636,654	10,782,524	3.0
湖南	189,730	28,443,279	150	1917	1,437,797	1,463,274	1.0

陝西	171,285	9,465,538	55	1921	1,637,295	2,160,180	1.3
甘肅	235,474	5,927,997	21	1918	854,129	1,794,276	2.1
四川	497,163	49,782,810	100	1915	6,038,370	8,362,182	1.4
廣東	227,500	37,167,801	163	1917	3,925,207	1,733,460	0.4
廣西	175,675	12,253,335	70	1916	2,216,873	5,567,332	2.5
雲南	333,774	9,839,180	3)	1914	1,300,252	766,458	0.6
貴州	152,839	11,114,951	73	1915	190,653	90,070	0.5
	3,487,154	411,356,367	118	—	35,476,953	73,764,264	1.3

如果農商部的這種統計數字，在我們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書籍中，並不看做有重要的意義，那麼我們就可把它置之不問了。然而甚至華林同志，在他開始調查中間，對於這種統計，認為雖是有很多的假設，但尙可算比較正確和接近的。（註：華林在廣東雜誌發表的『中國農村經濟上的基本問題』，固然，後來華林很坦白的指出『中國官廳的統計，祇是代表各地的行政機關的報告的彙錄，不但看不出任何

各省和 特別區	面積	人口	每一平 方俄里	調查 年份	農戶	耕田面積	平均每
							戶耕田 面積
奉天	156,500	12,824,779	94	1918	1,736,309	3,052,476	1.8
吉林	241,102	6,433,318	27	1920	578,556	3,260,453	5.6
黑龍江	473,688	2,825,337	6	1918	336,497	2,591,040	7.7
	851,210	22,083,434	26	—	2,551,362	8,903,969	3.4
	446,650	6,270,739	14	1918—20	631,073	4,404,280	7.0
熱河	—	5,372,920	—	1919	671,615	1,122,896	1.7
綏遠	3,112,093	531,960	—	1918	66,495	418,818	6.3
察哈爾	—	938,152	3	1921	124,769	823,664	6.6
蒙古	—	2,580,000	—	—	—	—	—
新疆	1,252,615	2,519,519	2	1918	460,124	801,786	1.7
西藏	1,054,053	2,500,000	2	—	—	—	—
	9,757,125	447,942,412	46	—	59,451,313	85,834,393	1.4

那一地方的經濟發展的情形，反而常常發現出誤解事實的真相」見華林在東省雜誌一九二六年第八期上『中國農村經濟的結構』。

巴蒲夫、達鈺夫與赫特洛夫以及阿爾斯基諸學者，常常根據中國官廳的統計，來得出關於中國農村內階級分化與資本主義發展上的結論。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究竟這些數字，能否代表中國農村經濟中的耕地面積。看一看這統計的寶貝究竟如何。

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一年的農商部的一切統計中，載明河南省耕地面積，等於36—31,000,000俄畝，即等於250—300,000個俄方里。然而據我們實際的調查，祇等於17,500俄方里。這樣看來，官廳的統計與事實上相差有兩倍以上。

現在我們拿以前張作霖統治的東三省看一看。東三省的政權比較他省『穩固』，『和平和秩序』從來沒有破壞，而且不斷的國內戰爭，也並沒有過，甚至天災的範圍，並沒有異常擴大的程度，所以這幾省的統計材料，應當比較正確可靠些。

東三省耕地的官廳統計(以畝為單位)：

年代	奉天	吉林	黑江龍
1914	51,412,710	47,810,059	34,806,648
1915	51,126,636	44,216,806	35,873,687
1916	50,362,000	43,716,553	37,150,063
1917	45,194,175	85,985,768	37,165,014
1918	45,787,146	85,877,392	38,865,599
1919	——	86,258,978	——
1920	——	81,171,636	——

[註1]

[註1] 爲什麼日本人所製的統計，博得人家這樣的信任，例如巴浦夫達鉄夫盡量地應用它這很足以奇怪的。實際上關於南滿鐵道，關東洲一帶的區域以及這些地方的日本企業的生產和流通方面的統計，確足以使我們相信，然而關於土地

問題上，日本的統計，絕無科學上的意義。一九二二年日本對東三省的耕地的統計：

奉天	216,000,000 畝
吉林	156,000,000 畝
黑龍江	118,000,000 畝

且拿來同上列的統計比一比吧！究竟日本的統計可靠到何種程度！

這些統計數字的不正確，可想而知了。按官廳的統計，在五年中，奉天的耕地縮小了2,000,000畝，然而據大家所知道的，適是相反，在這五年中，移民到奉天的非常厲害，從山東，直隸移殖到奉天去的，達幾萬以上呢。在這樣條件下，奉天的耕地應當增加的。同時移往黑龍江的人口，也不亞於奉天，然而官廳統計中關於耕田面積的增加，絕不足以表示移殖上的正確數量。按上列的官廳的統計，吉林省在一年中耕地增加了兩倍，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罕有之奇事！

關於其他省份的官廳統計中，同樣可以找到很好玩的寶貝。例如關於廣東的統計。我們對於廣東的統計，比較下過很多的工夫，所以能夠完全暴露官場統計的謬妄。現在且看官廳關於廣東的數字吧：——

年 份	農戶數量	耕田數量 (以畝為單位)
1914	2,624,134	29,439,414
1915	11,562,293	136,877,144
1917	3,925,207	26,001,900

看了這一張統計，不用任何解釋已很明顯了。窮苦的廣東的農民，決不會在一年中增加了九百萬，同樣的，殘酷的中國軍閥，官吏，地主，高利貸者也決不會在兩年之後，便摧殘了八百萬個農民經濟。耕地的面積，也很顯然的在一年中決不能增加107,000,000畝，同樣的，在兩年後也決不會減少110,000,000畝。真又是從來沒有過的奇事！

現在再引用一九一七年一張很有興味的算做表示廣東農村中階級分化的統計，
 挪來和上列的統計比較一下。現在先讓我們來看一看這張統計：——

耕田數量 (以畝為單位)	農 戶 數 量	
	絕對數字	百分比
十畝以下	2,083,252	52.0
十一——三十	962,107	24.5
三十一——五十九	533,221	14.1
五十——一百	243,040	6.2
百畝以上	83,587	2.2
總 數	3,926,207	100.0

如果假定這張統計內的第一類，平均為五畝，而其餘的四類則祇取去其最低數
 目（就是第二類為十畝，第三類為三十畝，第四類為五十畝，第五類為一百畝），那

慶廣東耕地的總數，應有51,144,690畝。這還是最低限度的數字呢！然而在前表中所載的總數爲26,001,900畝，同是農商部的報告，相差何若是之遠！

這種滑稽的統計，要它來說明中國農村中的土地關係和階級分化，自然是笑話。甚至關於中國人口數目的統計，我們至今還不知道其確數。不錯，中國的官僚爲了課稅的目的，在很早的時候已進行過戶口調查。如果我們相信中國歷史的記載，那麼在西歷紀元前二千二百零五年，中國已有過第一次的人口調查了。直到現在全國的人口調查已有過六十七。這種調查究竟如何的進行，上級人員如何地欺詐人民，魚肉人民，凡此種種，在俄國沙皇時代一個有名的學者柴哈洛夫所著的中國人口一書中，詳細的加以申述。一七二二年時，把人丁稅改爲田稅，當時的朝廷的論旨上說，『人口之增加，將不與賦稅相應』（見一七二二年乾隆聖旨），所以開始又調查戶口，結果一七二一年時爲24,985,039人，至一九四九年則增至177,495,309人，一七八三年更增至284,033,753。美國的傳教師羅斯說，中國的國家機關，就是『榨

取人民的賦稅的磨子』。中國整個的國家，已完全交給這些官僚了，要從這官僚機關中去找『統計』，那真是愚蠢的和腐敗的空想。統計原是社會主義的要素，統計是極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產物，是發展的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果實。歐洲的中世紀時代，同樣的不知有統計。法國的商務總監察使吐羅長，也不能給出關於一七八九年商業狀況的統計。法國革命中『國民會議』和『康文梯』的人民委員會，也不能搜集對於他們所注意的最基本的問題上的統計材料。俄國的歷史家泰爾說：『每一個歷史家都承認，對於十九世紀以前的時代的統計材料，應當盡量地謹慎和抱懷疑的態度』（見泰爾著法國革命中的工人階級），這當然很正確的。

然而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封建，確是高明過歐洲。馬哥巴羅——第一個遊亞的旅客，在元代時担任朝廷財政的顧問，在他書中說，第八世紀的時候，杭州祇是工人已有1,638,000人（見馬哥巴羅的遊亞錄）。

現在我們再來講中國的人口數量。關於這方面的統計很多。按美國前公使洛克

希耳的計算，一九〇四年中國人口總數為370,000,000。按一九一〇年前的中國官廳統計，則人口總數在一八四二年為433,000,000人。然而在一九一〇年的調查中，則發現人口總數祇為337,000,000人。德國學者克里斯根據中國食鹽的統計，斷定中國人口祇等於332,000,000人。然而他忘掉了中國私鹽買賣的盛行，同時他很武斷地根據德國農民食鹽消費的數量做出發點。我們知道，中國農民的食鹽消費，確是超過德國。此外，海關也發表關於人口的統計，一九二年的海關統計，認為中國人口為444,968,000人。一九二六年則為446,231,000人。中國郵務局也來統計人口，認為一九一三年為436,034,953，在一九一七年，為435,508,838人。可是海關的稅務司自己也承認，他們甚至對於各通商口岸的人口，也絲毫沒有正確的把握。就是上海的人口，也找不到確實的數字，

英國統計家泰潑爾，拿印度來與中國比較，得到這樣的結論，說中國的人口為282,006,000人。一九二六年，英國的一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與統計家韋爾堡認

中國人口爲三萬萬之說，是過於誇張的數目。那麼中國的統計，究竟誰是對的？中國政府，海關，郵務局對呢，還是洛克希耳，泰潑爾和韋爾堡正確呢？

韋爾堡在他的中國人口是二萬萬還是四萬萬一書上說：『無論在中國歷史上，無論在中國統計中，都找不到關於十九世紀中國人口增加的正確可靠的記載。國內戰爭，饑荒，水災，阻止了中國人口自然的發展，中國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的戰爭和天災，其嚴重的程度和毀滅人類的生存上，實遠過於歐洲和印度。我們沒有任何證據，來相信中國在這最後二世紀中的食料生產上的增加，同樣的我們也不敢相信中國人民在這時期中有所增加』。

中國鹽業占買的統計科的書記，同時也是中國有聲望的統計家張昌海，認爲十九世紀中中國人口發展的滯緩，實世界各國所罕有。他說：『腐敗日增，濫吞公款，強征暴斂，經濟衰落，暴亂叢起，水災頻臨，太平之亂，回匪暴行，浩大饑荒，國內戰爭，凡此種種，使全國經濟日趨崩潰，而使人口死亡超過生殖』。張昌

海和韋爾堡二人，很正確的看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歷史中的一般的傾向。

我們所以認為他們二人的論據是正確的，是由於我們看到當英人侵入印度後，印度也發生人口的減縮，同時中國的經濟基礎——農業技術，也很像印度。法國的女歷史家馬才蘭爾對於日本維新前，曾有一段名言：『自一七二〇年迄一八七〇年的一百五十年中，日本的人口發展，停流不進，其唯一原因由於飢荒。後來封建推翻，而日本的人口即見蒸蒸日上矣』（見馬才蘭爾著 *Le Japon des Tokugawa*）

然而日本的饑荒，甚至印度的飢荒，絕不能與中國的飢荒相比。馬克斯很觸目驚心地指出一八六七年時的印度饑荒，餓死了一百萬條的性命。然而一八五七年代的黃河決口，受難與淹沒者達七百萬。英國的巨大的機器工業的競爭，消滅了七百萬的印度紡織工人。然而太平暴動和回匪之亂，死了二千二百萬的中國人。中國的年紀上說，在滿清時，各省因天旱而遭大飢荒有一百六十八起，因水災而演成大飢者有三百二十四次，因蝗蟲者有三起。一個美國的學者，根據中國的年鑑。計自

一六二〇年迄一九〇〇年中國共遭遇一千五百零六次波及幾省的大饑荒。真的，中國才可以稱爲饑國了！（見馬洛立著 *China — Land of famine*。）

自一八七六——一八七九年，山西，陝西，直隸，河南，以及山東的一部分，久不見雨，而釀成大饑荒，據最確實的統計，死者達九百萬，如按賑災會的外人的調查，則謂有一千三百萬人云。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山西大災荒，因了賑災會工作的週到，鐵道運輸的便利，所以被難者，祇五十萬人。一九二五年的貴州省的大荒年，據中國郵務局的調查，死者竟以縣計，『農民得種而不得收，餓殍纍纍，滿載田間』。一九一九年在雲南亦有大饑。『貨物價格之高，從古所未有。貧者無力以維持其家，相率爲盜……政府曾下命，准從印度支那運輸米糧，於是糧食投機開始了，商人以米而富，貧者嗷嗷不得食。各縣中的難民，都是一村一村的棄屋而流離，奔往通都大邑。貧者殺其子女，免得眼看他們餓死，壯者乞食於途，餓死者無計……』（見前書）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山東，直隸，河南遭難者達九

百萬人，其中因餓而死者有四百萬人。

這樣看來，中國人口的統計，真是無從確定。最可靠的大約爲三萬萬而不是四萬萬人。

關於中國耕地面積的統計，同樣是糟糕。查米遜在一九〇五年時，計算中國耕田的總數，大約3,400,000,000畝（見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919）。海關的創辦者洛倍脫哈德在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五日上清廷的奏章中，述及中國耕田的面積爲4,000,000,000畝。中國農商部一九一七年的統計，以中國耕田面積爲1,365,000,000畝。（在這數目中，廣西，貴州，四川還不算在內）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講過中國官廳統計是有多少的可靠。它是根據各縣的土地登記而製成的，這土地登記，祇是爲了財庫的目的——徵收田稅與土地買賣稅，其內容真如下列所講，『土地登記，在中國已有幾百年甚至一千年的歷史……各鄉村中都有登記的計劃。然而據以前隸屬於德國的膠州的土地測量的結果，便看出這一切登記的計劃和統計，完全與

實際不相合的』(見哇克男著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搜集中國統計材料中最感困難的，便是中國度量衡問題。馬喇殼夫爲了這個問題，曾經寫了很多的辯論的文章，并認爲弄清中國的度量衡，乃是絕望的一回事。(註：馬喇殼夫關於高麗的人口問題上說：『如果我們相信東方的專制國家的統計，那麼我們會得到很大的錯誤。例如高麗的官廳統計說，一九〇四年的人口總數爲五百萬，後來自爲日人併吞後，在一九一〇年進行戶口調查，結果知道人口總數有一千三百萬。』中國的一畝，等於十六分之一的俄畝，然而事實上還有很大的相差。平常一畝等於6,000平方英尺，然而在濟南，一畝有8,000至17,500平方英尺。中國各省，各縣，甚至各村都有自己的畝，自己的度量衡，而且相互間有極大的差別。一般講來，中國一畝等於337到937平方米矣。中國的豪紳，往往就利用這度量衡不統一以利於己，江蘇北部的所謂『公地』與『租佃』紳士，丈量土地的尺度，往往大過於平常二倍，這樣可以減少地稅和地租。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耕地的面積，同樣的得不到比較相近和確切的統計。

東方的專制國家，以戶口看做政治上，經濟上，最重要的還是課稅上的單位。中國的年鑑上所記載的，並不是人口數而是戶口數（見一九二七年東省雜誌第一卷）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的人口統計，並沒有計算不納稅的孩童，高麗也是如此。現在中國的警察機關所進行調查的也祇是戶口的數目。戶口就成為行政上課稅上的單位。或者從戶口數量方面，我們對於中國人口與耕地面積上，可以找求比較有根據的結論。

按農商部的統計，一九一四年中國的農戶有39,409,315。一九一五年——40,737,886。一九一七年——48,907,853。一九一八年——45,935,475。這些數字，很明顯的與實際不能相符的。甚至在特殊的中國的條件下，大部分的民衆常常處在早不保暮的飢荒狀態之中，然而也決不會像農商部所載的一年中（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死去了一千九百萬個農戶，同樣的也決不會在兩年後就有八百萬農村經濟復活

起來的。關於這種笑話，中國農商部就用這樣的話來掩飾，說在統計總結的時候往往有這省或那省沒有報來。然而問題却不在於此而在於中國的國家機關的本身。農商部的統計冊上的序言說，『本書內的統計數字，完全根據各省區長官各縣長依本部所特製的統計形式而調查後所送來的報告』。如果稍一知道中國的國家機關的人，那對於這些統計必不肯加以重視。然而巴蒲夫達夫則為『中國的統計』作辯護，他完全沒有了解東方社會的實質和階級的內容，特別是中國的。一個二十世紀的馬克斯主義者對中國統計的估量，反而及不到十九世紀（一八四〇年）的沙皇時代的柴哈洛夫，那真是可惜！中國『科學研究社』中一個淡季女，在科學雜誌說，中國有25,000,000農村經濟。中國年鑑上說，中國有31,000,000農村經濟。現在在中國問題的研論中，文章中，演說中往往就用了這個數目，然而這些數目，研究從什麼地方來的？孔子子造的呢還是天上掉下來的？

對中國任何那一種最謹慎最忠實的統計，或是選擇的統計，在分析時應當注意

到二點：第一，中國的農民，憑他數千年中所嘗受的苦痛的經驗，從來不敢將他的家庭和經濟的真情告訴給當權者，他知道如果把真的情形告訴出來了，那麼就要有新的賦稅新的苛征的危險。中國有一種迷信，認為在打穀或是取絲的時候，來了一個旁人，那是很不吉利的，并且禁止孩童講到收成的好壞。這種民間的習俗，我們相信確有它合理的根源。凡是親身參加過中國選擇的調查者，大家都知道搜集統計的困難。祇有在當時的廣東，以及其他農民運動爆發的省份，農民的不信任心的堅冰，才漸漸的消解，農民漸漸敢向農民協會的工作人講些老實話。

第二，中國的官僚——自地保一直到總長，從來不肯將自己的實際情形，告訴其上級機關，祇是我騙你你騙我而已。各人都想從自己的地盤中多搜括些，上級的長官，祇要得到其分內的部分，而不去管究竟下面有多少進賬。所以如想根據這種統計來探求結論，那麼非但失望而且是糊塗。

雖然所有的統計是何等的失望，何等的虛妄，然而有一個事實，我們總可以看

得出來的，這就是關於全國的土地面積和耕田面積的極不相適應。一直到現在，外國的調查者，足跡所達到的祇是通都大邑，所航行到的祇是商業要道，所以大家腦袋中都存着『中國的農民祇耕一角小小的土地』。所以著名的中國土地關係調查家查米遜也說，中國的耕田面積，祇等於全國土地面的百分之五十。然而如果對中國情形稍為熟悉的，那一望而知其謬妄的。按官廳的統計，則全國耕田面積等於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十一又六。如果我們除開了許多人口稀少的區域，如新疆，那裏的沙漠田經濟給農業發展上以很大的限制；如東三省，那裏除了奉天外，擁有很廣大的收容外來移民的土地和森林地帶；如內蒙古，那裏的移殖的過程祇在開始，——而祇以本部十八省來計算，則按官廳的統計，全面積總數為 3,936,000 平方啓羅米突，耕田面積為 1,136,311 平方啓羅米突，就是佔全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八又九，哇克男對於這個數目認為過大，他說：『誰稍微了解中國情形的，那一定會對於這個統計發生很大的懷疑。』

按苦海諾夫斯基的統計，說中國的耕地祇佔全土地的百分之十五。（見苦海諾夫斯基所著中國的土地佔有與農業）如果我們挪其他的國家比較一下，如法國，它的全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三為耕地與園圃，百分之十一為牧場與草地，百分之十七則為森林所佔，更如很多山地的奧國，它全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七又六為耕田與園圃，百分之十九為牧場和草地，百分之三十二為森林地。那麼我們不能不指出中國耕地與全土地面積的極不相適應的現象。

日本雖是儘量地想擴大耕田的面積，日本農民甚至登山而耕，以補救土地的缺乏，然而耕地面積，也祇等於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十七又五。山西，甘肅，陝西的北部，按最可靠的調查，耕地佔全省土地百分之二。所謂模範省的山西，據官廳的統計，全土地面積為700,000,000畝，耕地為40,000,000畝。在人烟稠密的廣東，據官廳的統計，耕地祇佔全省面積的百分之七。據我們許多在廣東研究過幾年的農村問題的朋友說：廣東耕田面積，至多佔全省土地的百分之七至十。

在下文中，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種情形和這一種理由，就可以作爲了解中國農村關係的特性上的一個鑰匙。這裏我們首先要提到這一點，就是一般地講來，中國的荒地，很少看做國民經濟上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中國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伐掘森林已達到絕有的程度，除了東三省外，湖南的西南部，貴州的沅江流域，福建的閩江流域，以及四川的西部，很厲害地進行採伐森林——使中國幾乎沒有林了。拚命地採伐林木，使中國幾無一木可存，如是便加強了中國氣候變遷的過程，增多了水災旱災的可能性，將來會造成一省數省人口的滅亡。同時中國也沒有草地和牧場。本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間，畜牧事業，漸漸失落其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意義。如果把牲畜分爲二類來講——耕作的牲畜，取乳的牲畜，屠殺的牲畜，那麼中國一般的牲畜，便是耕作的牲畜，然而中國的耕作的牲畜，在農業上所發生的作用，亦遠遜於歐美各國。取乳的牲畜以及屠殺的牲畜，在中國農村經濟上，從來不起任何作用的。甚至擁有廣大的空地的東三省，也沒有經營畜牧事業的草地和牧場。祇有

在新疆，甘肅的回人，和內蒙古，畜牧事業才成爲獨立的經濟部門，而在整個經濟系統上才起有它的作用。然而這些省份內的畜牧事業，因了許多好的草地和牧場漸漸改爲耕田地，所以就日漸衰落。蒙古人與回教徒就不得不放棄畜牧而從事耕種，而且所耕種的都是最壞的土地。

由上看來，中國的農村經濟上，是缺乏森林，缺乏草地，缺乏牧場。中國的農民，或是在百分之十五的全國的土地上，或是在百之二十的全國的土地上，不是活着，便是死去，再也沒有其他的生路。所以關於中國耕地面積與全國土地面積的不相適合，以及其不相適合的原因，含有極重要的意義。我們決不能解釋此種不相合的原因，祇談之於自然的條件。奧國的山地不少於中國，甚至多過於中國，然而耕地佔全國土地百分之三十七又六。我們在下文中便可以看到，自然的原因乃與經濟的，技術的和社會的原因相連接的。

看了中國耕地與全國地面的比例上極大的參差，就使我們發生一個重要的問

題，就是關於中國的人口與耕地的關係。平常我們研究各國的人口密度時，必須要把各國的耕地面積與人口數量相比較。這種比較，在中國就無從着手了，例如挪中 國來與法國人口密度相比較，中國的耕地祇佔全國土地百分之十二或是二十，而法國——百分之五十三，相差既如此遠，那能談得到比較呢？我們要想得到一個國家人口的密度上明確的觀念，自然並不是把一國的整個土地來比較，而祇取其耕作的土地。可是對於中國講來就感困難了，因為中國沒有正確可靠的統計，關於人口數量也好，耕地數量也莫不如此。就是選擇調查的統計，也免不了此種困難。然而就在這種選擇的調查中，我們至少也可以看到中國農業人口與耕地面積上的相互關係。現在姑且讓我們先看一看選擇調查的統計，並且暫時不必去注意到中國的耕田還要用來飼牲畜的，因為如果注意到這一點，那麼，對於每區域內的牲畜數量也不能不加以留意。

一個美國的農業家開五，對山東的一個區域內的人口密度，定為每一平方英里

的耕地上，有八口三千零七十二人，在山東另一區域內，每一平方英里的耕地上有一千七百八十三人（見開五著 Farmers of forty century），英國的一個中國問題專家斯米脫說；山東的某區域內，每一平方英里內有八口五百三十一人，另一區域內——二千一百二十九人。德國的農業家哇克男就根據了這些統計，以及許多的調查，做出這樣的結論，說中國人口的平均密度，每一平方英里的耕地，有八口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揚子江口中崇明島，每一平方英里的耕地，有八口三千七百人。

調查安徽的一百零二個農村經濟的結果，知道這調查區中每一平方英里的耕地上，住八口二百二十六人（見巴克著 An Economical and Social Survey of 102 farms near Wuhu Anhwei）。

美國賑災會在直隸，江蘇，山東，安徽的二百四十個鄉村的調查，得到下列的結果（見馬龍與泰依蘭爾合著 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省與縣	農村數	人口數	耕田數 (以畝爲單位)	密度 (每一平方英里)
浙江	1	286	1,136.4	2,270
鄞縣	4	—	2,971.6	4,650
江蘇	1	—	474.0	6,880
宜興	5	2,084	4,120	1,770
江陰	17	3,414	(5,900)	2,650
吳江	20	1,372	4,931	(950)
安徽				
壽州	12	3,478	28,843	290
山東				
昌化	20	5,359	11,867	3,000 [註]
直隸				
遵化	18	9,083	20,073	2,010

定縣	24	6,177	24,369	915
邯鄲	18	4,236	25,506	690
磁縣	20	3,363	22,060	550
………5	3,024	7,530	1,450	

(註) 這個數目，在調查時祇按照常地的『畝』，所以很是可疑的。確實的是每一平方方里有人口1,800。

當然，我們不能根據這些斷片的調查而得出總的結論。然而我們至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影像，就是中國耕地上的人口密度，佔人烟稠密的遠東各國之冠。日本每一平方英里的耕地有人口1,322人，印度的邦勃省 (Bombey) 308人，馬特拉沙省 (Madraso) 614人，聯盟省 816人，奔加蘭省 1,162人。挪上面所引的那張表比一比，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北部的人口密度，可與印度相倫比，中部的超過日本，南部的高過於世界上任何那一國，或者除了爪哇的有幾個區域。這裏我們

又想關於中國的人口密度上約略的先講一講，中國每平方英里的耕地內的人口，自北而漸漸增加，愈向南部，人口愈密。其原因實由於中國的南方，每年收成有兩三次，所以每人所需要維持生活的耕田數量就減少了。然而在下文中，可以看到祇是這個原因，還不足以解釋人口密度上的全部的因素。更主要的却在於每地方水量供給的多寡。在江川流通之區，在河水發源的地方，近湖沼的地方，人口密度，就違異常高的程度。這個事實，可以挪印度，日本，印度支那，爪哇的統計來作證。中國也未始不然。在印度，信風所吹到的省份，雨量特別充足，人口也特別稠密。人口密度在其他同一條件下完全與人工灌溉的水量作正比例，這便是中國與整個遠東的人口密度上一個規律。中國揚子江湘江流域的種稻區的人口密度，真足以使調查者大吃一驚。

第二個重要的規律，就是每區內的人口密度，完全依靠該區內收成的多寡來決定。在其他同一的條件下，耕地的收成愈多而能給兩三次者，則人口亦愈密。這種

能夠代表中國人口上特性的事實，也可以拿日本的統計來作證。

就是這第二個原因，可以解釋爲什麼根據各種單獨的調查和親身的觀察所得到的統計，中國南方以至中部的耕地人口密度，超過印度甚至日本。日本祇有百分之十九又六的耕地，能獲得二次的收成，印度——百分之十四至三十不等。我們雖然沒有全中國的統計，可是就根據這些單獨的統計，已可斷定中國的北方，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是每年有兩次的收穫，中部各區的達百分之八十，南方甚至有三熟者。這就是爲什麼中國耕地上的人口密度，超過了印度以至於日本。

這樣講來，中國的土地，應當絕對的和相對的供給更多的人口的生活資料，比世界上任何那一國家的土地。所以中國的人口過剩問題，成爲一切資產階級的調查者心目中的基本問題。英美各國關於中國的最普遍的記載中，沒有一個作者，不把中國的人口過剩看做一切貧窮的來源。這些資產階級的庸夫俗子，帝國主義的辯護者，以及中國高利貸資本的代表們，很下賤的把馬爾賽斯的人口論抬出來。帝國

主義的，高利貸的和中國社會制度的最『聰明』的代表們，不但贊助馬爾賽斯的高見，而且還歸罪於中國的婦人，小孩子生得過多。認爲中國土地生產力的發展，落於人口增加之後，所以造成了一切貧窮之源。把帝國主義，軍閥制度，地主高利貸的壓迫，完全置之度外。認爲挽救中國的唯一出路，便是節制生育。

我們自然用不到和這般資產階級的鄙賤的『理論』來作爭辯。帝國主義不但在殖民地市場上消售一切無用的廢物，而且也把那些殘餘的被打倒了的理論也運到殖民地來。我們不值得來和它作辯論，祇要指出幾種基本的事實，那就不辨而明了。

第一，說中國農家的食口的衆多，祇是一種傳說而完全不是事實。中國農民家庭內的人口平均祇四人至五人而已，這在一切的統計和調查中，都可以看得出來。

第二，中國的生育率，低過於任何世界上那一國家。這也在一切現有的事實和調查可也證明。

第三，中國的死亡率高過於世界任何那一個國家。北京每年一千人中死亡者男

爲三十三人，女爲四十二人。根據不久所發表的官廳統計關於中國衛生的調查，說中國平均一年內每千人中死亡者達三十人（英國祇等於千分之十又四），每年的死亡率平均爲六百萬人，這在世界各文明國家所罕有，其中爲天花而死的每年竟達九十多萬人。中國人平均活三十歲，而英人爲五十八歲。英國嬰兒的死亡率，每千人中平均爲六十九人，而中國則達二百人。大英帝國所給中國的贈品——鴉片，在這方面却起有很大的作用，如果在這樣情形下，還要說中國人口『很快』的增長，那真是無恥的鬼話。

第四，限制生育在中國的確已實行了，它便是採用殺害嬰兒……的方法。多餘的兒童，大部分是女孩，生下來就殺死。哇克男關於這一點在他的著作中，描寫得慘酷動人（見哇克男著 China of the Chinese）。英國的一個女傳教師非爾說，在八十年代的時候，廣東已盛行殺死女孩的風氣（見非爾著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80）。直到現在，廣東很盛行此種『風氣』。我

們在任何那一種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的書籍中，都可以看到中國一歲至十歲的男孩大的多過於女孩，而在其他國家，除了遠東多少國家以及印度外，適是相反。（註：英國女人的數目，超過男人百分之四又二，印度女人超過男人百分之二又二十二）。資產階級的調查者就拿宗教，風俗，『崇拜遠祖』……的原因來解釋這種事實，說女人不能夠傳種接代的，女人不能去膜拜祖宗的，祇有男童才可以。這樣講來，好像中國和印度的女人很自覺的而且預先決定要多生些男孩少生些女孩。甚至美國的教授巴克，也討厭此種論調，他認為男孩超過於女孩，有兩個很明顯的理由：第一，在童年時代，往往看重男孩，並且更小心看護男孩。第二，一部分的女孩都被排斥（就是殺死）（見巴克著 *An Economical and Social Survey of 102 farms*）。這樣看來，問題很明顯的不在於生殖率而在於死亡率。如是還要講中國人口『過快』的增加，那是何等的可恥喲。

第五，天災不斷的毀滅了幾百萬人的生命。

第六，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工廠，作場，礦山的殘酷，使人口上受到很厲害的摧殘。按洛克揮勒研究院最詳確的對漢治萍煤礦公司的調查，知道百分之八十一又六的工人是有病的。湖南有整個鄉村內的男人女人孩子一同在官辦的朱砂礦內做工，慢慢在極不衛生的條件下，把這整個的鄉村都消磨殆盡。（註：見 *Parsons respecting labour condition in China*）湖南的銅礦中，百分之四十的工人是由肺病而身死，碾米廠中死於肺病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上海工廠中，童工做工達十二小時，漢口絲廠中，女工作工十六小時者。我們固然沒有正確的關於中國紡織廠中每一女工在工廠中做工的平均的年限的統計。然而我們知道日本的紡織女工，在比較完善的衛生設備，比較短少的工作日，比較多些工資的條件下，在大反以及其他大都市的工廠中，平均做了一年以上的工，就不做了。我們敢斷定，在中國的礦山中工廠中每年要把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工人拋棄到僧道乞丐流氓土匪之途。中國現代的家庭工業也把工廠生活中的『妙術』，搬運到鄉村中去。有人說，中國有二百萬的

瞎子，大部分都是因爲刺繡……所造成。在中國北部最大的現代的工廠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是患沙眼的（見Shanghai Times 1927年八月二十五）。

第七，中國的軍閥，也各方面設法使人口不要太快的增加。這並不是軍閥所痛恨的革命黨人所造謠，而是大英帝國在福州的領事克萊尼茨對麥克唐納的一個報告中說：

『福建的前督辦李厚基向我說，福建全省，特別是福州和福州的近郊，發生了人口過剩，自然的生產品已不够供給全部的人口。他認爲福建與中國其他各省不同，如果其他省內經常的爆發內戰，而犧牲了浩大的生命，那麼福建就不然，它千餘年來沒有這樣的犧牲人命……福建固然也有戰爭，然而並不像太平天國時把揚子江下游諸省屠殺得地廣人稀那樣的戰爭……我並不願意說李督辦現在也想有這樣的殘殺，然而我敢斷定，李督辦至少認爲這種殘殺方法乃是『自然界』限制人口增加的經常的工具，并認爲在目前情形下，不久有採用此種方法的必要』。

中國的統治階級既是這樣想，再加上了資本主義與軍閥制度緊密切聯合起來以摧殘民衆，那麼民衆自然祇有減少而不會增加，這是很多的細心調查中國情形者一般的輿論。

中國存在有很大的相對的人口過剩，這是毫無異議的事實。在現有的技術水平線下，在現存的社會制度下，在目前的勞働生產力條件下，中國的土地決不能養活現有的農業人口，尤其是城市不但吸盡了農村中大批的剩餘生產品，而且連農業生產者自己生活所必需的部門也被吸去了。

這樣就發生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的相互關係的問題了。我們爲填滿這張『中國的統計的圖畫』起見，必須要提到這一個問題。

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也沒有任何可靠的統計數字。如果我們把各個調查者的材料拿來分析，那也是徒勞無益。一般認爲中國城市人口佔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便是農民。有許多中國的學者，以及英國的，認爲中國的城市人口佔全國人口

的百分之三十。

最後的數目，很顯明的是誇大的。按來華塞爾的統計，法國在大革命以前，根據當時的統計，城市人口爲1,949,000人，而全國人口爲33,000,000這就是說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又四。美國在一八八〇年時，城市人口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九又五，一八九〇——百分之三十六，一九〇〇——百分之四十。一九一〇年——百分之四十六。日本的工業發展確是非常迅速，在一九一三年時城市人口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十三，而祇到一九二七年，已一躍而爲百分之五十。我們很難推測，究竟在工業落後的中國，城市與鄉村的人口關係，還是等於一九一三年的日本呢，還是等於一八八〇年的美國的水平線。

印度，以經濟發展上講來，高過於中國，然而鄉村人口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同是四分之三的鄉村人口都是從事農業的，其餘四分之一則爲商人高利貸，手工業等等。此外有一點應注意的，就是因了歷史發展的過程的關係，中國的城市，

以及一切東方專制國家內的城市，完全異於封建時代的歐洲的城市。如果『在中世紀時，鄉村到處用政治來剝削城市，封建制度因城市沒有格外的發展而來被破壞，如意大利然，那麼城市則到處以價格的壟斷，賦稅制度，行會組織，以及直接的商品交換，高利借貸的經濟方法來剝削鄉村（見資本論第二卷）。』

這就是講歐洲的中世紀。然而在中國，很早的時候，城市就握有政治上的權力。地主是住在城市中的。城市吸收了一部分的地租。商品經濟與貨幣商品關係的很早的發展，使中國已發展了很大的都市，而當時倫敦，亞姆斯坦，巴黎，漢堡，還不過是小小的鄉村而已。『西安，北京，杭州，廣州，在古代歷史上成爲世界著名的大都市』。（註：這是指十二世紀時的中國。不但在中國的歷史家以及馬哥巴羅的記載中可以證實，而且還有阿剌伯的遊歷者和商人如依博巴都特，蘇來曼等等都異口同聲的認爲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是在中國）。中國社會組織上和歷史發展上的特性，使我們能斷定中國的城市人口在全國人口中所佔的部分，比在相同的歷史發

展階段的其他歐美各國以至印度都來得大。

有人認為中國百分之九十以至九十二的人口都是務農的，這很明顯是誇大的，然而有人認為中國從事於農業的，祇佔百分之七十，那也毫無疑義的是太少。正確的數目，定是介於這兩者之間。關於這問題我們暫時不講。現在我們先述中國在帝國主義侵入，資本主義分子強力的深入農村後，城市人口是不是絕對的和相對的增加？是不是發生農民喪失土地的過程？是不是城市數量增加？這都是很複雜的過程。在荒關的山岩中，於八十年中就興起了一個香港的大都市，人口達 510,440。

（註：香港——英國的殖民地，然而經濟上乃是中國的部分。它是依靠中國南方而發展。）荒涼貧窮的漁夫的鄉村，在六十年中一變而為繁盛的上海，有 1,250,000 以上的人口。大連的人口，自一九一一年迄一九二一年，自 20,000 人驟增至 124,000 人，自一九二一年後，城市的发展，更是迅速，一九二六年，有人口達 203,900 人。（大連是日本的租借地，然而經濟上是接近東三省，而且依東三省而發展的）哈爾濱在

一九一一年，有325,000人口，至一九二一年增至130,000人，一九二六年——1949
00人。這個數字，一定還會繼續的發展。直隸省沿京漢路一帶，自一九一四年——
一九二六年中，祇有二百家農戶的小村的石家莊，現在成爲有40,000人口的都市
了。我們眼見得奉天吉林黑龍江，真好比美國一樣快的發展速度。武漢三鎮，在一
九一一年，人口惟有830,000，而到一九二一年，已增到1,468,000。我們很明顯的可
以看到，中國的城市的確是分之於農村而發展。然而我們同時又可以看到，中國的
舊有的大城市，以及這些城市的文化，一天一天衰落和消滅。

按中國政府的觀察，北京的人口，一天一天減少，每年約減一萬人，同時天津
就奪北京而發展。東三省由直隸山東的移民而發展。福建廣東的許多城市，則日趨
於衰落，當時稱雄全國的長安，現在已成荒涼的都市，百萬餘的人口到一九二六年
祇剩80,000人，並且在一九二六年又減少了100,000居民。甘肅的都城蘭州，同樣
已趨衰落。福建的省城福州，按海關統計，一九〇一年爲650,000人口，一九二一

年 320,000，一九二六年 314,000人。

據海關的統計，各個通商口岸的人口的統計，述之如下：—

城市	各通商口岸的人口增加		
	以一千人爲單位		
	一九二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〇一年
牛莊	50	61	65
天津	700	800	800
重慶	300	598	497
沙市	80	90	161
漢口	850	826	1,468
南京	225	2	380
廈門	96	114	300

汕頭	38	66	85
廣州	850	900	900
哈爾濱		35	155
大連		20	116
長沙		250	535
杭州		350	892
温州		100	198

「註」 哈爾濱，大連，長沙，杭州，温州，在一九〇一年前還沒有成爲通商口岸。帝國主義祇一步一步地才握到佔有的權利。一般研究中國對外貿易的調查者，完全沒有看到帝國的在華擴大其經濟活動的區域的漸次性，所以往往得出慌謬的誇大的結論。

蒲樸夫達跌夫曾把中國本部十八省的許多大都市的人口製成一統計表，以一九〇六年爲始，迄一九一六年止。雖然這種統計是多麼的不可靠和矛盾，然而至少可

以看出至一九二六年許多大都市，顯然有衰落的表現：—

城 市	以 千 人 為 單 位		
	一九〇六	一九一六	一九二六
開 封	200	150	—
曲 阜	82	54	85
萬 縣	150	70	83
蕪 湖	137	100	117
南 京	400	376	396
紹 興	500	200	—
佛 山 鎮	500	200	—
甘 州 (當時也是一個重鎮現在已成荒蕪的鄉村)	500	200	—

正	陽 (如甘州一樣)		
蘭	州	500	100
西	安	1,000	200

雖然這些統計是不見得正確可靠，然而毫無疑義地表示出這些城市的衰落的傾向。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同意於蒲樸夫達鐵夫的論據，他認為中國的城市人口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因為中國的都市都比印度以及其他遠東各國還要厲害，集中着一切社會上寄生蟲的階層——官僚，高利貸，地主……。中國縣城的總數亦有達一千五百餘，縣城的人口，普通有15—20,000人，這樣看來，就是不去計算大的城市，那麼中國的城市人口，已有20—25,000,000人了。

給城市發展上以最大影响的便是鐵路。例如京漢隴海兩路的建築，使鄭州分周家口而興起，成爲一個中心的都市。軍閥的混戰，破壞了鄭州，同時也並不能復興周家口。(註：一九二六年的河南，完全在軍閥混戰，土匪猖獗，破壞崩潰的狀態

中，使鄭州百分之三十的人口都成爲貧苦流離之徒。一切工廠的工人，大部分的鐵道工人都離開鄭州而奔逃他處。在中國，一方面興起了帝國主義所創造的島嶼，發展了通商口岸，特別是租借地的興盛，成了工商業匯集的中心，東三省也崛起了許多新的城市，另一方面破壞了舊的城市生活的中樞，破壞了歷史上所形成的商業要道，減少了縣城的範圍，以及它的政治上經濟上所影響的區域。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過程——新的中心區域的發展和興盛，舊的衰落和破壞，是相互平行着的（註：我們在上列表中關於中國各城市的人口數量，大部分都是大約的數字，而不見得是詳細調查的結果。就是在外人的租借地，在英國的殖民地如香港，也不容易得到正確的統計，這是因爲工人數量的流轉不定的緣故。然而關於城市人口數目，無論它如何的不正確，然而總比農村人口統計要相近得多，它至少可以給我們以一般的概念）。

從上面所講的，我們可以得出下列的結論：

第一，在研究中國的土地關係時，決不能使用中國農商部的官場統計（註：中國農商部的統計上，還發表關於牲畜的數量，各種禾本科植物的生產的數量，然而據我們實際去調查棉花，茶葉，豆類，米的結果，知道官廳的數字，不但不合實際，反而使研究上更加上一重困難。例如關於茶葉的出口，往往某區域內的茶葉出口的數量，超過這些區域內的收成的數量三四倍。我們知道世界上祇有萊因的與東京的酒，才有輸出超過於其生產，然而這也是用贗牌的方法才成功的）。

第二，農商部的統計，決不能給我們甚至大約的相近的關於耕地的以及耕地與全面積的比較的數字。至於講到各部分的農業人口的土地分配，那麼官廳統計中的數字，祇能代表一種傾向，而不是實際的數目。

第三，我們找不到關於人口數量的正確的統計，同時也沒有關於城市與鄉村人口的比例的數字。

我們認為應當把中國官廳統計的殘屑，永遠地拋棄，丟開一切空洞的不合中國

條件的討論和『分析』，而開闢更切實研究的道路。我們決不能根據這些無所謂的土地面積的統計。尤其是這些統計是不可靠的，而去『分析』中國的土地關係。甘肅與黑龍江的農民有田五十畝者，祇稱一個貧農，而在廣東，農民掌有五十畝土地者。至少稱一個富農，如果土地的位置優越時，還可稱為地主呢。在東三省。普通都是一畝地上，每年祇有一熟，而中國的北方則二年中可有三次的收穫，揚子江流域，每年有大熟二次，小熟（亦稱副熟）一次，南方則一年有三四次收成，其中一次或二次是米的收成。所以單單以土地面積來比較，還不足以解釋階級分化上，經濟上技術上的分別，反而更使其糊塗不清，所以以前南京東南大學的農村教授巴克是很正確的在他的很有價值的調查中，提到『收成』畝的問題。所謂收成的畝，就是代表一年中真正耕作的土地，同時一畝可等於二——三，甚至有些地方是四個收成畝。巴克教授曾在直隸鹽山縣調查過一百五十個農民經濟（註：見巴克著 An Economical and Social Survey of 150 Farms Yenshan Country Chih Province China）。我們在

文中，還要一再提到這個調查的結果，現在姑且先講他所調查的土地總數。這一百五十個農民經濟的土地總數3,671畝，其中可耕種的3,433畝，其餘的都是不能種植的。這3,433畝等於3,333個收成畝，就是說這些耕地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三，每年都有兩次的收成。仍在這位巴克教授所領導下，曾在安徽蕪湖附近，調查過一百零二個農民經濟。結果知道這些農莊中的土地4,466畝，等於3,364個收成畝，就是百分之八十四又一的耕田，每年能有兩次的收成。愈向南方，每個收成的畝的數量，愈超過面積的畝。在揚子江流域，所謂小熟，佔有極大的意義。除了種稻外，又種金花菜，瓜類，豆以及其他蔬菜等等，這樣使收成上便大大地增加，更使土地的數量與收成的數量的參差更加複雜。廣東的收成畝的數量，超過其他土地有三四倍。這種情形已給一般民衆以很深的影像，例如中國南方的農民，講到土地大小時，經濟力量大小時，從來不講某人有多少畝，而講有多少担，這已可見一斑了。他們所講的多少担，就是指某田有多少担的收成，有多少担的地租，這些担就是指米的担

數，日本在大米華的封建時代，大地主的分類，不是按多少町〔註二〕來計算，後來就以担〔註一〕來計算，他們從農民那裏所取的，也就是米。

〔註一〕「町」等於 0.99 海克脫。

〔註二〕日本「担」(Kokoo) 約等於俄國十個普特。

馬克斯講到歐洲封建經濟時，曾指出說：『歐洲一切的國家，封建生產的估量，是以儘量多的被保護的農民數量的土地大小來區別。封建統治的力量以及其他一般的君主的力量，不以地租的數量來決定，而以百姓的數目來計算，而百姓的數目是以經營獨立經濟的農民來計算』。(見資本論第一卷) 反之在東方，地主的力量，不以百姓的數目而以地租的數目來決定。這種區別，我們認為可以這樣來解釋，歐洲的封建時代，還有巨量的墾殖的積蓄地，所以農民勞動力之對於封建地主，比農民之對於土地還要難得。這種墾殖的積蓄地和空餘的土地的存在，到處足以減輕地主的困難，而在東方，因為需要人工灌溉，所以沒有空餘的土地的積蓄，

并且土地的緊狹，在最早的時候已成爲最主要的因素了。所以歐洲的農奴制度時代，甚至在剝削農民最殘暴的時代，也是比亞洲的農民佔得更便宜的地位。然而在東方，約制農民祇在這種時代才發生，例如因了破壞，混亂，地質枯瘠的緣故，農民都拋棄了自己的土地。離開了自己的經濟，而流離奔跑成爲羣衆的現象。西方的地主，則時時刻刻要想約制自己的農民。

一般的來講，收成的成色不但要依靠土地自然的質量，或是氣候的條件。在同一省份內，甚至在同一縣份內，可以看到收成上有極大的差別。以前南京的東南大學曾在江蘇南部各道內進行過關於收成的調查（見中國經濟月刊上 Land Tenure and Farm Products in Southern Kiangsu），結果知道，在崑山縣，每畝的收成，有 1,36 担，其鄰近無錫縣—4,00 担，就是比前者多過三倍。在如皋的小麥，一畝收 0,32 担，而在附近一縣常熟則有 1,183 担，幾乎超過前者的六倍（見 Chinese Economical Bulletin No. 273）。

據廣東大學農科的詳細調查，知道在最好的土地上，每畝收成，有米 100 担，中等的有 80 担，下等的為 100 担。

好的土地的收成，超過壞的有三倍，並且這兩者都是灌溉的潤濕的土地。如果我們要估計濕地（就是灌溉過的）與乾田（就是不灌溉過的）的收成的差別，把最壞的乾田的收成做單位，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下列的比較：

		濕田	乾田
上等的土地	6	3	
中等的	4	2	
下等的	2	1	

這裏我們要注意。廣東的濕田，每年收稻兩次，有些地方是三次（第三次或第四次已不是種稻了），然而乾田則祇有一次的收成。

我們回想馬克斯在分析地租的時候，他把土地分爲A、B、C、D四種，這四種土地的同面積上的收入，可分做1:2:3:4。昂格斯認爲馬克斯『原稿所舉的例子，不一定靠得住』，『因爲所定的差別，開始已太誇了』（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分第253頁）。然而在中國，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種差別，不但自一至四，而且有自一至十八的。我們知道收成上的很大參差，不但在中國大部分地方如此。就是在以米爲主要食料，而人工灌溉在農業上佔主要地位的其他國家，也未始非如此。

羅馬的『國際農業研究院』，估量全世界每年共產出糙米量爲440,000,000,000鎊，其中白米佔300,000,000,000鎊，能作爲人類消費之用。整個的遠東各國如中國，印度，爪哇，日本，高麗，總計有800,000,000人，佔全世界人口之半，皆以米爲生。中國古代的文字中，農字便是指米的生產，米字與麥字，含着同一的意義。中國人相互碰到的時候，不問『你好？』，『今天好？』，而問『你飯吃了麼？』，所謂飯就是指米。中國的北方，以及東三省，以高粱，麥，黍爲主要食料，所以怪不得

中國糧食的貿易，近年來有入超的現象，中國不但要輸入米，而且還要輸入麥與麥粉。甚至黃河流域的南部，有些地方也已開始種植馬鈴薯。甚至直隸省也開始種稻（乾田的）了，受了日本的影響，南滿州的米的生產，也漸漸成爲主要的部門。總言之，米便是中國農業上的主要的因素，不但是中國而且是整個的遠東，比歐洲，美洲，澳洲的麥，更爲切要。

我們已經知道，米的生產，在農業上含着很重要的特性。這種特性，主要的就是表現在收成與土地面積的關係上，使同樣的土地面積上產生極大的參差。我們的下文，將更詳細地去分析這種特性的原因，以及它所引起的結果。

在東方，尤其在遠東，農業生產上的天然條件，就是沒有經常的水量供給的保障，足以使直接生產者不能恢復其勞動條件與勞動力。自然很明顯的，技術與自動的水量調節，在任何那一種社會制度下，都具有其作用。乾燥的氣候，不經常的雨水供給，使東方的農業祇有建築在人工灌溉上，才會發展起來。這種事實，給回教

的東方人以深刻的影像，他們『確定了對土地的觀念，看做回教徒國家的財產，這國家等於宗教的公社，大家相信土地祇是分給各人使用而已。同樣的影響到對人的見解，他們認為人便是無條件的服從宗教政治和國家的公社的一分子。爲了要消費巨量的社會勞動來創辦社會事業，那必須要使全社會無條件的服從宗教上，軍事上，經濟上統一的領導，嚴格地節制社會的和個人的各部分的生活，絕對地尊重宗教的信條而承認一切對社會有利的要求。回教徒的國家的一切自然租與整個的服役制度，完全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見舍佛洛夫著東方問題第三十九頁）。

在印度，在中亞細亞，在中國，也受到這種因素的影響。

從波斯一直到印度，從埃及一直到中國，凡這一切的國家中，都有這樣一種俗語，說『沒有水便不能種田』。這許許多多興盛的和衰落的東方國家以至於波斯，印度，大家都知道，它們的國家，都是代表灌溉的農業國，『沒有灌溉，根本就沒有農業了』（見昂格斯著Anti-During 第七十七頁）。昂格斯在這一句話中，反響出東

方民族的腦海中深深的印像。東方的生產上的這種自然條件，就影響到生產方法，因為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這些自然的條件，便變成爲歷史的社會的條件了。

自覺地調節水量供給以保障農業上經常的狀態，以預防社會不致發生飢荒，以保障複生產的實現，便是東方農村經濟中的最主要的特點與必要的前提。

我們講到這一問題時，首先要論到東方民族的主要的食料——米的耕種。自然，我們並不是專去考究生產的什麼，怎麼樣生產，在什麼技術條件下去生產。然而生產上的自然條件，乃是生產的條件和前提，它轉變而成爲歷史的條件，它對於整個東方，尤其是中國的社會關係的形成上，有極重要的意義和影響。

上述種種，不但是研究統計上的方法論，而且也就是將來編製統計上的方法，同時也就是研究土地關係上的方法。

第二章 水的意義

菲律賓的農業大學的教授科博蘭，曾做過一部關於米的研究（見 Coupland, Rice）他指出米的特點如下：

『米與其他植物一樣，需要滋養與呼吸。爲要促成這種生活必需過程的實現，那也是與其他植物一樣，一定要有水分。因爲植物的滋養和蒸發——就是呼吸，沒有水是不成功的。然而米的滋養和蒸發，需要更多的水量，超過其他一切的植物。』

『世界上最主要的禾本科類——米，在停積的水中，最容易生長。米的水量的供給，是由生產者自己去進行，自己去調節，所以灌溉便是米的耕種的技術……：在米的生產中，水比其他氣候的條件更重要，如果有很好的灌溉，那麼米一定比世界上任何那種作爲主要食料的植物都來得有希望（見科氏前書）。』

『如果那些地方的水量供給很完備，那麼米的生長就不用雨了……，如果那些地方缺乏了灌溉，那麼米生長的能力，受到很高的熱度和其他有害的影響，而一定會降減。』（見前書）

『除了水量不足外；米有時還要受到水分過多的損害，在遠東各國，水災和風潮常常會損害巨量的米，其數竟超過意大利，美國全年的收成量。』（見前書）

這樣看來，米的生產是需要水的供給，而且是經常的供給。

米生於水而熟於水。水量須高出地面四英寸至二十英寸之深。美國的農業學家加米斯說，菲律賓島上，米在成熟時期中，需要水量四十四英寸之深。在加里福尼亞，需要更多的水量。

這就是米的第一種特點。

另外一個米的專家，西班牙的學者墨哀士，製成一張統計，關於幾種主要的禾本科植物在土壤中吸收多少營養的物質。這統計中說明每一海克脫的土地上所得的

經常的收成，需要有多少數量的營養物質（以啓羅克蘭姆計算），或者每一百啓羅克蘭姆的幾種禾本科植物的生產，要有多少數量的營養物質：——

禾本科植物	每一海克脫土地上的經常收成				每一百啓羅克蘭姆的生產	
	硝酸鹽	磷酸鹽	石灰	鉀	硝酸鹽	鉀
小麥.....	138	74	62	190	4.31	1.94
大麥.....	86	79	42	93	3.93	1.93
燕麥.....	126	78	38	129	5.06	1.52
玉蜀黍.....	65	29	28	82	2.27	0.95
黍.....	63	56	31	112	2.62	1.25
米.....	97	26	27	62	2.41	0.70

從上面的表中，我們可以看出米吸取土壤中的有機物質，比其他植物爲少。這就是米的第二種特性，這種特性就可解釋爲什麼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國家，都以米爲生。

然而米與米中間也有極大的差別。各色各樣的米，不下數千種。在瓜哇，在印度支那，在日本，計米有一千種，菲律賓——3,500種，印度——8,000種。中國的米，不知有多少種類。米的分類上最主要的區別，便是生長時所需的水量。根據水量的多寡，而分成各種類別，然而主要的可分為兩大類，一是乾稻，一是濕稻，所謂濕稻就是經灌溉的，乾稻乃是未經灌溉的。一切運到城市的市場上的，都是灌溉過的米，乾稻的米祇是供農民自己的消費。然而灌溉過的米的生產，比較有利，因為米的本身，乃是一種濕地的植物，並且濕稻可減少遭遇氣候上的意外。

主要的便宜，就在於灌溉田的收成，多過於乾田，濕地每年能產二次三次以至四次的收成，然而乾田則一般的都是一年一熟的。

乾田和濕田的分別，深深地印在遠東各國人民的腦中。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當講到土地的時候，他們就記得什麼種類的土地：乾田還是濕田，灌溉過的還是

未經灌溉的，稻田還是乾田。這種區別，甚至在各國的以及中國的官廳統計中也分耕地為乾田和濕田。國家的富裕的程度，就是要看乾田與濕田的比例來決定。

現在我們試造一張關於各個主要的產米國家的乾田和濕田的比較表（以一千萬單位）：

國 名	乾 田	濕 田	由乾田變來的濕田
日 本 (以町為單位)	3,045	3,053	271
高 麗 (同上)	1,560	2,820	202
台 灣 (同上)	376,	397	無統計
菲 律 濱 (以海克脫為單位)	1,113	371	559(限定的)
暹 羅(註一) (以畝為單位)	300	5,850	無統計
瓜 哇 (以海克脫為單位)	2505	457	300 471...(限定的)

在英屬的印度：中印度高原的濕地佔全耕地 6.3%，中部平原的恆河流域——32.1%，東部平原的恆河流域——44.7%，西部平原恆河流域——30.2%，東邊的喜馬拉雅山的山麓一帶——28.7%，西邊的喜馬拉雅山麓——14.8%。總計起來，種稻的田佔全耕地的百分之九十，其百分之七十五的稻田是乾田，而祇百分之二十五為濕田（註：這些統計數字是很可疑的，它祇是根據於估量而非切實的調查。這些區域內的灌溉方法是非常原始的）。然而毫無疑義的，印度在英人沒有侵入前，濕地的數量一定比現在多呢。

（註一）暹羅百分之五十五的土地是用很原始的灌溉方法。

在馬來羣島的四個主要的國家，吉德，吉連丹，丕利斯，丕刺克中，稻田有 600 萬英畝，然而灌溉田與未灌溉田的比例，我們却不知道。有一件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就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剝削馬來島已到了這樣的程度，全馬來島的土地，祇有百分之十六，是種稻的土地，其餘都是為橡皮和其他的農場所佔據。荷蘭本家

在瓜哇，使瓜哇的適於耕種的土地，祇有3,263,000(海克脫)為稻田，其他如檳皮，茶，玉蜀黍，薯類，規尼樹 Quinine，煙草，反而佔據了3,627,000海克脫，後者所佔的土地很迅速的擴大，并且奪取稻田而擴大。

美國的農業專家開五說，中國種稻的濕田有78,073平方英里，乾田——4,004平方英里。按他講來，中國濕田佔全部稻田的百分之九十五。這很明顯地是誇大的數字。中國農商部在一九一五年關於此項的統計(以畝為單位)如下：

省 名	灌溉過的土地	乾 田
京畿區.....	14,032,878	509,469
直 隸.....	77,454,013	4,639,406
奉 天.....	48,707,036	2,419,573
吉 林.....	41,205,424	3,011,333

黑龍江	22,700,488	2,172,199
山東	254,879,996	1,882,720
河南	348,496,062	56,498,645
山西	56,095,086	1,455,675
江西	136,535,944	4,506,270
安徽	29,789,937	2,581,564
江蘇	34,650,691	4,663,952
福建	22,208,782	4,290,517
浙江	27,558,737	6,431,154
湖北	121,680,446	3,237,217
湖南	229,536,301	7,658,407

陝西	31,176,763	814,895
甘肅	26,856,803	379,512
四川	12,897,795	812,115

我們對於這張統計，不敢給以多少的價值，因為根據實際的調查，中國的北方如東三省，直隸，山西，河南，灌溉的作用，遠不如南方的重要。有一個統計告訴吾們，廣東的濕稻田與乾稻田的比例為 90:10，而另一個調查廣東東部二十縣的統計，則為 70:30。我們應當知道，中國濕田中又分為二種，一是『平田』就是可以排水的土地，收稻後還可以耕種其他的植物，一是『低田』，就是排水建設破壞的土地，所以此種土地祇合於種稻之用（註：低田，乃是中國農業上灌溉與排水日形破壞的結果，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低田每年祇能收穫一次。按東南大學的調查，江蘇南部三十五縣，有土地共 40,500,000 畝，其中乾田佔百分之十八，平坦的濕

田佔百分之七十三又三，低窪的濕地佔百分之十八又七。自然，我們不能單單依靠這偶然的調查，而給全中國下一個總的結論。（註：中國愈向南方，灌溉過的土地愈是多。在河流的附近，湖沼的四周，灌溉的土地，竟佔全耕地的百分之二百。我們上面已經講過，灌溉田與乾田的比例，對於某區域內人口密度上有最主要的影響）。

濕田每年中不但能有兩次的收穫，甚至有二三次不等。麥子，大麥，珍珠米，黍，每年祇有一次的收成。然而米很快就能成熟。在菲律賓濱，米的成熟時期，依種類和其他條件的不同，有九十四日至二百二十一日之參差，而平均則為一百六十一日至一百八十日（註：見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一九二一年第三十七期）。在印度，早稻的成熟祇七十五天，平均則為七十五至一百日，晚稻則需一百二十日。然而印度支那的梗保其安種的稻（最好的稻），則須十個月才成熟。在日本的北部，就是濕田也每年祇有一次的收穫。日本一九二一年3,013,000町的濕田中，祇有1,196,000町才有一年二次的收穫，其餘1,816,000町則亦年穫一次而已。中國的

稻田，以至濕田，亦隨省份的不同而有差別。早稻的成熟，祇須四五月。這是一種質量不好的稻，他們祇是爲了自己消費而耕種的。這種稻往往在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播種，而收成則在九十月間。好的晚稻，其成熟期多過於五月。收穫之後即種一種冬季的植物（見 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No. 37）。上面所講的是指中國中部諸省。在廣東則不同，播種往往在三月，而收成則在七月。第二熟則在七八月間播種，十一月十二月間收穫。在排水建設完備的地方，當第二次收成前熟排去了水量，然後在十一月時就種麥子，油菜，白菜等。第三次的收成就在二月裏。這很短促的成熟期，便是米的最好的特點，它能使國內的農業資本很快的流轉，縮短了農業生產上的勞働時期。我們據報紙上的消息，知道在美國的福特模範農場上，現在企圖縮短麥的成熟期，使其能在五十至六十日中就能收穫。這種計劃的成功，就能使農業上發生真正的革命。然而在米的生產中，如果不是幾千年前，那一定幾百年前早就發生過此種革命了。至少在漢朝的時候（紀元前202年到紀元後220年），我們

已經看到每年有二次的收穫，一是米，另一種是其他的植物，在一七二七年時，皇上的諭旨中，有這樣的記載：『吾們聽到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一年能有兩次米的收穫。』註：見李萍華著《The Economic History 417頁》。

從上面看來，米的大規模的生產，祇在有水的地方才有可能，才有利益。有些國家，祇在最近的時候，才開始種米，惟祇限于江河流域而已，例如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祇在薩克刺門都河的流域，加陸鈴州祇在密西皮河流域，才能以米為主要的植物。日本的稻田也在江河的流域。印度勃刺麥普脫拉河與恆河供給稻田的灌溉。中國的揚子江與湘江，印度支那的湄公河，都是廣大的稻田的水量的淵源。如果古代的歐洲的文化是海岸的沿海的文化，如果『希臘以前的古代文化是海岸的文化，無論那一個城市，都離海不過一日之遙』（見麥格斯維爾著經濟史第2頁），那麼種稻的國家（中國亦在其內）的文化，便是河流的文化（註：日本的河流，供給水田的灌溉以百分之六十四又四的水量，蓄水池供給百分之二十

又九的水量，祇有百分之十四又七的水量是以別種方法取得的，主要的便是井水。這樣的統計，在中國我們却找不到，但是按我們自己的觀察，知道中國的南方，大部分的水量是從河流中取來的，常常是由許多農民聯合起來去取得的，而在北方則用人力從井中取得的，這便是北方與南方灌溉上的一種主要的區別。中國發源於渭水流域，發展至長江流域，更伸張到珠江流域，一直到廣東，中國的城市便是臨近河流的城市，就是這種情形，給中國歷史發展上以很深刻的影響。甚至拉狄克同志——他是一位很聰明的很堅決地反對所謂『水的理論』的一個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人口依黃河，揚子江，珠江流域而愈見稠密，因為自然的條件和耕種的技術，不允許他們在不可以灌溉的地方去經營農業』（註見拉狄克著中國歷史上的根本問題，該文登載在一九二七年的新東方雜誌第16—17期47頁）。

拉狄克同志在他與資產階級的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麥格斯維巴爾爭辯中間，曾否認水的作用與意義，否認維巴爾關於中國國家是由於水作門所產生的解說。拉狄

克代替此種理論而提出自己的理論，認為中國的國家是由於與遊牧民族作鬥所產生的。拉狄克的辨論固是聰明，然而亦不免於差誤。中國的官僚統治階級的產生，不但是建築在與遊牧民族作鬥的基礎上，而且是在於與水作鬥上，並且不但與水作鬥（水災），如拉狄克對維巴爾的理論的了解，而且是為水而作鬥（灌溉）。中國的官僚統治階級的產生，不但因了要與遊牧民族作鬥（如組織軍隊，建築長城等），而且為遊牧民族而作鬥（如墾殖收服未開化與半開化的民族，使他們從遊牧生活變而營固定的農業生活，現在的福建，貴州，四川，雲南等省，至今還有這些民族的殘餘）。中國的官僚統治階級並且是發生在初期的商品關係的基礎上。中國初期的商品經濟，是兩種經濟組織結合的結果，一是中國的農業經濟，一是遊牧民族畜牧漁獵經濟，並且因了天災的結果，給中國內部的發展的交換經濟以第一個有力的動機。這個官僚統治階級，一方面發生在經營強度的水田經濟與指導這種經濟的必要素上，在反抗外來遊牧民族的進攻的必要上。另一方面發生在遊牧民族轉變為營農

業生活的基礎上。同時它又是發生在要組織和保護商業的道路，後來甚至海路貿易的道路的基礎上。這樣看來，中國的官僚，很明顯的並不是什麼超社會的，什麼理想的『德謨克納西』，完全不像這般牧師教士——所謂中國的調查者——所講的，也不像中國的這般專制與官僚混合的下賤思想家們所想像。中國的官僚統治階級不但與土地佔有者相連繫着的，而且它本身又變成爲地主（雖然這是要禁止的，然而在中國整個的歷史上，都可以看到關於這方面的禁令，不過一紙空文而已），不但與商業資本相連繫的，而且它本身變成爲大商人，有時握住了跌的貿易的壟斷，有時掌着絲的貿易的壟斷，一直掌握着鹽的貿易的壟斷權，在帝國主義侵入前它一直拿着對外貿易的壟斷權，而最主要的能在糧食市場上握着支配的權力。積穀倉的制度——這是遠東歷史上所形成的一種社會保險的形式，以補救飢荒水災旱災等的不幸結果，這種制度，實際上便是保障官僚在糧食市場上完全的統治，使它有握住關節一切主要的食料的價格的可能，如是便在整個的國內市場上完全掌握統治的權力。

這官僚不但與高利貸資本相連繫，而且它本身變成爲強大的高利貸者。它經過了積穀倉的制度，內地銀行的系統，與當舖，完全來制服一切商業，手工業，農業與交通事業。所以廣大的羣衆運動，其波及的範圍與劇烈的程度，確是歷史上所罕有，浩大的農民暴動，在中國歷史上屢次奏演其推翻這個三角聯盟，這個可怕的殘酷的官僚高利貸，商人高利貸和地主高利貸的聯盟，然而當着農民鬥爭的浪潮崩潰的時候，城市又捲土重來而坐鎮鄉村，並且在城市中也找不到可以作爲農民運動的領導和同盟的階級隊伍。當着土質枯瘠，戰爭，外來的侵逼，天災，流離失所，商業道路毀壞，海盜蠶起的時候，而使商品經濟淪爲自然經濟，富着地主，高利貸的壓迫，商人的榨取，官僚的苛征暴斂，幾世紀的無限制的剝削，使農民不能把他『剩餘』生產品（從他自己消費必需中所取出的剩餘）拿到市場上來，這樣使農民經濟『向低落地轉變爲自然經濟，當着徵取賦稅與高利貸的利息（大部分的賦稅都是用自然品的形式來支付的，高利貸用直接的商人交換的方法去榨取剩餘生產品）的轉變爲貨

幣支付上稍微感到困難的時候，那麼『國家很容易從形式上很高很富很發達的狀態一落而為純粹的自然經濟的狀態』（『註』見維巴爾著經濟史第41, 42, 52, 97頁）

拉狄克同志很正確的認定麥格斯維巴爾關於中國的理論是謬妄無據的。維巴爾企圖說明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建築在氏族公社上的經濟制度，這簡直是太可笑了。他說『中國直到現在還有半共產的民族經濟的存在』，『中國民族的力量這樣的強大，能夠抵制官吏的苛征』，『中國因有氏族公社的經濟制度的統治，所以行會在經濟上起有很微小的作用』，這種種的論據，祇令人可笑而已。幾千年前中國的商品貨幣經濟和高利貸老早征服了氏族公社了，這氏族公社的遺跡，祇在南部幾省中還存留着滑稽的形貌而已，實際上這是一種很可恥的用氏族關係的假面具來遮蓋它最殘酷的剝削形式，強佔民族的祖代的土地，欺詐，高利盤剝而已（『註』見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真理報上潑潑爾的論文）我們的同事姚爾克華林等在廣東調查，根據他們的經驗，就可以認識在商品貨幣經濟的條件下，高利貸資本的統治下，地主的壓迫

下，所謂『氏族公社』，究竟什麼一回事呢。自從昂格斯後來，我們就知道氏族公社是與市場是各不相容的，它與市場交鋒的結果，一定會分崩離析，而不能支持的。

拉狄克同志對維巴爾的理論的一部分，加以否認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不正確的，就在於否認維巴爾所講的『灌溉對於東方國家的經濟（中國，前亞細亞，埃及），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灌溉與水量的調節，是一種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經濟』，『就是由於這一點，所以在這些國家便有建築方面的和水利方面的官僚的產生』（註：見維巴爾著經濟史第2頁）。維巴爾很錯誤的把東方的灌溉與西方的削平森林相對立起來。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在菲律賓島上，有許多氏族掘去公共的森林而耕種稻。這種方法菲律賓語名之曰 Cainan，十年以前，這種事情常常可以看到，後來因了政府為保護森林而下令禁止。他們掘去森林，在旱天時用火來燒田，至雨季時則下種。他們在田中用手來掘成爲孔，然後置種子於其中。他們的耕種，個人的與公同的都有的。像這樣的方法，在印度的山岡一帶的民族，馬來羣島都有的。印度支

那的山崗一帶很普遍的採用。）

實際上關於東方社會的經濟的解說，並不是維巴爾所『想出來』的，而是馬克斯昂格斯所倡出來的。這完全不關維巴爾的事，維巴爾祇是借用馬克斯的這個理論而已。

馬克斯在一八五三年六月一日致昂格斯的信中，詳細分析法國的遊歷家倍爾烏關於『大蒙古領土』的記載，他說在這些國家中（就是倍爾烏所指的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執政權者便是國家一切土地的唯一的主人翁。『倍爾烏對東方各國的土地制度的基礎，很正確地看到東方沒有土地私有財產的存在』，『這便是了解東方社會的真正的鎖鑰』（註見馬克斯昂格斯書札第64——65頁）

昂格斯給馬克斯的覆信中（一八五三年六月六日）寫着：『土地私有財產的不存在，便是了解整個東方社會的鎖鑰。一切的政治的宗教的歷史也完全包括在這裏。爲什麼東方民族甚至不能進到封建的財產呢？我覺得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氣

候，地質，特別是由於一條大沙漠，從察哈爾大沙漠經阿刺伯，波斯，印度，韃靼，一直到最高的亞洲高原。在這些地方的農業上的首要條件，便是人工灌溉，這是公社或是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的職務。東方國家的政府往往祇可以分三部：財政（國內的搶掠），戰爭（國內的搶掠與向外掠奪），社會工作（注意社會的再生產）。英國政府的管轄印度，對於第一第二兩項，比較可算更多些資產階級的氣味，可是對於第三項則完全拋諸天外，所以印度的農村經濟就崩潰了。土地是由人工來使其肥沃，如果水的供給衰落了，那麼農業也隨之而衰落；就是這一點可以解釋一件很顯明的事實：往往有整塊的區域，在開始的時候，墾殖得非常肥沃，而現在呢竟變為一片荒蕪的沙漠地（如帕來爾，彼得爾，依曼（在阿喇伯西南），埃及的有些地方，波斯，印度斯坦）。還有一種現象也可以拿來解釋，就是祇要一次蠻橫的戰爭的蹂躪，已足以把這個國家內的人口大肆摧殘，消滅其文化達數百年之久。

這裏我們暫時不去研究，究竟在上述的國家中，有沒有私有財產的存在，同時

也不去探求在中國有沒有土地私有財產的存在。我們先來注意昂格斯所認為含有極大意義的人工灌溉問題。馬克斯對於昂格斯關於人工灌溉意義的論據，在資本論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爲了經濟上的利益而必須要由社會來管理某種自然的力量，需要大規模的來利用此種力量，或是藉人力的建造來遏制此種力量的破壞作用，這在工業歷史上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埃及，倫巴爾多，荷蘭或是印度，波斯等國家內的水量調節，就可作為上述的例子。這些國家用人造運河來經營灌溉，不但能供給土壤以植物生長必需的水分，而且在泥水中還夾着山上帶下來的礦物質。在阿刺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與西西里島，當時工業的興盛的祕密，就在于河道』（註：見馬克斯著資本論第一卷第496頁附註）

在資本論的這一段的附註中，馬克斯更補充地說：『建築在不相連繫的小的生產組織上的印度國家政權的物質基礎之一，便是水量供給的調節。印度的謨罕默德的執政者，對於這一點確比英國的承繼者更看得清楚。我們祇要記得一八六六年的

大飢荒，在暹羅的孟加拉，犧牲了幾百萬的印度人。」。

這樣看來，不但昂格斯，而且馬克斯也持着這種意見，認為水量供給的調節，便是印度波斯等國家的統治農民的政權上的一種物質基礎。不錯，昂格斯在他的理論結構中沒有講到中國。然而在中國，水量供給在整個經濟系統上所起的作用，遠勝過於印度，因為印度的信風至少能夠保障國內一部分的水量。

盧遜堡對於埃及與阿耳日利亞的灌溉的作用和意義，曾給以很正確的估計。在她關於歷史方面的著作中——講到資本侵入殖民地的歷史，那麼她的著作，至今還是舉世唯一的——屢次地提到英國人（不但是英國人）『怎樣的肆無忌憚地毀壞印度各省內的古代河道的系統』，如是使成千百萬的生命都墮入餓鄉而皆成餓殍。『同樣的在波斯，在埃及。波斯與土耳其的封建制度，同樣的進行摧殘，好比法國帝國主義在阿耳日利亞，在印度支那，荷蘭人在爪哇，英人在馬來島。不知犧牲幾許生命所造成的浩大建設都趨于崩潰了，在這崩潰的廢址上將葬送不知幾百萬的生

命』。(註：見盧遜堡著資本的積壘第383頁) 盧遜堡很正確地指出：『資本主義殖民地侵略的特殊的方法中，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侵入印度的先鋒便是英國人，他對於印度經濟上的各種社會與文化事業，看得漠不關心。阿刺伯人，阿富汗人，蒙古人在印度曾做過一番浩大的河道建設的指導，並且協助這種浩大工程；他們曾把印度劃分道路，建築橋梁，開鑿井池。印度的蒙古朝的祖先天馬爾與泰默萊曾經很切心地留心印度的地質，灌溉，道路的安全與旅行的便利』(註見資本的積壘第384頁)

盧遜堡曾引用英人威爾遜的一句話：『當東印度公司和蒙古皇朝開戰的時代，更可以說在我們英國人統治的時期中，印度的這種建設已大大的衰落了』。

好像笨牛一樣的帝國主義者，從來便是慣用歐洲式的農業技術，而不懂得亞細亞勞働方法下的水田經濟的意義(註：作者在這裏應當說明的，就是關於在回族的國家中，水田經濟的適應沙漠田經濟問題，舍弗洛夫同志曾有很好的研究，發表在東方問題雜誌上，作者關於水田經濟的論據，主要的都是從他那裏取來的)。它祇

是後來才慢慢地覺悟到恢復灌溉建築的必要，這樣才能夠在殖民地很順利地進行剝削。沒有生產就沒有剝削，既在要生產，那就少不了生產的前提。所以在埃及，英國人代替用牛來拖水車，而採用蒸汽機來取水。爲要調節尼魯河的水流，所以建築了巨大的水閘。把河道的支流從33,000啓羅米突增到87,000啓羅米突。（註：見資本的積壘第47—48頁）在十九世紀初葉，荷蘭人曾想在爪哇用土人的力量來創造『濕田』（曾頒佈告示，誰能創立人工灌溉者，則享受這些灌溉的新地的永遠承繼的土地私有權），以與『乾田』相對峙，當時的乾田，尙由土人以公社形式來耕種的。農場的擴大，以及轉變到甘蔗，橡皮，煙草，茶葉，規尼皮的生產，使爪哇發生了大飢荒，勞働力滅亡無數，因之在一八八五年荷蘭人便開始進行灌溉的建設。至一九一十年，584,000海克脫的土地已具備了灌溉的河道，并預備再建設河流，以灌溉300,000海克脫的土地。近年來英人在印度，也開始墾闢新的河流了。英人辦理此項事業非常的遲緩，然而印度目前農村經濟的恐慌，使英國帝國主義不得不用心來建

立灌溉的設施。現在在印度，進行着兩個浩大的工程。一是在舍脫爾河流域的賓甲，創造一個巨大的灌溉的建設。在一九二六年末，能供給5,000,000英畝土地的水量，到一九三〇年，這個灌溉的系統可以供給3,000,000英畝的水量，到一九三五年這項工程，才告終結，預備可以灌溉5,500,000英畝。另一個工程則更加浩大，在印度河流域，設立5,000英里的灌溉的河流800英里的排水河流。第二個計劃，預備在一九三一年完成，這樣可以把5,000,000英畝的荒地都變成肥沃的耕田，使農業生產上增加2,500,000噸的穀類生產品。讓我們今後來注意一下，究竟英國帝國主義如何來處置這些新的土地，如何來造成奴隸式的租佃關係，不可臆想的苛征暴掠，高利盤剝，以及一切土地關係上的戲法（註：英人在印度所經營的灌溉，主要的在棉田。近年來英人採用機器方法來開井。印度有二百萬的井，用人工來供給稻田的灌溉）。在英人統治下的馬來羣島，對於提高稻的耕種上，簡直一點也沒有做過。自然，土人如果沒有經過一次極大的飢荒，那麼英國帝國主義無論如何不肯辦理甚至

一件對於社會有利的事情。美國帝國主義在菲律賓，其苛刻愚魯實不亞於英國。美國政府下令保護森林，禁止土人採掘，然而它自己也一無所作爲；根據官廳的統計，菲律賓有 599,000 海克脫的土地，很容易變成爲灌溉的土地，然而美政府從來沒有動過一動呢（註：曾有 50,587 海克脫的土地，由天主教堂的舉辦而變成爲濕田，而土人爲此所納的地租，實在不知多少）。

法國帝國主義總算比較有遠見，它在印度支那，於一八八〇年始，就專心辦理擴大灌溉的土地，並利用湄公河的水流。因了這樣的緣故，所以印度支那每年米的出口從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〇年平均增加 495,000 噸，從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平均增加 1,987,000 噸。然而直接的生產印度支那的土人並不因此發財，因爲一方面中國的零買或躉買商人或碾米廠，另一方面法國的碾米廠和出口商人都要來吸取利潤。

總而言之，帝國主義從來不去顧及產米國家內幾萬萬農民的糧食生產。它所需

要的，第一就是麥，以供給宗主國，橡皮，古古，茶葉，煙草，麻，棉，絲，豆，植物油，等等的一等商業的植物和原料。所以印度就停止米的出口。爪哇，日本，菲律賓，本是米出口的国家，現在一變而為輸入米的國家了。在遠東祇有印度支那與暹羅還有餘米出口。中國的禁米出口，已將數百年（自然，在過去和現在，都不免於私運米糧出口，因為在國外的中國人喜歡『本國的』米），在最近年來，中國的米和其他食料的入口，年年有所增加。祇有美國在近年來成為新的米出口的国家，同時加里福尼亞的米，就補日本所不足。產米的世界就不得不使食料上轉劣，不能以米充飢，代之以馬鈴薯，黍，珍珠米，或者甚至餓死，或者就購買美國的麥子和麥粉。在遠東國家，祇要有一次大飢荒，便足以斷送成千百萬的生命。

日本的農業發展的速度，遠遜於工業。糧食的入超，使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九年提出灌溉 217,000 町的本國的土地的計劃。同時拼命地繼續不斷地把高麗，台灣，東三省變為日本糧食的根據地（註：關於這方面，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日本帝

國主義會倡出一種思想上的根據，來證實它本身的存在，來欺騙羣衆。這理論的內容便是如此。日本的人口，什麼在五十年中增加了二倍，現在每年要增加600—800,000人，日本自然不能供養這樣快的人口的繁殖，所以不得不需要殖民地。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論據，事實告訴我們是如此，日本的米的進出口的平衡綫，是每年平均入超百分之八，但是這些數量的米，便是用來釀酒的。并且甚至日本的經濟學家也承認，日本尚有二百萬的土地（約等于2,000,000英畝），可以作為耕田的，其中百萬可以不化多少勞動而變為濕田，如是可以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收成。這樣看來，日本現在還有餘地給日本人。這裏應當提到的，便是在高麗的日本移民中經營農業者日漸減少，在東三省從事農業的全數祇是2,400日本人。日本帝國主義在民衆前面所吹的大砲並不能得到回聲。這自然並不阻止它去狂吹帝國主義的馬爾賽斯的理論，去強佔東三省，蒙古，新圭尼那，南海中的許多島嶼，以及其他的地方）。

在台灣，稻田的數量增加得很慢，然而因了灌溉的改良，所以使米的收成能有很大的發展。在高麗，耕田的數量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中間，增加了百分之十，然而在這時期中因了灌溉的改良，所以使米的收成提高了，從 10,365,000 增到 15,174,000，就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米的出口，在一九一二年為 313,000，到一九二七年達 4,084,100。真的，高麗農民的口糧，因為在這時期中人口的增加，所以就減少了。真的，日本的一個灌溉公司在這時期中攫取了高麗 35,000 的良田，日本的銀行所攫去的良田，還不止 50,000（註：見普克洛夫斯基在一九二六年的東省雜誌上所發表的『高麗農民的破產』第 10—14 頁）。同時日本政府曾組織了八十個灌溉合作社，供給 57,000 畝的土地的水量，所以有些地方，收成的數量增加了七倍。一九二六年高麗的省長，曾製定一個計劃，預備在十二年中間，把 453,000 畝的灌溉改善，220,000 畝的乾田變成爲濕田，183,000 畝的荒地，利用排水法來使其成爲耕田（註：見遠東評論一九二七年第五期第 226—231 頁）。

日本帝國主義確是比任何那一國來得高明，它懂得灌溉的意義，這是由於日本自己的農業是建築在水田經濟上的緣故。

這樣看來，灌溉在生產上的意義，不言而喻了。這種水田經濟，很明顯的就是東方國家的『政權的一種物質基礎』。所以昂格斯，馬克斯與盧遜堡的看重這事實，是很正確的，不把這種事實看做『了解東方國家的鑰匙』，那是很錯誤的。這當然也不是不說，一切水田經濟佔統治的東方國家的政權性質是完全一樣的。自然我們不能把中央集權的埃及（埃及的專制君主掌握着唯一的水的來源）來與中國的中央集權的程度相比較（中國的水的來源，有很多的河流與湖泊）。這就是爲什麼中國的專制君主甚至在最倡盛的時代，其中央集權的程度，總不及埃及。就是在清代，也不能夠創造一個鞏固的集中的政權機關。中國的國家不能像埃及一樣，以統一的灌溉系統而聯合起來。中國的國家，應商業資本的需要而統一起來，可是當商業資本一衰落，這統一便一同葬送了。中國是由掠奪由移殖等而擴大的，所以國家政權的集

中的性質，完全異於印度，埃及等國。

東方民族自己，在過去和現在都很明白地知道，灌溉中隱着了解東方 地的鑰匙。在菲律賓，有一族幾乎完全原始的民族，建造了十分浩大的工程，開闢了很大的山岡使其成爲平坡，子子孫孫幾十代在山坡上藉河流之助而闢成數千畝的土地。

在荷屬印度，『土人用自己的方法去耕植，得到很完善的結果，直到現在有百分之五十五的稻田，是用土人自己的原始的河道來灌溉，這些河道是由土人中的首領所發起而建造的』（註：見 *Year Book of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es*，出版于 1920 年）。

墨才蘭爾曾引述日本中世紀時代鄉村公社的預算，在這預算中我們可以看到，甚至窮乏飢餓的公社每年也要化三四千日本洋去建造水閘和開掘河道。然而最足以驚人的浩大的水流的建設，我們看到在中國。廣州和揚子江的口岸，上海至杭州一帶，渭水流域，黃河長江的水閘，從寧波一直到天津的沿海密布的水閘，運河

……這些區域內的灌溉的建設，洵是最偉大的人力的創作，這真真是人力，因為這一切都是由呻吟叫苦的農民以服役的形式所建造的。在渭水流域的山坡上，曾由人工來築成六千英尺高的山地，在四川有些地方高達四千英尺，在雲南高有二千英尺者。

一個有名的德國土質學家李赫哥芬曾調查過浩大的灌溉建設的成都，他說：『這裏最足以使吾驚奇與佩服的，便是中國人好像螞蟻一樣的勤勞去耕作田地。這在我生平所沒有見過的』（註：見李赫哥芬著 *Fruchtbarer aus china* 第一卷第94頁）。遠在二千三百年前，成都早就開始艱難困苦地建造灌溉的系統，并且當時的成都還不過是荒地而已，現在呢，已有七十六萬畝的膏沃的田地，中國人的俗諺，稱之爲『天賦之鄉』。用人力來穿過大山脈，以引岷江之水，而造成現在這樣完善的灌溉系統，人民除了勞役之外，尙要交納很大的稅額，以修濬河道。

在開濬河道中間，需要巨量的鉄，石，木材，粘土，竹以及其他等的材料。

在明朝的時候，農民會化了533,200工作日去擴大河道的建設（註：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第三十八，三十六卷）『關於米的生產上所需要的灌溉水系的長度，我們很難下一個簡單的適當的數目。據最謹慎的估計，中國河道的長度，超過 200,000 英里，中國，日本，高麗的運河的長度，最可靠的大約，超過于北美合衆國的全部鉄道的長度（註：開五著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這一切的建築，都是不用機器而用人力來造成的。誰也不能計算，究竟中國的農民要化多少的工作日，去創造這樣偉大的事跡，用自己的汗血來增加土地的收成和社會勞働生產力。

中國的專制，便是官僚和暴君的混合體，在它的『黃金時代』，很貪心，嚴厲，殘酷，鐵面無情去收括農民的剩餘生產品，剝奪農民的剩餘勞働，然而在這黃金時代，它很關心到提社會勞働生產力。紀元前一二二二年周朝成立的時候，曾頒佈一

個命令上說：『建立縣郡，劃定疆區，開闢河道，都是地官（農業部）的責任（註：李萍華著『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第141頁。李女士在該書中，說明中國地質枯瘠和從新肥沃的歷史，然而她忘却了地質枯瘠，乃是一種社會原因的結果）。

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中國女學生李萍華曾經著一部書，站在理論的觀點上講來，那簡直是不值一錢，然而在該書內，把中國農業上的歷史的記載和考據都繙譯出來。在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找到無數的材料，講到在農民暴動的浪潮中奪得政權的皇朝，和農民爭鬥浪潮危及朝廷的帝皇，如何想倡辦灌溉建築，以挽救自己，一般高堂的官吏，如何想發明新的農具，犁，鋤和灌溉工具。中國的農具中，屬於灌溉所用的各種器具，特別的多。往往有兵士去開掘河道，往往先有河道的建設，然後方有人去移殖。在廣東，浙江，湖北，湖南等省，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浩大的蓄水池和大批的湖泊，以作為水量的調節。然而在李女士所引述的各種考據中，我們可以看到，『一般有聲望的，富有的人士，王親國戚，公子，地主，官僚和富商

們，就是要奪取這些水量供給的淵源，並利用它來進行酷虐的剝削，把農民變成爲佃戶。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紀時的歐洲的封建地主爲了要佔奪森林，草地，牧場，溝池，以及其他種種的公地，和農民的附屬的產業，引起了與農民的劇烈的鬥爭。歐洲幾千百萬的農民，在這些劇烈的偉大的戰爭中所流的血跡，都染滿在淒慘的土地關係的歷冊中。中國爲了荒地，森林，空地，牧場，草地而引起的戰爭，完全充滿在第四世紀第五世紀的歷史上，結果都是農民遭到很大的失敗。後來這種爭鬥，仍是連綿不斷，然而後來這種爭鬥，已不是集中在這些附屬的產業上，而是爲爭取耕地與水源而作鬥，所以當着廣東，廣西，湖南的農民起來爭鬥的時候，他們第一個要求，便是收回地主所奪去的水源。

陸克男在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說：『如果這些運河，水閘，溝渠都沒有了，那麼最肥沃的，人烟稠密的區域，將一變而爲荒涼寥落的瘠土』。這是十二分正確的。在近世紀中，中國雖有許多植物能有所發展，然而因爲整個的經濟的

衰落，所以使當時稱盛一時的廣大的農業區域，現在都一變而為荒蕪不毛之地了。

在其他遠東的國家，我們可以看到乾田的變為濕田，荒地的變為耕地，這種過程雖是很緩而且經過很大的困難，然而總是向着這種方向進行的。在中國則通通相反。濕地都變為乾田或沼澤，乾田則變為荒地。當時黃河流域的興盛的農業，現在在中國民衆的腦海中都磨滅無遺了，歷史上著名的山東河南的耕地，現在都成為牧場。濕田的變為乾田，其意就是說，這些土地已缺乏了一部分的肥料，因為灌溉不但給土地以潤濕的水分，而且供給土地以大批的滋養成分，如泥土的肥料。印度現在有一種新的偉大的科學的發明，試驗出夏天的太陽可以把恆河與勃萊馬普德爾河內水分，變換其一部分的化學成分，因為太陽是促使各種鹽類的形成，恰恰在成熟期內，這種鹽類能助長植物的發展。中國的帝皇是很懂得水的意義的，清朝的第二個皇帝——也就是最末一個聰明的皇帝——康熙，曾說『水的賜福』，因為『人民皆靠田而活命，田依靠灌溉，灌溉能給土地必要物質。我們如果不能供給土地以水

量，不能建設河流水閘，取水而供給灌溉，那麼我們必不免於災禍』（註：Mabot

Lee著The Economical History of China 第402頁——康熙聖旨）

然而『賜福的水』，也可以變爲『降災的水』，如果不能善爲處置。多餘的水，與缺乏一樣的有害。農業學告訴我們說，如果濕氣侵入土地太深了，那是很危險與有害的，因爲水可以從土地中提出鹼性鹽類，經過微絲管作用而把這些鹽類吸到地面上來，這樣便把肥沃的耕地變成爲不可耕作的荒地。所以灌溉的系統同時一定要有完善的排水的系統的存在。中國的排水系統，現在也漸趨於破壞，西北各省如直隸，山東等，很廣大的耕田，現在都變爲荒蕪的鹽田，河流附近的都變成爲沼澤了。在太湖流域，江蘇和浙江，排水系統的破壞，把幾十萬——如果不是百萬——畝的良田，都變成爲沼澤（要恢復這些系統，是需要300,000,000元以上——見The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一九二五年第七卷）。一八五二年的黃河決口，把從開封一直到海濱的灌溉系統都被毀壞了，這樣就使無數的肥田都變爲荒地和沼澤。往

常有水患的淮河流域，汎濫到 7,775,000 畝之多，如果要修濬它，一時要化 210,000,000 元以上，這樣每年才能有 1,105,000,000 元的收入（註：見 *The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一九二五年第 15 卷）。像這樣的計劃，真是不少！中國的河道如果修濬起來，那可以從新興起幾百萬幾千萬畝的土地。這都是未來的事！在綏遠的後套區域，『一個灌溉的系統，在二三十年前，能夠供給一百萬畝土地的灌溉。現在因為缺乏修濬，所以這個系統祇能灌溉三分之一的土地』。

一九零五年時的一個俄國的自由主義者迦富曼，在他關於人口過剩和移民的著作中說：『土耳其斯坦的許多飢荒的不毛的土地——是中亞細亞有名的黃土的土壤，如有充分完善的灌溉，那便是很肥沃的地質……關於土地的適宜於灌溉問題，是用不到去提的；我們張開眼來看一看任何那一邊區，不知有多少的幾百年前遺留下來的，四周環繞着幾十俄里長的當時拿來灌溉的河道和溝壑的荒廢的城市和鄉村；這些肥沃的等待着灌溉的土地的總數，算起來定不下幾百萬俄畝』。

這是自由主義者的感觸。列甯曾答覆他這段話說：

『在任何那一個邊區的土地，它的不適于耕種的原因，不見得因為自然的特性，而是由于俄國本身的經濟上的社會特性，這種特性使技術發展停頓，使民衆陷于無權，困頓，愚昧和無助的狀態。

土耳其斯坦的幾百萬俄畝，以及俄國其他的區域，都不但『等候着』灌溉與其他各種的改良的設施，他們而且『等候着』從農奴制度的殘餘，地主貴族的采邑的壓迫和沙皇專政下解放出來』（註：見列甯著一九零五年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土地

政綱——第九卷第144頁）。

列甯關於土耳其斯坦所講的，同樣的合於中國。蘇維埃的工農政權現在給土耳其斯坦以土地和灌溉的改良，有名的中亞細亞的黃土區域，現在慢慢的，經過各種艱難困苦而復興起來。幾百年前荒廢下來的土壤，現在正等候着人工的灌溉。

中國將來的工農政權，也是要把農民衆從亞細亞式的專制下解放出來，要消

滅這樣經濟上的社會特性，它使技術發展停頓，使民衆陷于無權，困頓，愚昧，無助的狀態，要從使中國滅亡和退化的帝國主義的鉄蹄下解放出來，要從軍閥，官僚，高利貸的剝削下解放出來。如果這而不能實現，那麼不出于昂格斯的預言：

『如果水的供給衰落了，那麼農業也隨之而衰落；就是這一點可以解釋一件顯明的事實：往往有整塊的區域，在開始的時候，墾植得非常肥沃，現在變爲一片荒蕪的沙地（如帕米爾，彼得爾，依曼，埃及的有些地方，波斯，印度斯垣）。還有一種現象也可以拿來解釋，就是祇要一次蠻橫的戰爭的蹂躪，已足以把這個國家內的人口大肆摧殘，消滅其文化達數百年之久』。

中國的勞働羣衆，究竟要走那一條道路呢？

第三章 爲土質膏沃而作鬥

『土壤不斷的使用，如果得不到必要的植物質動物質和人造的肥料，祇獲得各種順利的氣候條件和其他不依人力的因素的影響，還是能夠繼續給出各種差別的收成；然而如果挪一個長時期來看，例如從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那麼農業生產上的停滯的性質，便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在這樣情形下，順利的氣候條件祇是展開一條走向饑荒的道路，因爲把土壤中所隱藏着的膏沃的礦物質都很快地消滅和吸盡；反之，飢荒的年成，和更多次的歉收，使土壤能夠重新積壘其礦物質，而在新的順利的氣候條件復來的時候，便能產出豐厚的年成。這種過程到處都是如此，雖然有些地方，因了耕作者的人力的影響，而阻止了此種過程，然而當耕作者無力的時候，這種過程，便成爲農業上唯一的調濟的因素』（註：見馬克斯給尼古拉的信，

一八八一年二月十九日)

這便是馬克斯對於李比赫所發明的農業上基本的科學法則的估計。李比赫證明，土壤中取掉多少營養物質，應當歸還多少；馬克斯，考茨基（當時他還是一個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者，曾起來反對倍林斯坦，達維特等修正派的土地問題的觀點），列寧這般馬克斯主義的辯證論的代表，對於土地問題的分析，都以李比赫的基本論據爲出發點，并因化學和農學上的新發明，而使他們把這種論據更加引伸和發展。

馬克斯說：『在文化發展到某種高度時，以及適應此種高度下地質的逐漸消耗資本——這裏所講的資本，是指已經造成了的生產工具——便成爲農業上主要的因素，這就是農業上一種自然的法則』（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296頁）。馬克斯在資本論這一章的論述中，很明顯地說明，在那些很少甚至完全沒有不耕作的土地，或者耕作土地的天然膏腴物質已經耗盡的地方，這種自然法則便有特殊的意義和特殊

的力量。

古代羅馬的時候，在爲了土地的爭鬥中間，結果大地主得到勝利，這樣使建築在奴隸勞働上的農業生產的意大利的農業受到致命傷的打擊，再加上其他的原困，就造成羅馬帝國崩潰的歷史的前提。美國南部聯邦的農場經濟，同樣的建築在奴隸勞働上，它把新開墾的土壤也已耗盡，而奴隸主的廣度的猛烈的耕種，一再擴張其新的土地，與資本主義的農民的墾殖的浪潮相交鋒，此時正當着北美聯邦的資本主義關係已十分成熟，而牽動了南部聯邦奴隸制度，國內戰爭就把過去歷史和經濟所造成的奴隸制度宣告終結。北美聯邦下資本主義的農民的農業技術上的大革命的开始，正當着無限量的後備的不耕作的土地已經枯瘠無用，耕作的土地因了猛烈的耕種而亦變爲荒地。

甚至在世界上有些部分，土地的耕種比較不久，然而爲土質耗盡的爭鬥，和提高收成量，已成爲極重要的問題。甚至有些國家，擁有巨量的空地，人口比較稀

少，然而土質耗盡，在某種勞働方法的條件下，已成爲一個主要的問題。自然對於這些國家，經營着幾千年的強度經濟，並且在目前的社會制度下，沒有空餘的土地，在目前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技術水平線下，每塊土地要養活多過於歐洲美洲幾倍的人命，那裏的情形，更因一年不祇收穫一次，却有二三次以至四次的收穫，所以更加複雜，這樣就應該一年中有二次三次以至四次歸還土壤中所吸取的物質（所謂（挪掉多少，應當歸還多少），土質耗盡問題，便具有特別嚴重的意義了。

美國的農業專家開五的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他第一個對中國，日本，高麗，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些國家（日本，中國，高麗）的土壤，經過了二十，三十甚至四十世紀的耕作，如何還能夠生產足以維持這樣稠密的人口的食料』，『少過於美國一國的耕地面積的生產品，如何能夠養活五萬萬多的人口』。（註：見開五著 *Farm-*

ers of Forty Centuries 第16——17頁）

講到中國，那是更加複雜了，因為中國的耕田，不但要養活人口，而且還要飼

喂耕作的牲畜，以及一切的家禽，因為一般講來，中國沒有牧場和草地（註：我們這裏所講的，並不是指蒙古，因為在那裏畜牧事業還是起很大的作用。同時在那裏，中國人往蒙古去繁殖的過程，以及蒙古人的過渡到農業生活的過程，都以很快的速度去完成），除此以外，還要供給燃料和建築的材料，因為一般地講來，中國沒有森林（註：講到煤，中國雖有很廣大的煤礦的積蓄，然而在國內生活上起有微微的作用，除了那些直接臨近煤礦的地方；祇有城市中才以煤為燃料，然而在比較不發展的工業部門中，也很少用煤的。中國的農村，都是用稻草為燃料）。中國的耕地，還要直接供給製造衣服，鞋子的原料。歐洲祇在十五——十六世紀時代，羊毛才開始征服苧麻和亞麻，祇在十八——十九世紀，棉花才代麻而起。在中國呢，幾百年前棉花已征勝了麻，中國歷史上，不知有羊毛的時期。中國在五世紀時已知有棉，在十二——十四世紀時，棉已成爲民間製衣的最主要的原料，這正好比幾千年前的絲，已成爲有權階級服裝上最主要的物品。

這樣看來，中國的耕地，既要給人吃，又要給人穿着，以及供給燃料和建築的木材（註：中國的城市的建築，都是依靠外國和東三省的木材。農村的建築是依靠竹子。幾乎一切的農業上所用的工具，都是竹製造的。竹子有三百種以上的用處，并且竹筴還能供給人吃）。如何來防止過度墾植的土壤的竭盡，便是中國，印度以及整個遠東國家的農業上的最嚴重的問題。雖然中國河流的水分中包含着很豐富的營養物質，灌溉事實上就是土壤的泥土肥料，然而單靠灌溉，決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本身。土壤是應該取掉多少還歸多少的。

據日本的德國的農學家的調查，知道經營強度勞動的農業人民，在李比赫沒有發明以前，已經依他們自己的經驗去決定這種法則。並且天然的災禍和社會的條件——例如城市的統治階級對農村的過度剝削，帝國主義對這些國家的過度的剝削——也並不足以阻止他們為保護土壤的膏腴而供給一切必需的東西。

據開五的正確的調查，山東的農民，收成從土壤中所吸取的硝酸鹽，苛性鉀等

等的物質，仍舊如數的歸還。（註：見開五著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第325頁）
『在日本，肥料中所包含的硝酸鹽，苛性鉀，和磷酸鹽的數量，等于收成中所吸收的這三種主要的營養物質（註：見前書第187—190頁）。』

開五認為中國也未始不如此。（註：德國著名的農學家哇克男，對於開五的論據與以辯駁，他說，事實違反我們的願望，中國的土壤，確被帝國主義弄得枯槁殆盡。這兩個著名的農學家的意見的矛盾，可以這樣來解釋，就是開五調查的時代在一九〇〇年，而哇克男則在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同時還應當注意的，日本以及中國的土地，不但不休息，不但不實行三田制而使土壤有所休閒，而且一年要有二次三次以至四次的收成。

十九世紀才發明的農業上的科學法則，在二千年前中國的農民早就依自己的經驗去實施了。遠東人民所施的肥料，是歐洲人所從來沒有夢想過的。就是這一點，成爲中國農村經濟上的一個主要的特點。這一點給中國土地關係的性質上以很重大

的影響，所以在下文中，須加以簡要的申述。

整個遠東以及中國的經濟與歐洲不同的特點，就在於使用一切的糞料，特別是人體的糞料。馬克斯曾講過：『糞——人的機體中所排泄出來的物體，好比衣服的被破布。糞對於農村經濟有最大的作用。講到糞的使用上，那很明顯地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經濟的浪費性；例如在倫敦，四百五十萬人口的排泄物，除了沾污了泰姆士（the Thames）河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用處。』（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七七頁）

資本主義的經濟，更因城市的發展，而增加了它的浪費性。『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使城市人口的比重佔着優勢，它一方面因了歷史上社會的變動，使城市人口集中到大的中心城市，同時又使其增加和積壘，另一方面它阻止了人和土地的物質交換，這就是說，歸還人類用衣食的形式向土壤中所吸取的物質，如是便破壞了自然的條件，使土壤中的膏腴的物質不能恢復。城市工人的健康，鄉村工人的智力生活，因之就受到摧殘。』（註：見資本論第一卷第86頁）

考茨基說：『站在保持土壤中的膏腴物質上來講，價值從農村流到城市，爲了等量的代價或是沒有等量的代價，都是一樣的』。

因爲依價值的規律上講，這種流轉決不能稱爲剝削農村經濟，然而在事實上，這種流轉，便是農業學上對農村經濟的剝削，使土壤中的營養物質趨於窮乏』。（註：見考茨基著 *Die Agrarfrage* 第211頁）

現在的化學，曾發明用人工來代替自然的肥料，『然而事實上這種（部分的）替代，絲毫不足以抵償很不合理地把天然肥料拋之於無用之地，反而使城市四周和工廠附近的區域的河流和空氣，都沾染着不潔』。（註：列甯著 *土地問題的批評* 第88頁）

講到中國，城市對外貿易的發展，早過於歐洲，幷因歷史上的特性，所以價值從農村中流出——而且是沒有等量的價值的流出，發生得更早和更徹底，這個事實，確含有重大的意義。糞料和其他廢物的使用，在中國農業上有極大的作用。這

裏我們自然不能詳細記載，究竟從什麼時候起，這種肥料才普遍地使用，然而據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城市已收集糞料，而賣給農村，純粹是一種商業的性質。（註：一個葡萄牙的海盜忽爾那特孟哲時品多，曾在一五〇九年代時，遊歷中國，在他記載南京的一書（Mendez Pinta's abenteuerliche Reise durch china, die Tarasei Siam, Pegu und andere Lander第153頁）中，說到『在南京，糞的交易有很大的發展，零買的小商人收買糞料，并轉賣給蠶買商，這般蠶買商每天裝運三百船到各鄉村，賣給農民作爲肥料，所以那裏的土地，每年能有三次的收穫』）

糞的買賣，直到現在還是很發達。例如上海收買糞料，由享有專買權者去經營，離上海二十五啓羅米突的鄉村，都用上海的糞，去作肥料。當湖南農民運動高漲的時候，農民協會到處設法破壞買糞商人的壟斷的結果，使糞價增昂。中國任何那一省（除了黃土區域的省份），農具中最不可少的，便是積聚各種糞料的池，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農民，如何勤懇和仔細去搜各色各樣的廢物和殘餘（註：中國農家的孩

蠶，穿着草鞋，在別人家的小車的旁邊，東探西望，以拾取馬糞。農村的道旁，設立廁所，使行人解天。往往在火車站旁，當軍隊停紮時，農民都攜鋤等候，看見兵士一大便，就去拾糞，作者曾在鄭州車站目觀過的。廣東的鄉下，以及廣州的城內，往往可以看到公共廁所設在那些小的池沼之上，池中的水，就作為灌溉附近土地的肥料）。在一九二〇年時，上海曾築通陰溝，而附近的農業和園圃都受到很大的損失。我們祇要看一看，北京城內專司糞坑者有五千人以上，那便可知道中國的排泄物的收集，要化多少的時間和勞働。幾百萬噸的營養物質，用這種方法來歸還給土地，不錯，這要是需要化不知多少的人工。我們敢斷定，中國農民爲了收集糞類，和樵柴，割草所化的整個的勞働，實多過于化在家庭工業中的工作時間。中國的農民，爲了要使土地肥沃，所以把一切的殘物，什麼灰，糞，蠶，甚至蠶繭，魚等，都作爲肥料。除此以外，還把田中所生的各種草類如金花菜等，也投在稻田中作爲植物的肥料。沿江川湖沼的區域，農民還要掘取河泥，以作肥田之資料，並且

採掘河泥，亦成爲一種商業的行爲，揚子江流域，從事於採掘者，不知有幾千百人（註：按開五的統計，每畝土地，有時可填七十噸以上的河泥）。沙土亦可作爲沼田的肥料，所以往往有積集沙土以出售者；還有磚瓦，窰壁磚屑等等，（註：著名的農學家和化學家研究的結果，認爲中國農民利用此項物體，以作肥料，是很正確的）。揚子江流域，農民往往每隔三四年，必毀其房屋，因爲拆下來的泥土，是一種很好的肥料，然後重建新屋（註：這是一個外國教士達德所看到的）。這樣看來，在小農經濟中，幾乎一切都有物質的價值，任何那一種廢物，都可以利用的。

農民所搜集得和製造成的物質，也並不是一下子就放到田裏去，因爲恐怕被雨水衝散，恐怕被土壤吸得太深。所以他們按着次序而分爲幾次施肥料，實際上講來，他們並不是對土地施肥料，因爲這是太浪費了，而是對每個單獨的植物施肥料。馬克斯對於中國農業技術的這種情形，顯然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說：『在這些小農經濟國家，如日本，倫巴爾多，中國的南方，耕田好比植園一樣，對於這些廢

料，都是看得非常珍重的，并且很經濟的使用。然而一般地講來，在這種制度下，農業生產是以最浪費的勞働力去換得的，這些勞働力就是從別的生産部門中分出來的」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三頁。

然而中國的農民，對於勞働力這樣厲害的浪費，也完全不存着一點害怕的心理，因為他的勞働力，實在沒有地方可以使用。他很明白，土地是需要食料的，否則牠（土地）就不能養活人了。中國四千年來不斷的耕作，不能離開土壤的自然的膏質，中國的農民，每年要歸還土壤這許多的物質，那許多物質土壤以生產品的形式供給人們的，而且人的排泄物，就成爲供給土壤的主要的肥料，所以在中國農業中，自然就形成這樣一種規律：『人餓土地也就餓，土地一餓，人就無法不餓』。如吳農民遭到飢荒，那不但打斷了勞働力再生的可能性，而且祇能在縮小的範圍上恢復其經濟。一個中國著名的政論家與農學家陶堯林很正確的指出這一點，他說中國北方諸省的農民，不得不進行『冬餓』，不但要餓他的牲畜，而且還要餓到全家，

這也是使北方收成減色的一種原因。大部分的農民，不但不能恢復其經濟，使勞働力能夠簡單的複生產，自然更談不到擴張複生產了。中國農民的這種飢餓的藝術，竟能達到它最完成的地步，然而土地太頑固了，它不願意受餓呢！（註：見遠東太晤士報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發表的『中國農民爲什麼貧乏』）

帝國主義侵入了中國，使土地與人的物質交換的正確規律的破壞更加強與更尖銳化了。技術的栽培品漸漸蔓延到耕田來。煙艸，鴉片，豆，棉花逐漸佔領了米，麥，高粱的位置。技術栽培品如鴉片，煙艸和棉，要吸收土壤中比米更多的苛性鉀，硝酸鹽等等的物質。這技術栽培品，便是代表價值從農村流入城市，以得到等量的代價，然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農民所得到的等量代價，真是微乎其微。（註：商人和高利貸吞吃了商品的農業的大部分利潤）實際上這種流轉，祇是使土壤日趨窮乏而已。

整個的講來，中國便是帝國主義的『土地的大陸』，正好比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時

候，城市吸取鄉村中更多的價值，比牠自己所給鄉村的，而在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這種關係發展到更高的程度。國際帝國主義把中國的土壤，都吸得竭盡了。我們在上文中屢次提到的德國有名的農學家哇克男氏，曾計算中國單是以豆，茶，亞蘇和豆餅的形式所輸出的營養物質，已大超過於輸入。在一九二二年中國輸出6,280,000噸的豆餅，這等于中國的土壤損失了33,920噸的硝酸鹽，6,784噸的苛性鉀，6,784噸的磷酸鹽（註：見哇克男著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第244頁）。在一九二六年，豆餅的輸出達36,100,000担。這等于說中國把東三省的肥料運到日本，然而自己的土地反而餓着和枯着。

如果說肥料便是土地的元氣，那麼在中國肥料使用的方法中，就可以找到了解東方農業上的主要的鑰匙，或者至少也可以看到東方農業上的一個切要的問題。按馬克斯講來，甚至在發展的資本主義底下，土壤的膏沃，一部分也是要依靠農業上的技術和農業化學。如果依靠糞類，那一定是會使耕地面積減少（註：見列富全集

第九卷第(一頁)在那些農業依靠肥料很厲害的，從來不知有人工的肥料(日本不在其內)而且主要的肥料供給者便是人的國家中，農業上的一個主要問題，自然便是肥料了。(註：在一九二三年中國各種肥料的輸入值3,220,000兩，一九二四年——3,633,000兩，一九二五年——3,381,000兩。在這些數目中，還包括從東三省運到山東去的豆餅)。

著名的地質學家和農學家李赫哥芬，他對中國的研究和科學的調查，確是高過于任何那一個歐美的教士商人的中國問題專家，他第一個會想到和確定中國以及整個遠東的農業上的一個主要的法則。他說：『那裏土地的耕種，不與現有的勞働力相適應，而與面積的多少相配合，耕種這些面積，現有的人口須供給耕作所需的糞料』。(註：見李氏著 china 第二卷第133頁)

李赫哥芬在太平暴動十三年之後，曾遊歷中國，目觀浙江省內之完全荒蕪破壞的狀態。土地枯瘠，荒草滿地，甚至土色亦有變遷。就在這個時候，開始進行墾

殖，李赫哥芬認為最奇怪的，便是這般墾荒者雖有無限量的餘地，然而也祇取很少部分來耕種，其原因即由于糞料數量之有限。李氏說『此地的糧食生產的數量，主要的須依靠耕田的多少，和該地的人數能夠供給多少的糞料』。（註：見前書）

然而李赫哥芬的法則——講到耕地面積的數量與某地方某數量的人口所供給的糞量的比例，尚不足以認為遠東農業上普遍的『永久的』的法則。技術的改良和人工的肥料的使用，必然會減少對糞料的依賴。化學工業的產生，人工肥料的輸入，使日本的農業發展、完全跳出李赫哥芬的法則（註：日本農村經濟中，每年須費300,000,000,000日本洋，以購買肥料）

李赫哥芬的法則，更明顯的證明在遠東經營強度勞動的農業區域內，存在着生產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抵抗性。分碎的小的直接生產者，與創造大規模的建設以保障水量供給的必要性相對立着。同時他又與社會制度相對立着，在這個制度底下，這般小生產者甚至他的勞動力也不能進行簡單的複生產。『鄉村的家庭手工業消滅

了，人和土地的物質交換的破壞而使土壤不斷的窮乏和枯竭，大的土地私有主的奪取公社的財產，高利貸和賦稅，地價騰貴，生產工具陸續的分碎與生產者本身的不斷的分立，勞動力浩大的浪費，生產條件的節節轉惡，生產工具的增貴，無力去利用市場的行市和行市的變化，以及低賤的生產品的價格——凡此種種，便是馬克斯認為這種經濟形式中的特殊的花樣。（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頁）

在亞洲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土質耗盡的過程，完全與勞動力耗盡的過程相連接着的。這兩種過程是相以爲助而不能分割。就是這種原因，所以中國的農民運動能有這樣大的範圍和力量。當着土質枯竭的時候，放在社會各階級的面前，不但是國民經濟收入的分配的問題，而是那一個階級或是階級中那一部分應當餓死的問題。如果這一個問題提出來了，那麼各階級間便會引起最殘酷的劇鬥。

我們根據李 (Marble Lee) 所著的中國經濟史中所譯述的關於中國農業史的記載，就可以看到一切過度的壓迫與剝削，商業的發展，國家的要挾，封建的混亂，戰爭

天災，以及其他使『經常的餓肚子』的生活『常慣』發生破壞的現象，往往與土質枯竭，收成減少相聯結的。

試看一看宋代時候（紀元後960——1276年）的情形…

『去歲收成不起，今歲勢必飢荒，土色變紅，田中無稻，祇留荒草叢叢而已。赤地千里，一無所存……荒艸亦有不能生長者……土地疲矣，土質枯矣……』。

再看一看明代的記載：

『今歲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長江流域直至河南，四川諸省，皆遭大飢。萬里之內，一望皆赤地（就是枯盡的土地），乾田盡成赤田矣……』

『彼奔走求利之商人，帝皇之貴族，乘肥馬，衣輕裘，錦衣肉食者，豈知田間之地枯耶……』（註：見李著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第263, 267, 268,

272, 282, 290頁）

再來看一看李赫哥芬的話吧。他說：

『據生產者一般的意見，邊區的糧食收成，甚是低落。這是由於肥料的不夠，土壤中燐酸鹽類的缺乏的緣故』。(註：見 Richthafen's Letters 第82頁)

這種話祇能對『張作霖的朝代』講，而不能適合於明朝，祇能對新起的東三省的土地講，而不能用之於數千年耕作的陝西諸省的土地。

李赫哥芬氏更說：『耕地從來沒有休息，不能每年部分的歸還土壤以營養植物的物質；土地將陷於完全枯竭的狀態』(註：見前書)

這段話祇是指中國的南方，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才能適用。自此以後，其情形更趨于惡劣了。

『中國農業上所通行的方法，把土壤中的黑土質的營養分無限止的消磨。還要
把田中的稻草和各種植物挪來作爲燃料，如是便斷絕了土壤中有機體的物質。加之
牲畜缺乏，不能靠之以施肥料，所以唯一的保護土壤中膏質的肥料，便是人糞』

這話便是指直隸各道。

『高粱與麥的收成，不斷地減少，地質很厲害地枯瘠』（註：見阿耳諾特著Chin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第290——291）。

這段話是一個美國的駐天津的公使斯吐阿德海來曼對一九二六年時的直隸所講的。

『山岡上的土壤是硬性的，窮乏的和最劣的……：江河流域的土地，當時可稱最肥沃的，然而經過幾百年的耕植，已經把它的肥質耗盡，現在務須不斷的施以肥料。農村衰落，土地荒蕪，人民皆以華僑寄來之資以過活。』

這也是一個公正的美國記者甘斯對福建南部觀察。

過渡到短期的租佃，社會的條件，高利貸，土匪等等，使廣東的土壤的膏質也日漸消耗（註：見華林著The Peasant Movement in Kwantung）。

『湖南的農民，怨恨着收成的降落，有些縣份內，他們索性坐視其荒蕪，因為

不值得去耕』(註：見一九二七年第三卷的 Chinese Correspondence)

『依一般地常例看來，十年中豐收祇有一次，其餘九次，不是中等，便是歉收……這些黃土的區域，當時確是中國的穀倉……現在的收成，完全依靠偶然的氣候條件。旱年總是沒有收成，就釀成巨災。如遇豐年，則糧食亦不能出售……耕田祇佔全面積的百分之二了……(註：見哇克男著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第77頁，34頁)。

這是指山西，甘肅，與陝西的北部。

開五在一九〇〇年代已經指出，在山東土壤瘠瘦與枯耗，已見於各地，及至現在，這種過程更是往前進展，所以在一九二六年離山東而往外移殖者，為數達百萬，這樣就便宜了關外王張作霖，他在一年中徵收了五次的田賦，使貨幣跌價，強迫攤認二千八百萬元的公債，一切都要抽稅，無一能免，以及其他等等的掠奪。

上述種種，便是中國農業生產上的『自然的基礎』，和中國農民的『主要的工具』

的一般。

馬克斯在資本論說：『土地如果能正確的耕植，各方面施以改良……』，『那麼資本（還可以加上勞働）連續的投入，可以給出新的利益，并且並不使前次所投的受到損失』（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317頁）

如果中國的農民爲了土壤的膏質而作英勇的鬥爭，然而土地還是枯耗消磨，如果四千年的耕植而仍不免於衰落，那麼就不能因此而得出這樣的結論，說土壤的枯竭，便是農業上『永久的規律』。哥倫比亞大學內許多中國學生如李等，受美國教授的影響，就創出這樣的理論。我們不能把中國一切的天災，整個的歷史，都諉之于地質枯耗的『絕對的規律』。中國國民經濟中的主要部門——農業的悲慘的衰落，絕不能歸罪于土地。

地質枯盡便是帝國主義與中國統治階級所創造出來的社會條件的果實。這些社會條件，強迫中國的農民餓着，逼使中國的土地也餓着。小農經濟，尤其是小塊的

租佃，是建立在盡量地縮減消費，和直接生產者與其家庭都飢餓的過活以及繁重不能支持的勞働上面。祇有餓死或是革命，才是對農民剝削的止境。餓死和不斷的地質耗盡，才是對土地剝削的止境。這兩個過程，是互相聯繫着的。當着人口浩大的滅亡，劇烈的戰爭，和流離失所的遊氓——這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恐慌時不可分離的同伴——另一方面成千百萬的農民暴動，如果它們沒有把生產的過程打斷，使土地有休息的可能，而隨後能開闢一條更合理耕作的道路的時候，那麼這兩個過程總是不斷的進展，相互連接，相以爲助，相以加速的。

第四章 黃土區域

李赫哥芬的『定律』，甚至在現在的技術水平線上，甚至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都不能適合於全中國。在黃土的區域，新墾殖的東三省和內蒙古的區域（熱河，綏遠，察哈爾）內，這個定律祇能在某種限制下才發生效力。

黃土——中國北部的特殊的土壤，究竟是什麼東西？

『黃土的成份中沒有石子，黃土是最容易吸收的物質，含着石灰和黃褐色的土壤，這種土壤具有特殊的性質，遇到了水就分成爲垂直的薄片……黃土是有石灰質的細管貫穿其中，其分佈的形式，很像植物的根……黃土的土壤亦有以水平線形而分成的爲薄片。黃土幾乎密布於中國全部的膏沃之地，它的特質不但決定了中國的地質，而且預先決定中國的農業，甚至中國的歷史（註：見Richardson's Letters）』

李赫哥芬對地質學上關於黃土的存在和性質的發現，的確給我們以了解中國土地上許多問題，以及解答中國歷史上許多啞謎的鑰匙。

黃土的一個最主要的特點，便是容易耕種。就是這一點，可以挪來解釋當中國國家剛興起的時候，中國人能比較很快地墾殖北方。在英國，在德國，耕種新的土地是一件最複雜最化勞動的事情，必須由整個的公社來共同進行的；開墾牠是需要最重的由六駕或是八駕牲畜來拖的犁頭和軛，才能動手。

黃土是最富於營養物質的（註：按照德國的地質學家伏爾脫門的研究，認為中國的黃土中所包含的營養成份的豐，富任何那一個歐洲的國家，甚至新興的喀麥龍，北美洲，南非洲和西非洲的土壤，都不能超過中國的黃土。另一個德國的地質學家哇克男，對此曾與以爭辯）。

黃土已能夠吸取肥料。它很容易吸收濕氣以及空氣中那些能夠使土壤的生產力

恢復的原質。然而主要的，就在于黃土能夠吸收雨的水份，這種水份在最深的地方，遇到了土壤中最下層而富於營養物質的濕氣，絕過微細管作用，就上升到地面上來，而且帶着了一切地底下的營養物質到地面上來。這樣看來，黃土自己能夠施肥料，而用不到肥料，它同時從地底下和空氣中吸取營養料，就是這原因，可以解釋爲什麼黃土的土壤是異常豐富，爲什麼渭水與黃河流域成爲遊牧民族最適合的口味，爲什麼部分的講來，中國的文化發展這樣早和這樣快。生產上的這種自然的前提，就給了社會充分的時間，不但去生產生活上的資料，而且爲了其他的目的。就是這個原因，可以解釋往往經過了最殘暴的戰爭，入寇和暴亂，然而黃土的區域能夠很快地恢復原狀；更可以解釋，爲什麼中國的犁是具有特殊的形式，中國的農民從來不知有深耕（註）；中國耕種的深度，大約爲十——十五的生的米突。在南方的稻田，我們所見到的，也是這樣的深度，因爲漑灌的田如果深耕，那是需要更多的水量）。真的，深耕法是能破壞地底下和地面上的毛細管作用，所以不但能增

加，而且足以減少黃土的膏質。

當馬克斯著資本論第一卷的時候，李赫哥芬還沒有發現中國黃土的存在和它的特性，所以他說：『位在墨西哥灣的奴隸主的國家，在國內戰爭以前，所用的犁是舊式的中國的構造形式，這種犁祇是把土地分開爲大塊或小塊，而沒有掘成爲犁溝，沒有把土地翻動（註：資本論第一卷第188頁）。中國耕種上的特性，就在乎祇要種子不被風吹開，不被雨衝散。中國的南方——種稻的區域，同樣採用北方的耕種方法，因爲稻是需要灌溉的，所以不適宜於深耕，深耕是要使耕田吸收過多的水量，然而稻是不需要浸濕的地下層。中國式的犁，在東三省和內蒙古，是不適用的，因爲那裏的土壤是硬性，是以需要深耕。

黃土蔓佈於直隸，山西，陝西北部，甘肅以及山東，河南的北部與南部幾縣。在這些區域內，人口的密度和農業，完全以黃土的分佈爲依歸，并受黃土分佈的限制。所以中國的帝皇，從來就自稱爲『黃土之帝』（註：直到現在，黃土仍作爲帝皇

的表職。一九二六年當張作霖蒞北京的時候，曾沿路散布黃沙。這一件事引起全國的憤激，因為這是表示張作霖有企圖帝制的野心。

因為黃土的原因，所以中國的北方，可說是沒有道路。黃土是一種軟性的土質，受到了車輪的重量，便很容易變成爲深約十——十五英尺的崎嶇的山路。

黃土最容易溶散，這便是中國北方河流的特性。北部一切的河流，都帶着巨量的從黃土中分解出來砂土；所以河口很容易被泥土淤積，這便是釀成劇烈的水災。黃河是黃土使它黃的，因為黃土，所以造成中國的悲劇。黃河每年要增加500,000,000立方生的米突的泥土。揚子江也由于黃土而呈黃色。

在甘肅，山西，陝西諸省的山岡的區域，與黃土的山岡中，建築了房屋。『幾千百萬的人口，都依土而宿，這些土地所建成的房屋，亦足以住六七世。一切的家具和爐竈，都是以黃土製成的』。（註：見威廉著 *Middle Kingdom* 第一卷第

201頁。

黃土不但需要施肥料。而含很豐富的營養物質，所以純粹的黃土還能作治田的肥料。農民祇須在耕地上散播些來耕種過的黃土，就是等於施肥料一樣。中國北方的城市中，有很多黃土製成的磚出售，以供給城市附近的園圃施肥料之用。

這就是黃土的著名的特性，它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此外秋風把蒙古一帶的巨量的肥沃的沙土，捲送到黃土的地面上來，更增加了黃土的膏沃，但是吃虧了蒙古的土壤。（註：一個很公平的太晤士報的記者，曾在一八五七年太平天國時代遊歷中國，他說：『河流和風，把中亞細亞的膏土送給中國人。所以中國人自然要務農而不務工。我們應該供給他們以工業品』。帝國主義者為要替自己辯護，甚至蒙古的飛沙都有用處的！）。

這樣講來，在黃土的區域內，人口的數量和人類所供給的糞量，決不能限制耕田的數量。黃土本來肥沃的，不需要施肥料的。這些地方祇會發生耕田與人口數的不相稱。

然而黃土的一切美善的質量，祇有了充分的水才能夠表現出來。如果沒有了充分的水，那麼地上與地面底下所發生的微細管作用就停頓了，植物就得不到營養成分。這樣土壤便立即枯竭，而便成爲赤地了。就是因了這個原因，所以甚至在黃土的區域內，在這些米不成爲主要的食料的區域內，農業上仍舊離不了灌溉。就爲了這樣，所以在中國古代的時候，在黃土所分佈的區域內，水田經濟和灌溉方法，其意義的重要，實不亞於稻佔統治地位的南方。就因了這樣，所以雖然一般地講來，黃土是不適宜于種稻，而適宜於高粱，麥子，豆，蘇，煙艸，香艸 (Lucern)，豌豆，然而灌溉還是成爲農業技術的極重要的問題。就爲了這樣，所以在黃土的區域內，年成中往往會遇到歉收，而結果使形成積穀倉的制度——遠東的社會保險上的一種特殊的形式。就是這個原因，部分的可以拿來解釋爲什麼在這些區域內，糧食的價格有特殊的變動。如果碰到了順利的氣候，雨量充足，那麼生產品便得到豐收，而很難出賣。如果沒有雨水，那便會發生普遍的飢荒。就是爲了這樣，所以中

國這樣早就發生國家來壟斷糧食價格的必要性。就是因了這樣，所以便形成這種社會保險的方法——積穀倉的制度和價格的調節，使官僚能利用它來攫取糧食市場的壟斷權，至少是佔據統治的地位，關於這一點，中國史乘上載着不少的悲酸的事實。

於此可見黃土的膏質是依靠水分，自然界用雨形式，人類用人工灌溉的方法去供給水分給土壤。我們看到，中國的社會條件，使灌溉方法發生破壞和衰落，尤其在黃土的區域內。中國的農民，很害怕水災，在河流的旁邊，往往使廣大的區域變成爲沼澤。隔離河流很遠的地方，灌溉祇能取源於井水。依靠河溝而取源於江河的灌溉，已可稱爲水的手工作坊的生產（其意就是說比較進步的取水方法），而井水灌溉祇能看做水的家庭工業的生產。然而中國的北方，整個的講來，是依靠井水灌溉，這正與南方相反，那裏利用大的水源佔着統治的地位。

講到雨量形式來供給水分，好像與社會條件絕無關係的。實際上，就是這種

社會條件，打斷了黃土的雨水供給。在中國的歷史過程中，有一件最浩大的悲劇——削滅森林。英國也曾經過這樣的悲劇，然而剝奪了森林却造成了工業。德國還算能夠避免這種滅林的悲劇。現在在歐洲，還有阜姆(Fiume)，的利雅斯德(Friest) 瓦耳麥的亞(Dalmatia)和門的內哥(黑水哥) Montenegro 的近郊，正在過着這樣浩大的悲劇，很厲害地伐取木材以供給威尼斯的造船廠。

波斯，阿剌伯，埃及和敘比亞的這古代文化發源的區域，尤其近海的區域，現在已經完全沒有森林，因為都為造船而取盡了。印度沿江河的區域，滅林已達到這樣厲害的程度，使水災亦起端於印度了。英國帝國主義同樣的幫助印度削滅森林，當拿破崙戰爭的時代，英國造船的木料已告窮竭，於是英人就開始伐取印度的麻栗樹。英國人和印度的投機商人，從十九世紀中始，很快地感覺到，要使造船工業上的原料，能夠源源不斷的接濟起見，所以就開始栽培森林。在北印度的，英國的行政官，就下令禁止採伐森林。法國人在印度支那，美國人，在菲律賓島，同樣

的禁止採伐森林。

日本因了各種特殊的原因，比較上能夠避免此種災禍。『世界上沒有一國家像中國一樣，削掘森林到這樣殘酷的程度』（註：見開五著 Farmer of Forty Centuries 第305頁）。毫無異議的，中國當時也是富於森林的，然而按我們所得到的歷史材料上看來，在紀元後第五世紀的時候，已經有第一次的諭旨，講到燃料的缺乏。當時執政者曾『散發柴米以給飢民』，就是這個，已足證明在那個時候，森林已被摧殘，而感到不夠。（註：見李著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第202頁）

在唐朝的時候，在第九世紀的中葉，曾頒佈諭旨，禁止掘伐桑樹；這很顯明地可以看出，燃料的飢荒，已達到可怕的程度，因為桑樹是絲業的先決條件，如果農民開始伐取桑樹，那很明顯的可以知道，農民燃料的缺乏，已達不可憶想的程度。在第十世紀的時候，皇帝的旨諭，叫人民植桑樹，果樹，以及其他的樹木。在十三世紀的時候，曾頒佈禁伐桑樹與林木的命令，甚至官廳供給農民以專門的土地，自

三十畝至一百五十畝不等，以種植果樹和楊樹（註：見前書）。中國的政府，曾想依靠農村經濟來培植森林，然而無論皇帝的旨諭，無論官僚的命令，都不能見效，因為『栽培森林，是需要一個長時間的生產（并且這種生產，勞働時間祇包含着很少的部分），因之而使資本流轉的期間就延長，所以對於私人來經營是不利的，對於資本主義的企業，自然是不利的』……『很正確的去經營經常的森林事業，是應當繼續預備前十年至十四年的常年使用的活樹。所以那些人祇擁有很少數的林木的面積，不斷地而且沒其他的收入，那是不能夠正確的經營森林事業』（註：見資本論第一卷第216——217頁）。

小農經濟是沒有力量在十二年至十四年前預先支付它的勞働，主要的它不能積聚十二年至十四年的木材的存貨（註：見巴爾脫非耳特著 Bamboo and its Use in China）。當時的官廳叫民間栽植柳樹，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因為柳樹的生長頗速，祇需五六年已能長足。大約就因了這樣短促的生長的時間，所以柳樹能夠廣播

於全國。此外竹子能在中國這樣普遍，大概也是此種原因。竹子在四十到六十天中間，已能成長，並且可以看到其發展。在順利的條件下，一小時中竹子可以長二十厘米厘米突，一晝夜間則可長四十六生的米突。愈濕愈暖，則其生長亦愈速。三四年中，竹子能達到它的長足的程度。所以竹子的栽培，能夠使資本得到最迅速流轉，怪不得它成爲中國建築上，農具製造上主要的材料，並可以作爲食料和原料，總言之它的用處，達一百種以上。

在十三世紀的時候，馬哥巴羅曾看到古勃萊汗與蒙古的貴族，栽種大批的森林，以供遊獵之娛。然而在十五世紀明朝的時候，歷史家已發出這樣的嗟嘆：『明太祖下令植桑，而今則幾無桑可見矣』（註：見李 Marble Lee 著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第366頁）。到了現在一九二六年，甚至明陵前的樹木，亦已剪盡，北京的官僚還把農廟四周的古樹也出售了。柳樹也被農家和兵士無限制的伐取。現在北方，樵柴所化的勞働時間，真有驚人之多呢。

這種削滅森林的悲劇，釀成了二種結果：第一，光禿的山坡，流出很急湍的水量，往往使稍久的雨天，也足以釀成水災之虞。爲了這一點，曾引起中國學術界上的爭論，有的主張植林以防水災，有的主張鞏固水閘，以禦水患。然爭論還是爭論，破壞仍是破壞，廣東的水閘，日漸毀壞，湖北楊森，曾利用水閘的破壞而不加修理，如是可以易於進攻武漢，張宗昌在山東，把當德國佔據膠州時所栽植的森林，採掘殆盡。

這樣看來，削滅森林足以破壞水田經濟，使水量供給的調節，成爲不可能。此外，削滅森林使中國人不得以稻草與竹，作爲造紙的原料。現在的英國造紙的企業家，也想用竹子來製造。中國森林的缺乏，也是由於家庭工業和鄉村手工業不發展的緣故。譬如在俄國的鄉村中，如果手工業和許多家庭工業的部門，缺乏了作爲原料的木材，那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回事。然而中國的農民，便是缺乏此種原料。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所以中國的農具發展方面，陷於停留不進的狀態。

『在甘肅，地主的力量，更因了掌有森林的緣故，所以更加強大，按官廳的統計，把甘肅的森林，分爲國有的，公共的，和私有的三種。國有的佔 388,322 畝面積，公共的——15,000 畝，私有的——2,858,410 畝。所謂私有的，這是指地主的，因爲沒有一個農民能夠掌有森林，所謂公共的，這是指紳士的。在平樂縣，曾爲了這個問題，引起農民和地主間劇烈的鬥爭。森林往往都在那些灌溉農田的溪流的發源處。因了建築材料價格的提高，地主就拚命地伐取林木，結果使那些河流的流量就減少，而很多的農田，竟完全得不到灌溉了。所以農民都起來要求國家採用強迫辦法來保護森林』（註：見一九二七年廣東雜誌第 10 期第 38 頁，遼耳罕諾夫關於『甘肅社會經濟結構概要』一文）。

現在要講削減森林後所得到的第二種的結果，這結果便是使西北的氣候上發生變化。李赫哥芬認爲在這幾百年中間，西北的這些區域內的氣候，已完全變化了。當時的西北，還有森林的存在，黃土的草原上，還滿佈着植物，黃土的土質，得到

雨量平均的分佈的保障。可是當着森林受到殘酷的摧殘，草原變成爲耕地或是變爲空空的荒地的時候，氣候就發生了劇變。『在這些區域內，雨量的分配非常不均。有的年成，完全無雨，有的年成，降雨過多（註：哇克男在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一書第九頁上，寫着：『當德人佔據膠州的時候，曾在青島附近開闢了240,000畝，以植森林。因了這個緣故，所以在青島，每年平均降雨八十五日，可是削滅林以後，每年平均降雨祇十二日而已，並且張宗昌又開始在青島削滅森林。』旱荒也常常遇到，並且旱災把黃土立刻變成爲枯地。這種過程，已遍及於直隸，山東諸省，例如一九二七年的旱災，完全把直隸與山東西部的夏天的收成毀滅無餘。

農民儘量地愛護森林。然而破產的小生產者沒有力量去培植森林。所以植林幾乎到處成爲國家的事務，農民祇是掘井以灌溉，或遇到黃土底下的濕氣浸入得太深，而不能和地面上的濕氣相接觸，使底下層的營養物質不能升至地面，那麼農民

就去施肥料。李赫哥芬的定律，在黃土區域內就發生效力了。

統治階級祇是摧殘森林，從來不去想生產森林。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引到這樣的結果，使氣候變遷，而造成更常見的水災，并使黃土中最膏沃的質量斷絕。中國的北部，西部與西北部，現在處在好像當時中亞細亞大平原那樣的退化的危險，把空前的興盛的農業區域，因了氣候有變遷，旱災，風沙，使土壤中的膏沃的物體都被捲盡，一變而為窮乏的牧場。這樣的社會條件，就形成這樣的農業衰落。

中國的農民用盡一切的可憐的方法，去和這種腐敗與衰落作鬥，去提高他的技術。中國的農業技術，便是一部農民羣衆的創造，深思，謹慎與爲了實現再生產而作英勇的爭鬥的歷史。馬格斯維巴爾認爲中國古代祇存在着單田制，這是完全不正確的。在周朝（紀元前1122年）的時候，皇帝的諭旨上說，每戶給田百畝，使其休耕，以備新的收穫。城廂附近的地方，則給田五十以至百畝，以作休耕之用，劣田則有給二百畝以作休耕者。於此可以看到，中國當時尚有貯蓄的土地，并且還顧到

地理位置的關係（例如近城者則給田少），主要的我們可以見到中國當時亦有休耕的土地。至於後來休耕制度的毀棄，而過渡到不間斷的耕作，這種過程是依着技術進步與人口增加而漸漸完成的。

在第五世紀的時候，中國的農業，已臻到全盛時期。從這個時期起，一直到現在，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一書，記載漢朝（紀元前206年至紀元後220年）的農業，可算一部李比赫與開爾哥夫以前的最好的描寫中國農業的書籍。

賈思勰曾說及五種禾本科植物——豆，小豆，大麥，小麥，以及最主要的米，他曾講到耕種的循環和各種植物耕種的土地，更講到那一種植物是適合於那一種土壤，這一切的論據，很值得十九世紀末葉的農業科學的批評。他又講到六種耕種的循環，并根據經驗而知道金花菜和豆的特性。農業科學祇十九世紀末年，才有這樣一個重要的發明，『有莢植物和其他植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前者所吸收的整個的氮，不是取自土壤，而取自空氣，它不但使土壤中的氮減少，反而更使其豐富。』

然而這種植物，祇在這樣的條件下，就是在土壤中含着一種微生物，這種微生物都附着在植物根上，才會包含着此種特性。如果那些地方缺乏了此種微生物，那麼可以用人工的方法來灌注，使這有莢的植物能夠把缺乏淡氣的土壤，變成爲很富於氮素的土壤，如是可以作培植其他植物之用。所以用微生物來灌注於有莢的植物，再加上了相當的礦物質的肥料（磷酸鹽或是鉀類），那可以使土壤能經常地給出最高的收成，而絕不需要糞的肥料」（註：見考茨基著 *Die Agrarfrage* 第82頁）。

然而中國的李比赫與甘爾黎甘來老早就根據經驗而建立了這種的法則，他（指賈思勰）很熱烈地叫人家在種穀類的植物以前，應當先種蔴和豆，并且金花菜可以和其他的植物同時並種。他叫人家先種豆而後耕田，這樣可以使豆還沒有成熟的時，而豆已能給土壤以肥料。他叫人家採用平耕的方法，如是可以保持雨水的濕氣，可以避免風的害處。他很詳細的記載水對稻的意義。他所揭示出來的換耕法，直到現在科學闡明的時代，還不失其意義。他極注意於氣候，土壤性質等等。凡此

種種，在第五世紀的時候所記載出來關於第二第三世紀的農業狀況。在這個時候，中國的農民，已知道用改良種子的方法，來抗禦天災。在第四世紀的時候，已知道用燒土的方法來抵禦土質的枯竭，而在第六世紀的時候，竟有九種的植物來循環換耕，還有果樹的園圃，蔬菜的種植，藐視廣度的耕種而頌揚強度的耕種。在第九世紀的時候，已採用一種新式的犁。就在那個時候，中國的農民，已知有播種器具，在第四世紀的時候，已有記載農具的書籍。

可惜關於中國農業技術的發展的歷史，找不到充分的材料，因為英，法，德以及中文的書籍，從來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但是根據我們所有的一切材料，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業技術，在漢朝的時候，達到最高的程度，自此以後，很少見其變化。帝國主義的侵入，農業上向技術的商業的農產品的轉變，都不足以助長中國農業技術的發展，祇是造成更需要加強採用肥料的耕種而已。十九，二十世紀所新使用的肥料，祇是豆餅，還有些是商業的肥料。不錯，豆餅的肥料，的確比其他的肥料，

更早的使用。

自從農業科學闡明，化學上令人不可捉摸的發展以來，中國農民的耕種技術，過去還算日本，爪哇，菲律賓，甚至印度的先師，現在已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其停滯和落後。真的，中國農民的農業，比起現代最新式的農具來，使我們就連想到以色列（Israeli猶太人）人的族長時代的農業（註：見 J. Arnold *China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第 136 頁）。開五的最大錯誤，就在於他幻想着使美國的資本主義的農民，去仿效中國佃農的農業技術。美國的資本主義的農民，歐洲的農民，有很多地方，確應當去學習中國的農業技術，然而中國的農民，同樣的應當去學習美國的農業技術。哇克男的最大成績，就在他指摘中國農業技術上的大缺點，保守性與落後的狀態。

然而『技術』是不能與社會制度相分割的，祇要軍閥制度，帝國主義和地主壓迫，不但吞盡了農民的地租和他的可憐的『資本』的利潤，並且吞沒了農民的工資

的大部分，祇要高利貸，市場關係和商業制度統治着農村，那麼根本談不到農業技術的改良。中國的有經驗的農業試驗場，農業大學等等，對於農業技術改良上，絲毫不起什麼作用，它們的影響所波及的範圍，祇限于幾百鄉村而已。祇要工農暴動沒有把農民從中世紀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那就不能走向改善技術的大道，那就永陷于衰落，災禍，飢荒，破壞以及不斷地把當時最興盛的豐富的耕種的區域，變成爲荒蕪不毛的隙地。

這種命運，漸漸降臨到黃土的區域——直隸，山西，甘肅，陝西北部，河南與安徽之一部分以及山東大部分。這些區域內的人口有80,000,000以至100,000,000，破壞的現象，已是愈趨愈烈了。

第五章 牲畜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

在我們沒有講到中國農業區域的第三種，就是與種稻區域和黃土區域不同的區域以前，首先來敘述遠東農業經濟中的一個主要的特點，這個特點，形成了遠東的農業經濟與歐洲，美洲甚至近東的農村經濟上最深刻的分界線。這個特點——牲畜的特殊作用，再加上了灌溉，肥料，就給了整個的遠東的農業經濟，特別是中國的農業經濟上以最深刻的影響。

我們講到歐美的農村經濟上的時候，那就必然會連想到耕種與畜牧的互相錯綜。歐美農業上的進化，却表現在畜牧事業，禽類繁殖，乳類經濟在整個農村經濟中意義的提高。當畜牧事業從牧場的飼養進到了欄圈的飼養的時候，牲畜的意義就提高了。英國的羊，甚至把農民逐之於田舍之外。甚至在那些地方，紡織事業的發

展，並不是依靠牲畜作為原料的來源，然而畜牧事業在整個農業上的意義，確是蒸蒸日上之增高。北美合衆國，丹麥，德意志，巴爾幹半島上的許多國家，奧地利，亞，匈牙利，以及革命前的俄羅斯，都是最好的例子，來證明資本主義除了發展商品的農業，發展技術栽培品的生產，還表現在提高畜牧在農業中的意義。甚至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也缺不了畜牧的生產品——肉，牛油，牛乳，牛酪等等。雖然棉花能很勝利地侵入到紡織工業中，雖然礦物的，樹木的和植物的油能夠在整個的工業副助品中很快的增加它的意義，尤其在化學工業以及其他部門的工業中的原料，然而畜牧事業，直到現在還是成爲工業原料中主要的來源。在現代的農村經濟中，機器的意義雖然有浩大的增長，然而耕作的和運輸的牲畜，至今有極大的作用。

就是爲了如此，所以如果我們想從遠東的農村經濟中窺得一個真相，那就不能不把這一點弄清楚，就是在廣大的中國，印度，日本，爪哇，印度支那，高麗以及

菲律賓島，牲畜的作用，完全與歐洲和近東不同，是非常微小的。雖然在印度與印度支那的有些落後民族中，也是從事於畜牧，在中國的有些區域，如內蒙古，新疆，甘肅，山西和陝西的一部分，四川的西部，以及雲南的幾縣，畜牧仍有相當的意義，然而這個事實，還不足以變更整個的情形。中國畜牧事業比較佔重要的位置，祇在蒙古人和回人所盤踞的那些區域內。一般的講來，在遠東（自然還包括蘇聯的遠東區域），馬和有角的牲畜，在農業上起有很少的作用。有角的牲畜，不作爲屠殺的獸類。衣服鞋子的原料來源，並不是依靠畜牧。自十四十五世紀始，棉花已成紡織的主要原料，並且在十四十五世紀以前，羊毛也不起多大的作用，因爲當時貧者用麻，富者用絲。牲畜亦不作爲民間食料的來源。講到牲畜在運輸上的作用，那麼遠東比起歐美來，真是望塵莫及哩。如果在歐洲，在美洲，乳類經濟的發展，特別在城市的附近，成爲資本主義發展上最有力的槓杆，那麼在廣大的遠東——中國和爪哇，牛乳經濟直到現在，不起任何的作用。歐洲與亞洲的有些區域間

的農業經濟上主要的對立性，就在於在最初的時候，無論中國人，無論爪哇人從來不知道乳類經濟，然而歐洲人甚至在和美爾Hobbes時代，已知有此。印度在中世紀的時候，禁止殺牲，並且在更早的時候，印度最高的等級，也嚴拒肉食。在廣大的亞洲的很多部分，不飼養取乳和屠殺的牲畜（註：見馬克斯維巴爾著經濟史第 30 頁）。

一般畜牧業的取利者想把中國強度的耕作變為廣度的畜牧，這種在經濟意義上反動的企圖，結果終於失敗。在中國並沒有畜牧事業和牛乳經濟的發展，並且就是耕作的牲畜。在中國農業中所起的作用，也遠遜於歐洲美洲。

在印度，英國帝國主義連結了本地的封建力量與高利貸資本，把農村經濟引到這樣破壞的程度，甚至使英人也不得不召集皇家委員會來研究改善印度經濟的方法（註：這個委員會所研究的印度土地關係是完全不正確的。蠢笨的英帝國主義，它不願意了解，或者它假裝着不了解，要改良印度的技術，而不取消現有的土地制度，

那是萬萬不可能的，要取消現有的土地制度，而不推翻英國的統治，同樣是萬萬不可能的。放在皇家委員會的面前的第一個問題，便是牲畜，因為在印度，牲畜的死亡，便是農村中抵押行爲（高利貸）上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並且有角牲畜發展的一般的傾向，因受到了物質的，經濟的同樣還有社會的宗教的影響，而形成這樣一類體質退化，勞働力減低，給乳能力降弱的牲畜，這些牲畜祇能供給人類以最低限度的生存的資料。『流行的疫症，使牲畜受到最苦痛的死滅』（註：見亞洲評論一九二七年第二十三期上發剛著『Rural India and the Royal Commission』。『羊，山羊，綿羊的數量，在近二十年中，不斷的減少；一九二五年七月的颶風，消滅了不知幾千萬的牲畜。甚至國喇斯（麻打刺薩省的一個畜牧民族）也不想去畜養那些最富于乳質，能給出最好的羊毛，肥料和皮革的牲畜了』（註：見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第27期第501頁）。這便是印度牲畜退化的顯著的事實。

日本官廳的材料上載着：『日本畜牧事業的不振興，由於宗教影響，氣候條

件，更由於人民的習慣，不使用牲畜的製造品，如皮革，硬毛等等。日本本國出產的馬，狗和有角的畜類，現在已滅盡。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一〇九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驚醒了日本的政府和社會去切實改良馬種……羊的畜牧便是日本畜牧部門中最落後的……禽的畜養也並不見得任何發展的現象。禽類的畜養，在鄉村人口的附屬的行業中，還沒有佔多大重要的位置，并且還沒有專門養禽的大田場的存在，牛乳經濟還是一種新的部門，現在還是處在萌芽的時期。牛酪的提煉，尙是很少……牲畜的染疫，給畜牧事業上以極大的打擊。』

註：見The Japan Yearbook 第507——511頁)

講到耕作的牲畜，我們應當指出，日本的農村經濟的分散和微小，已達到這樣的程度，不但耕作的牲畜，甚至犁也不列在農具之內，日本的農民祇用鶴嘴鋤來耕作田地，自然是用人力的（註：日本全數的農民經濟1,861,860中間2,395,984個人都祇有耕地十分之五町以下，即等於俄畝的百分之四十五）。人排擠了牲畜，鶴嘴

鋤排擠了犁。

這一幅圖畫，我們在爪哇，菲律賓，高麗，印度支那等處同樣的可以看到。中國，高麗的女人和孩童，常常來執行耕畜的職務。如果把地價也劃在耕作者的經費的構成部分中，那麼在東三省，牲畜和禽類在構成部分中佔了百分之七，（註：見牙什諾夫的調查而著的東三省北部的農民經濟一書第166頁）在安徽——百分之一又七，在直隸——百分之四又六，在廣東——百分之一又四。如果地價不算在經費的構成部分中，那麼在蘇聯的遠東區內，牲畜佔全部經費的百分之四十七又六十一，在比較富于牲畜的東三省——百分之二十五又五。講到從牲畜方面所得到的收入，那麼在東三省佔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又七，在安徽——百分之三又六，在直隸——百分之二又四。中國（加上了內蒙古，新疆等畜牧區域）的對外貿易中，畜牧部門的生產品，包括烏，羊毛，駱駝肉等等的出口，值110,000,000兩，而中國整個的對外貿易，等于864,000,000兩。中國的北方，馬，驢，騾在交通運輸上，還有相

當的作用，雖然在這方面，人和牲畜的競爭，還是日見加烈。在南方，裝貨的牲畜，因為苦力的競爭，而亦比較上減少其意義。這是不足怪的，因為在中國的中部和南部，用人來代替裝運的牲畜，可以省去購買牲畜和飼養的很多費用（註：哇克男在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一書第166頁上，曾載有這樣的統計，運輸一噸重的貨物，在一啓羅米突的距離中，用苦力祇需0.10——0.15個德國馬克，用裝貨牲畜，則需0.20——0.25馬克。在中國中部，每一啓羅米突內，每噸的運輸費，約需0.15——0.20馬克，以至0.25——0.30馬克）。在中國的北方，也是同樣的情形。『乘客從天津達保定，乘人力車則每九十里，祇須五六小時，乘騾拖的車子，則非十二三小時不可』（註：見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第一卷第六期上說，在這條航路上亦有長途汽車，每人須費一元二角，而人力車則較賤）。人確是快過於牲畜。甚至比起火車來，人力車價錢也比較便宜（註：這是北京政府的一個鐵道部的顧問美國人培爾爾講的。我們更須注意到中國的賦稅，賄賂，欺詐使鐵道運輸的

費用，增加了十倍以至二十倍。在近年來，因了鐵道的破壞，機關車輛的缺乏，貨物運輸受到軍事影響而停頓，所以在北方有些地方，都不用火車而用其他的運輸工具。在城市中，來往不大用牲畜，因有人力車。有許多的城市，人力車的價錢，甚至能與電車汽車相競爭。

在上海，祇計算公共租界，雖有電車汽車的交通，可是人力車的數目，一九一四年為14,867，到一九二四年則增到19,882人，一九二六年竟達32,000人（註：見Chinese Economic monthly第二卷第8期）。在北京，人力車的數目有10,000人，依靠拉車而過活者，連及家庭也算在內，則有240,000人。對人力車的剝削，真是不堪形容。人力車之服務於私人者，祇能維持五年六年，最多為十年，過此時期後，則心臟必不能支持，死者傷者，殘廢者，降為流氓盜賊者，或餓死者，不知有幾許人。誰也不去計算，中國化在運輸交通上人的勞働力確有幾何。據北京政府鐵道部的顧問培爾開的計算，全中國戴重的苦力，其數達25,000,000人（見來彌耳著Pearl-

ing of Chinese Economic)。這些牲畜的工作，真是不斷地降低了人類。『他們這般都是吃鴉片者』(註：見 Paper Respecting Labour Condition in China 第46頁)。在中國盜匪軍閥的軍隊後面，不知跟了多少的苦力的隊伍。在軍隊經過的地方，農民都把自己的牲畜隱匿起來。就是這一個原因，所以在山東，我們看不到牲畜。軍隊是要索取牲畜的，如果牲畜沒有，或者太少，那麼就要拉夫。『如果他不能担負這種繁重的工作，那麼就槍斃』(註：見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在河南，陝西，直隸，山東等省，農業衰落的一個主要原因，便是軍閥的強奪耕作的牲畜。在東三省，一九二六年時，張作霖曾強劫60,000匹馬和30,000小車，以作運輸之用；其外還不知有多少苦力，被迫而服役。

在城市中，用人力車來作爲交通的工具，也算是一種『技術上的進化』。在日本的美國傳教師沒有發明人力車以前，日本與中國都是通行轎子，是需要兩個人去抬的。技術的進化，使勞動生產力提高，現在祇須一個人來推車了。在落後的城市

中，還是以轎子爲交通工具。一九二七年時的國民政府，從廣東搬到漢口，還是依靠轎子的。不錯，中國的許多城市，現在亦已開始建築電車的交通（註：中國現在祇有大連，香港，奉天，上海，天津，北京，哈爾濱，才有電車）。不錯，中國好比其他的落後國家一樣，現在亦已開始採用其他最先進國家的交通的技術，有多少的地方，已開始築路而進行汽車的交通（註：按官廳的統計，『中央』政府，各省省政府，美國紅十字會，國際賑災會，交通部，軍事當局，私人團體等等，自一九一六年起，在全中國已建築了4,500——5,000啓羅米突長的道路。其中大部分的道路，是在飢荒的時候築成的，這些飢荒的區域，便是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以及一九二六年時的貴州。然而現在已有一部分的道路，走向衰落了，例如山西的大部分的道路。這3,000或10,000啓羅米突長的道路，對全中國講來，乃不過是滄海中之一粟而已——這些數目，都是從中國經濟月刊與其他報章上取來的。然而這數字尙遠不足以代表事實的真相。實際上，中國道路的建築，雖然進行很慢，

但是無論如何，總比官廳統計上的數目却快過二三倍。

中國直到現在，還是以水路爲交通的要道。在水路講來，南方便於北方。中國水路交通上的巨大的意義，例如揚子江的交通，就可以使我們看出盧遜堡的這一段論據——鐵道支線的發展，大約可以反映出資本侵入的程度（註：見盧遜堡著資本的積累第50頁，不能完全適應於中國。如果用這個尺度去丈量資本侵入中國的程度，那麼便會得出一張很可憐的畫圖，這幅圖畫完全不能表演其真相。中國全部鐵道的長度，祇等於11,000,000,000里，并且其大部分是在東三省，這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數目，甚至還比不上很多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的國家。除了鐵道的發展，還有內河汽船航行的發展，這二方面才可以更正確地反映出資本主義侵入的程度。然而鐵道，外洋和內河的汽船，其本身還不是資本主義，它們祇是在殖民地上創造資本主義的前提而已。

在運輸交通方面，人來排擠牲畜，乃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它更可以表示出

爲什麼「反抗機器的劇烈的爭鬥」，就在於這一方面。搗毀機器的第一個，就是政府。在一八七七年，政府曾下令拆毀淞滬鐵道，并將一切建築物遷之台灣。拳匪暴動的一個直接的動機，便是京津鐵道的建築，因爲京津路的築成，斷絕了幾萬的運輸工人，載重苦力和撐船者的生存的來源。在北京，曾有成千的人力車和苦力，在電車軌道上堆積了障礙物，以阻止其開行。在廣東，一九二六年的時候，政府曾接受人力車工會的要求而下令限制汽車的交通。在一九二七年時，在汕頭，人力車會搗毀剛才行駛的汽車。電報部門和工廠中，却沒有遇到這樣的反抗，雖然甚至在上海，罷工和衝突往往會隨着搗毀機器。在城市中，爲了電車，自來水，陰溝，常常會引起最劇烈的反抗，因爲它們要把成千成萬的苦力置之於死地。（註：在北京，雖有自來水的設備，然而挑水爲生的也有五千人以上。）甚至這樣可憐的鐵道支綫，常常因了戰爭，軍事調動而被引到完全衰落的状态，然而也能夠替代了25,000,000人的勞働力。（註：這是培爾爾的計算，見China—Land of Famine）。人來排擠牲

畜，鐵道事業的異常衰弱，內河航行的比較不發達，凡此種種，都足以耗費不可億想的人類勞働力。『在某距離中，商品運輸所需要的死的和活的勞働的數量愈少，那麼勞働生產力也愈高，反之亦然』（註：見資本論第3卷第100頁）。人來作爲運輸中的勞働力，這就等於延長了流轉的時間，而加添了生產費。在高麗，在印度和印度支那，在運輸中所消費的勞働力比較更少過於中國，自然也不能與運輸工業極發展的日本相比較。

人不但在運輸範圍中，而且在生產範圍中，都排擠了牲畜。在中國，正好比在日本與印度的有些省份一樣，農民經濟的分散和貧窮，已達到這樣的程度，甚至犁代之以鋤，人的手工勞働代替了牲畜。『在中國南方的稻田中，以及北方的乾田中，鋤在耕種上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不但在小的土地面積上，而且在大的土地上，農民都是用鋤來耕作，耕作的牲畜雖不夠，然而人類勞働力則有餘』（註：哇克男著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第305頁）。在中國，耕作的牲畜確是不夠。如

果蘇聯因受了帝國主義戰爭與國內戰爭的破壞，而使農村經濟中最感到嚴重的，便是無馬，那麼我們敢大胆地斷定，在中國農村中經濟力量最低弱的階層，則完全沒有耕作的牲畜，祇在需要的時候才向人家借用。在山西，借用牛則需洋二角，騾與馬——三角五分，驢——一角。在田忙的時候，借用牛則需三角，騾——五角，驢——二角。同時借用牛馬者，必須負飼餵之責（註：見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第二卷第十一期第80頁）。鄉村中的熟練工人的每月的工資，為二元至六元，並供給飯食。按照一般的習慣，農業工人是常年僱用的，工資則全年為十五—二十元不等，飯食則由主人供給。普通工人的月薪，為二元三元，在田忙的時候，每日的工資，為二角到三角，飯食由主人供給。在『模範督辦』閻錫山下的『模範』省山西，人是賤於牲畜。湖北的貧農，常常向鄰居的富農，借用耕牛和水牛，這般富農都是掌有成隊的牲畜，以備借給人家。租牛者每年須給其主人一石或八斗的米；并且他必須交出牛價的一半，以作担保。有些牛主竟擁有幾百頭的牛（註：見Chinese Economic

mic Journal 第一卷第二期第170頁)。在廣東，赤貧的農民，常常租借耕牛。小農大都是需要向人租借耕牛，其租價往往高過於僱農的工資（註：見華林姚爾克合著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Kwantung*）。農民如果無力去租借牲畜，那麼他就用鋤來代替犁，用自己和家庭的手力勞動來代替牲畜。

在中國，有角的牲畜大都不作為屠殺的牲畜，因為中國人受宗教的影響而不吃牛肉的。然而佛教的信條終敵不過空餓的肚子，近年來殺牲者皆課之以稅，這就可見殺牲的普遍了。

牛乳和牛油都是賣給外人的。牛乳的店舖，祇是專供外人的需要，因為一般的中國人，嗅到牛乳的氣味，就覺得不好過了。羊毛祇在中國製造毯子，其多餘的，則大部分運往美國。講到駱駝肉，也是同樣的情形。羊毛在中國，不作為製衣的原料。皮革都是出口的，因為中國大部分的人是跣足而行，或者穿草鞋，有錢的才穿布鞋絲鞋。中國祇有新疆，甘肅（回人的區域），同樣在山西，四川，牧羊事業才有

多少的作用。在中國農村經濟中，祇有養豬養禽的事業，才有相當的作用，並且中國的豬和家禽，在美國和美國市場作爲最好的種類。中國的鳥和豬以及其他的牲畜，按着一般專家的考察，認爲是處在最壞的條件下，所吃的都是廢棄的東西，到冬天則就餓着，好像它們的主人翁一樣。近年來因受到世界市場的影響，在揚子江流域，養豬方面有很大的發展，更正確地說，火腿的製造有極大的進展。雞卵出口也增加了，雞蛋製造和蛋白質提煉也增加了。按一個畜牧的專家霍爾渥脫的考察，中國人比任何那一種民族都早知道畜牧的方法，那裏的市場條件是使它如此的，現在的山東北部，還是用這種舊方法，然而却有很好的成績。三百年前的中國學者徐光啓曾著書六十卷，專論畜牧與農業。一九一二年中國農商部曾將該書刊印，惟加以多少的修改，在該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徐光啓對於農業和畜牧，是具有正確的觀念。（註：見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第五卷）

我們祇要很膚淺的對於中國經濟史加以考察，那就可以相信，雖然畜牧事業在

中國所佔的位置，從來不像歐洲美洲那樣重要，然而它在過去所含的意義，毫無疑義地超過於現在，耕作的牲畜，在農業上所佔的位置，很顯然的高過于近幾十年（註：下文所引述的統計表，主要的便是從李 Marble Lee 所譯述出來關於中國歷史的考據中取來的）。遠在周朝的時候（紀元前 1122—556 年），已有畜場的存在，耕牛成爲主要的耕作的牲畜。在古代的中國，戰爭技術上起有最主要的作用的，便是馬。

當時的軍隊的單位，便是四馬所載的輪車。每駕輪車上有一個將軍與三個兵士，輪車的四周環繞着二十五個兵士。在輪車後面便隨着七十二個步兵。當時中國也沒有騎兵，在山地就以輪車來戰勝蒙古的騎隊，然而在平原上，蒙古的騎兵佔優勢，它可以很容易衝散中國的重笨的隊伍（註：希爾脫著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我們在中國的年紀中可以看到，在第二世紀的時候，曾發生第一次劇烈的牲畜

的瘟疫，並載有貧者向富有者租借耕畜，并且政府曾製造一種特殊形式的犁，以分給『貧農』。用了這種犁，耕田就可以不必耕畜。在第四第五世紀的歷史記載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缺乏耕畜和禁殺牲畜的事實。在明朝時，牲畜的缺乏竟達到這樣的程度，甚至皇帝也不得不發出旨諭，一再命令各地官吏，分發牲畜給農民，使他們『能墾殖荒地，以養其生』。當時牧場草地的被圈，已使農民感到極大的苦痛。牲畜的退化，和牲畜在耕種上意義的減低，很明顯的決不能看做中國經濟上『生來的本性』，印度也未始非如此，這是歷史的經濟的具體條件所造成的結果。

人口稠密的遠東的食料問題，已在這時候早就提出來了，那時在廣大的歐洲，削平森林，漁獵和畜牧，比較上很容易養活異常稀少的人口。在很多的問題上，遠東人民根據他們事實的經驗，來建立他們的法則，這些法則，農業科學祇在十九世紀後才發明。講到食料方面，他們積累了千百年的經驗，而對事實能有所貫徹，這些事實，科學上祇在現在才開始去研究。祇在二十年以前，科學上才有此種新發

現：『每一千担穀中所包含的滋養料，所具養活人的力量，至少多過於肉和牛乳的五倍』(註：見郭潑金斯著 *Soil Fertility and Permanent Agriculture* 第234頁)

我們並不是食齋的宣傳者，然而根據郭潑金斯的論斷，我們認為許許多多的經驗和事實證明出，牲畜是一架製造人類的食料和肥料的浪費的機器，因為『牲畜所吃下去的大部分的植物，都發散在空氣中了，這正好像木材在火爐中燃燒一樣，變成了熱氣以後，木材就不見了』。郭潑金斯曾根據英國最有經驗的科學家化驗的結果而製成一張最有興趣的統計，關於各種畜類每一百磅穀類的消耗的去路：

	用在自己生長的	用糞的形式而歸還的	散在空氣中的
牛	6.2	36.5	57.3
羊	8.0	31.9	61.1
豬	17.6	16.7	65.7

『郭潑金斯繼續他自己的論據說：而且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祇用去了牲畜爲養活其機體所積纒下來的滋養料的三分之二都不到。如果取一百磅乾的滋養物質，而使其經過牲畜的機體，而後人類以乳和肉的形式去使用其一百磅滋養物質，那麼實際上，他從一百磅滋養物質中祇得到四磅，如果這個牲畜是有角的牲畜；如果這一百磅是經過了羊呢，那麼祇得到五磅；如果豬——十一磅。（註：見 *Principles of Forty Centuries* 第121——122頁）』

我們是不懂得這門科學的，姑且相信郭潑金斯的威望吧。然而他的論據，可以挪來解釋，爲什麼久困於嚴重的食料問題的民族，要過渡到植物的食料，爲什麼他們去消了有角的牲畜——將穀類製成爲乳和肉的一架機器，爲什麼羊和豬總還是不能放棄，而有角的牲畜反而早就放棄。如果郭氏的論據是正確的，那麼在這中間必隱藏着爲什麼遠東過渡到半食齋的狀態的原因，爲什麼取消有角牲畜的作爲屠殺和供給糞料的牲畜。

在遠東的國家中，從古以來，人民的食料問題，弄得最緊張的。同樣的一塊遠東的土地，要供給多過歐美各國幾倍的食料。自然，遠東的民衆的觀察力和注意力因之都集中到此項問題上來了，究竟那一類食物——植物呢還是動物——能夠供給更多的營養物質，那一項植物經過了一番耕作後能給出最多量的食料。在西方，祇從二十世紀起，才開始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西方從來沒有把食料問題鬧得像遠東那樣的緊張。我們看近代科學研究的結果，更使吾們感覺到，遠東的人民，依據他們幾千年的經歷，很正確的決定把耕地適當的使用，以供養這樣多量的人口，讓我們來看一看，科學上如何來判定各種植物和動物的價值（註：見莫克特著 *Rural Economic of India* 第98頁上所引的表）：

每一英磅的滋養物質，以卡路里(熱量)的單位爲單位	豐年的每畝收成，以英磅爲單位	豐年每畝的卡路里數量	與麥粉中的滋養物質的百分比
--------------------------	----------------	------------	---------------

麥粉	1,660	1,800	2,988,000	100
豬肉 (註一)	1,130	200	226,000	7
羊肉 (註一)	1,275	250	318,750	11
乳 (註一)	325	4,000	1,300,000	43
穀類的麵包	1,550	3,600	5,580,000	186
雀麥的麵包	1,860	1,800	3,348,000	112
米	1,630	2,400	3,912,000	131
米的麵包與麥	1,630	1,800	2,934,000	98
豆	1,590	2,400	3,816,000	129
馬鈴薯	325	24,000	7,800,000	260
甜馬鈴薯	480	36,000	14,000,000	482

「註」這裏所講到的牛肉，羊肉，乳汁，我們應當看做相當數量的穀類經過了牲畜的機體所得出來的。

從這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每一畝耕田所給出來的肉的形式（豬肉或是羊肉）的卡路里的數量，少過於植物的食料十倍以至七十倍。每一畝耕田所給出來的乳形式的卡路里的數量，少過於任何那一種植物的二倍以至十倍。講到植物的食料，那麼每畝田能夠給出最多的卡路里，如米，穀類麵包，馬鈴薯與甜馬鈴薯。自然，我們必須還要去推究各種植物所吸收土壤中的營養物質的數量，這我們已在上文中就講過，站在吸收營養料的多寡的觀點來看，米便是最適當的植物。除此之外，還須要推究植物的成熟時間，那麼米又是最適當的植物，因為在順利的氣候條件下，米每年能給出二次或三次的收穫。我們認為就是爲了這些原因，所以人烟稠密的遠東民族，在很古的時候，就放棄了肉和乳的食料，結果放棄了畜牧事業，而把草和牧場改濬爲耕地，遠東人民在很古的時候就培植稻，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這一張表還可以拿來解釋，爲什麼在現在的遠東，特別在中國的農業生產上，發生巨大的變化。就是甜的馬鈴薯開始排擠稻（註：見東南大學的包爾德教授所著 *Cultivation of the Foreign Potato in China*）。從上表中我們知道，一磅甜馬鈴薯中所包含的卡路里的數量，少過於米四倍，然而每一畝田所產生出來的甜馬鈴薯中所含的卡路里，實多過米三倍半。真的，現在在中國，日本，高麗，甜馬鈴薯蔓延的速度，確有驚人地發展。日本在一五八九年，馬鈴薯才由荷蘭傳入，中國在十四世紀的時候，已知有此物。但當時中國所知道馬鈴薯是一種劣質的種類，所以並不廣大的栽培。甜馬鈴薯很普遍的種植，祇在三四十年前，自此以後，它不斷地得到勝利的進展。在日本，甜馬鈴薯也在三四十年前才能開闢了大道，直到現在，它在民間的食料上，已佔有極重要的位置，甚至在那些貧苦的民衆中，它已奪取了米的位置了。這種過程，同樣的表現在中國。在往常的條件下，每畝中甜馬鈴薯的收成，可得2,000磅。中國的土質和氣候，甚至農具的條件，是很適合于耕種甜馬鈴薯。

薯，尤其是中國的肥料灌施的方法和換耕的方法，同樣的完全適合於此種植物。甜馬鈴薯如果在種豆，蠶豆，黃花菜的後面而耕種，那是非常容易發展的，同時糞和灰是對它最好的肥料。不錯，在乾燥的氣候下，甜馬鈴薯也是需要灌溉的，但是灌溉的技術，遠東農民是非常明瞭的。講到成熟的時間，那麼甜馬鈴薯甚至可以與米相競爭，真的，在揚子江下游，開有一年中可得三次的甜馬鈴薯的收成。此外，馬鈴薯所需要的肥料，是少過於米，每畝稻田所需的肥料，等於八元以至十元，每畝甜馬鈴薯所需的，祇值一元至三元而已。就是這些原因，使甜馬鈴薯能夠克勝了米。日本的農民，每年所需的甜馬鈴薯，達45,000噸。講到中國呢，按華林等的調查，知道在廣東，甜馬鈴薯代替米的現象，比較以桑代替稻更為普遍。據廣東大學農科三十一縣調查的結果，發現出馬鈴薯和甜馬鈴薯，已佔了農民食料中的第二位了。在很多的縣份中，馬鈴薯耕種的發展，已部分的把米都排擠了。現在馬鈴薯已成為糧食中極主要的部分了（註：見華林和姚爾克著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在浙江，不但農民，而且工人也開始挪馬鈴薯來代替米以作爲食料。這種從好的食料過渡到惡劣的食料，已見之中國南部中部各省了。不錯，在德國，在捷克斯魯伐克，在沿波羅的海的許多國家中，馬鈴薯在食料中同樣佔有很重要的位置，然而那裏的馬鈴薯，是和其他東西合起來的。在斯維伐克最貧苦的地方，人民因被匈牙利，後來被捷克的資本的殘酷的剝削，所以也挪馬鈴薯作爲唯一的食料，結果便形成一種特殊的病症，名之曰Golya病。中國民間的食料，由優轉劣，同樣的使此種病態，成爲民間最流行的病症。

然而中國的農民，以及他們同階級的弟兄——日本，印度等等的農民，現在還不能去夢想便利的，適合於衛生的食料。他們祇能儘量地去使用耕地，去找求儘量便宜的食料。要達到這個目的，那麼當然祇有使用植物的食料。假定中國每戶五人，按北京醫科大學的教授柏爾納特李特的計算，消費了13,000卡路里，那麼這些

食物的市場價格，總比英國同樣的食口所消費的蛋白質和卡路里的價格，便宜三倍，因為英國的口糧中包含着動物質的生產品（註：見泰依魯爾著The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第41頁）。

現在再來講畜牧事業。馬克斯說：在畜牧中，生產所延長的時期內，祇包含着很少部分的勞動時間，因為一隊牲畜中的一部分（就是牲畜的存貨）是留在生產的過程，同時另一部分則每年作為生產品而出賣，……祇有一部分的資本能夠每年流轉，……這種資本，便是一種常久停留在生產過程中的資本，所以它使全部資本流轉遲緩（註：見資本論第二卷第91頁）。這一點對於遠東有極大的意義，因為在遠東，農業資本的流轉，因各種主要植物的成熟時期的短促，所以快過于歐美二三倍。我們又看到中國到處的鄉村內，比較上最普遍的便是植楊，因為楊樹生長的時期祇需五六年，不比其他的樹木，必須十二以至十四年，楊柳之所以成為中國從最歡喜的樹木，亦由於它很容易生長於河溝池沼以及其他灌溉流通的地方。同樣

的，爲什麼在中國經濟中，比較佔有相當位置的不是馬或是有角的牲畜，而是豬，羊，禽鳥和魚類，因爲後者生產時間的短促，遠過之於前者。這種情形，在農業資本窮乏的遠東農村中，含有不少的意義。

這樣必須還要講到兩個最重要的事項，豬在中國的南方和北方，同樣的繁殖。然而禽類則不同，北方多養雞，南方則多養鵝，鴨，總之是游水的家禽。所以南方以鴨爲名，北方則爲鷄。講到耕作的牲畜，也有這樣的區別。北方耕作的畜類，以馬，驢，騾爲著，種稻的水田的南方，則以牛爲著。其經濟力量強固者，則必備有水牛。在北方，貧窮者用驢和騾，而較富有者則用牛和馬。赤貧的小農則完全沒有耕畜的，水牛最能夠抵抗一切的水濕，所以可以作爲稻田的耕畜。然而水牛在耕種中的作用，遠不及歐美農村經濟中馬的作用。

在整個的遠東，特別在中國，畜牧事業很微弱的發展的還有一個理由，便是小農經濟和最小的農民經濟，這是歷史所形成的一種土地使用的形式，自然它也免不

了土地佔有的集中。小農經濟和最小的農民經濟，是不能夠很經濟地去使用牲畜，更因了種種的原因（如承繼權，如分碎租田以求剝削更多的佃戶，如農村經濟的精粹的破裂等等）使這種小農經濟的分碎與零落，更形加強，這樣一來，使牲畜的適當使用，更感到困難了，巴克在安徽蕪湖附近所調查的一百零二個農民經濟的結果，認為它們整個的耕畜，平均一年中耕作二十四日（註：見 *An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159 Farms* 第39, 49, 50頁），并且農民有田十畝以下者，耕畜一年平均祇用十四日，十畝以至二十畝者——二十一日又四，二十畝以至三十畝者——二十四日又九，三十畝以上者——三十日又三。

巴克教授更在直隸安新調查了一百五十個農村經濟，知道在那裏，耕畜平均一年中耕作六十一日，其中十畝以下者，平均四十六日又六，十畝以至二十畝者，平均五十一日又八，二十至三十畝者，平均七十一日又七，三十畝以上者，平均耕作六十二日又五。（註：見前書第五頁）。

平常在冬季四個月，夏季二個月中間，耕畜是完全不工作的。在這個時期中，耕畜就餓着肚子，餵養它的資料，減少到最低限度。

李赫哥芬早已指出說：中國因了土地使用的分碎，所以耕畜是很少利用，常常空閒無事的。他們實在沒有地方去容納牲畜的勞働力。巴克很正確的說，耕畜使用問題，乃是中國全部的問題。

商品的農業的發展，使牲畜的瘟疫蔓延的可能性，更形劇烈了。飼養不足的退化的牲畜，那能去抗禦此種流行的疫病呢。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所以在中國，印度支那，和印度，發生最劇烈的流疫，牲畜蒙難的無數。祇有組織完善的國家，才能很合理地去抵制此種災禍。日本的國家，多少是執行此種機能。退化的衰敗的中國的國家，並沒有執行任何有利於社會的機能。一九二六年，蒙古的牲畜，罹疫而死的達幾萬頭，執政當局從沒採用任何實際辦法以抗禦。

最後，天災影響於牲畜，比影響於人更浩大和更創痛。蘇聯高爾葛河流域的大

災荒，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在中國，天災流行的時候，國家從不與以任何種援助，這樣災禍的蔓延自然更形慘酷了。牲畜在這樣情形下，祇有餓死或是被殺死，再也沒有旁的出路。一九二十——二十一年的直隸水災，貧窮的農民的耕畜，其百分之七十五，不是死去，便是賣出。一九二五年的貴州，也經過同樣的情形。軍閥的戰爭，也把牲畜滅盡了——這是一種最殘忍的災禍。例如巴克曾提到說，甚至在安新的內的窮鄉僻地的農民，亦不敢在離城市三英里之內養其牲畜，恐為軍閥所掠奪。

在城市附近的鄉村，則無牲畜，其原因乃由于園圃之發展。列寧曾說過，在莫斯科附近的菜園種植者，有時能很合理地去操作而無需用馬。這對於中國的園圃耕植者也是正確的。然而軍閥的掠奪，更加强了此種現象。按美國賑災會的調查，認為一九二五年貴州和四川南部的大飢荒，其主要的因素，亦由於軍閥的掠奪耕畜。

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民經濟所施的災禍，使牲畜在中國經濟上的情形更趨惡化。

自一八六四——一九一四的六十年中間，牲畜的價格增加了180——200%。自一九一四年——一九二三的十年中，又增加了160%——180%。在以前的時候，中國曾與蒙古和回族的畜牧者相互交換，而尚能博得多少可憐的活的農具。然而到了現在，連蒙古回人的畜牧事業，日趨衰落，並且商品的牲畜，都是運往國外了。在印度的英國軍隊，常在中國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市集——神隍廟，去購買中國的驢子。

於此我們可以看到，開始的時候，在人類的食料方面，植物排擠了牲畜，到了現在，壞的食料排擠了好的。在食料供給方面，牲畜已不起有何種重大的作用。在肥料供給方面，它同樣的是一種最浪費的機器。

在紡績工業上，牲畜也已不作爲原料的供給者。在運輸交通方面，牲畜被人所排擠，近年來尚有以機器來替代了。在農業方面，耕作的牲畜如馬，水牛，牛，騾，驢，同樣的被人所排擠了。

經濟的，歷史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使在整個的遠東，特別在中國，牲畜在經濟上的作用，遠不及歐美各國。

這一點，便是遠東特別是中國經濟上的主要的特性。這一個特性，使中國的經濟，比起歐美來，有很大的差別，自然不用說與澳大利亞比較，在那裏除了麥子的生產，其主要的還是牧羊事業。

這裏必須還要提及一事，在遠東，牛通常看做一種『神聖的動物』。牛是不能殺的，所以不作爲屠殺的牲畜。這特別在印度更厲害，例如在本加伯省，據英國的和印度的出口家的稱述，大部分的牲畜，既不能作爲供乳的牲畜，又不能作爲耕作的牲畜，徒然加重了牧場的負擔，徒然加強了飼料的缺乏。這種現象，而且還是印度全部的現象。宗教的傳統還加強過於經濟的利益。這不但是指印度，而且還指中國，不錯，中國還算比較輕一些。然而大部分有利於經濟的牲畜，徒然加重經濟的負擔，徒然奪取有用的牲畜的一部分的食料。

野蠻的風俗，歷史的傳統，宗教的迷信，還是不斷的加強了有角牲畜的退化的過程。

第六章 手工勞動

從上面各章中，我們對於遠東，特別對於中國的農村經濟上的特性，可以得出多少總結論，其主要各點，述之如下：——

(I) 水田經濟的特點：不但是主要的植物——米，而且其他如烟草，甜馬鈴薯等，都是需要灌溉的。中國的氣候，是最適合於植物的耕種，因為它與歐洲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中國大部分的雨量，適在植物成熟的時期下降。然而一方面講來，雨水還不足夠，另一方面講來，雨水的調節不足夠。所以農村經濟在很古的時候，就採用人工灌溉的技術。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所以遠東的農村經濟，以及整個的文化，主要的發展于水量供給的發源地（江河，湖沼）。這也就是日本，印度與中國的一般的現象。在人口這樣稠密底下，水量供給就成爲經濟上最主要的因素。收成的

數量，以及耕田面積的總數與收成畝數量的比例，主要的都是以水量供給來決定。水田經濟的特性，甚至在耕作的成份上（例如水牛）和家禽的成份上（例如鵝鴨）都印着深刻的痕像。水量供給的組織和調節，祇有集體的努力才能夠實現。這一點就深印在社會制度的發展上。因了灌溉的必要，所以便引到排水設備的必要。沒有排水的系統，那麼濕田便會變成爲沼澤，濕氣如果深入土壤過深，那就要使土底下的鹹質的鹽類發生分解，經過了微細管作用，便被吸引到地面上來，這樣就把肥沃的土

地變成爲荒蕪的鹽田。所以灌溉同時必須有排水的系統的曬乾土壤。

(II) 創立巨大的灌溉建築和廣大的排水曬乾系統的必要：馬克斯在資本論上說，『在另一地方，我所講的資本，便是指與土地相連接的資本，就是所謂土地資本。我會把土地物質與土地資本分割開來。例如一塊早已變成爲生產工具的土地，加上了新的資本的投入，那麼我們祇看到土地資本的增加。而絲毫不是土地物質（就是土地面積）有所增加。這樣的資本，可以歸入到固定資本的一類。地主所出

賣的土地，並不是簡單的土地，乃是已改善的和已加上了資本的土地，這些資本完全不是由地主投入的。在這中間，隱藏着與經濟發展的道路相平行的土地私有者財富的加速度的擴大和地租無間斷地增加以及土地的貨幣價值無限制的提高的奧秘。如此看來，土地私有者就是把社會發展的果實擁護爲己有，而自己並不與以任何的助力。然而這也就是阻止農業上合理的耕作的一個最主要的障礙物，因爲農夫就不肯去施以任何的改善，不肯去投資，他們知道到了租期告終的時候，什麼都交給地主了，自己還是兩手空空，無一能夠取回來（正好比建築的地基一樣，土地以及加在土地上的別人的資本，終久都要歸還地主的）（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159—160頁）。

在遠東的濕田，不但包含着土地物質，而且包含着土地資本。這種區別，在研究地價，地租和土地關係上，具有極重要的意義。我們覺得馬克斯的這個提綱，對於了解遠東的土地關係上，可稱是最重要之點。

(III) 沒有休耕的存在，而有平耕和其他的耕作形式的存在：土地沒有休息的。灌溉，氣候的條件和自然的特性，使主要的植物——米的成熟期，更快過于其他的植物，使其生產的時期亦較短于其他植物。這種種的原因，使一塊土地上，一年中能二次三次的收穫。這就是農業資本能夠很迅速的流轉。所以遠東的農業資本的流轉，能快過于歐美二倍三倍以至四倍之多。然而須依照李比赫的定律，在土壤中挪掉多少的營養物質，必須歸還多少。按李比赫所建立的『最低定律』認為各種植物都要吸收土壤中各種礦物質，不過依不同的數量與不同的然而是一定的比例而已。收成的多少，便是以土壤中佔相對的最低限度的礦物質的存在與輸送到植物身上的可能來決定。李比赫的定律，其適用於遠東的農業經濟者，一言以蔽之，便是需要加緊的灌溉肥料。然而在現在遠東的社會關係下，除了日本，農民是無力去採用人造的礦物質的肥料。所以人就是肥料上主要的供給者。祇有印度，才算例外，印度便用混合的肥料，植物肥料來代替人糞。在整個遠東的國家中，利用一切廢料以作肥

料的發展，達到最高的程度。灌溉，廢物與灰的利用等等，都可以證明在中國肥料的強度，主要的是以某區域內人口數量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氣候，以及其他種種的原因，使中國甚至在黃土的區域內，在墾荒的區域內，灌溉與強度的肥料，成爲最必要的事項。

(IV) 植物的食料所供給人的滋養物質，比等量的穀類經過了牲畜的機體所給出來的滋養料多過好幾倍；遠東的衣服鞋子的原料並不是畜牧的生產品，而仍是植物；一般講來，畜牧的生產品在民間食料上，不佔有多大重要的位置；草地和牧場在很久的時候，已被統治階級奪去了；一般地講來，畜牧事業在遠東，在相當的發展階段時，早就消滅了。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在遠東的農村經濟中，不知有草地和牧場，一般講來，亦不知有乳類經濟。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具體條件，使耕作的牲畜的意義和作用，亦減低到最低限度。

(V) 一方面耕畜的缺乏，另一方面在遠東農村經濟中完全還沒有採用機器，

農業上耕作的方法和強度，是需要很多量的勞働，遠勝過於歐美各國的農業，所以農業上需要巨量的勞働力，便成爲遠東經濟上一個特點。

自然更不用說那些吞吃更多勞働力的技術栽培品，如煙草，棉花，鴉片等等。

甚至遠東主要的食料——米所需要的勞働，也遠過于資本主義國家中主要的食料——麥的生產。這一點，我們祇要看看稻的耕種的各個階段便知道了。現在在各個遠東民族中間，依着他們經濟發展的程度，可以分出四種種稻的方法。

在菲律賓濱，印度以及很多的山地上，採用鶴嘴鋤以耕種。種稻者先將森林削減，然而不用犁，不用耕畜，祇用削尖の木樁，將土地掘成爲穴，由婦女下種於穴中。自然，這種方法現在已將消滅，并且帝國主義者也不允許他們這樣耕種，而到處嚴禁，因爲森林在工業上有很大用處的。

在乾田中，種稻的方法，與種麥相差不遠，然而我們知道，乾稻田在農村經濟上不起有多大的作用。

大部分的米，都是由灌溉的稻田中產出來的。其耕植的方法，可分爲下列的步驟：

鋤田：在印度，日本，爪哇，和中國，這些小塊的土地，都是用鋤來耕，而不是用犁。甚至那些用犁來耕的土地，仍是要用鋤來再耕的，因爲稻田必需要平坦。

播種：有兩種播種的方法。一種是原始的用手挖穴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比較落後，而且生產力較低，現在已趨於消滅了。普通所採用的，便是插秧的方法。先將土地鋤碎，然後施以肥料，再以耙之使平，而後灌溉之，去其水然後再灌溉之，如是後則很謹慎地灌以水，然後再去其水而再灌溉之，經過了這樣一番真正埃及式的勞働之後，秧便生長了，土地也算耕熟了，然後更施以肥料，再注以水，深約18—20英寸，這樣就成爲秧田了。這種工作，大部分是由女人來担負的，這是農業上罕有的最黑暗的工作。此外，稻田中耘其雜草，也是一種最煩瑣最化勞働的

工作，因為在稻田中，最容易生長雜草。現在的加利福尼亞，雖已發明了巨大的機器生產，以解決種稻的一切困難的問題，可是直到現在，還不能解決耘稻的問題，所以在加利福尼亞種稻的最大困難，便是去除雜草。在中國和日本的稻田中，耘稻所化的勞働比較少些，這大概是尤于這些雜草，經過了幾千百年的摧殘，已經不像其他地方那樣猖獗了。

稻田灌溉所化的勞働量，是與灌溉工具有關係。如果用桶去灌溉，那麼每人每日祇能灌田平均三畝，如果用抽水器或水車，則須用三四人，然而在十小時內，平均每人能灌水十二畝。這樣看來，單單灌溉所需要的，已達 ∞ —— ∞ 的整天的勞働，每畝稻田，在一次收成中所化的灌溉的勞働，亦值二元以上。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講過，所謂灌肥料，實際不是灌田，乃是灌單個的植物，并且不是灌一次，而在成熟期中須灌幾次。此外，種稻還需要修濬河溝，又附加了很不少的勞働，這在麥田就不會有的。遠東以及中國所用的鎌刀，那裏是真正的鎌

刀，或許單單是一把刀而已。在菲律賓，在爪哇，土人刈稻的時候，是將每根稻穗，單獨的刈割，而依宗教的信條，不許用鎌刀。中國的高粱，也就是這樣割的，其根則單獨的拔去。不錯，高粱的根莖，不但可作燃料，而且可為建築的材。所以黃河的水閘，有很多地方不用水泥，也不用木材，而用高粱莖填築成功的。稻莖用以飼牲畜，並且還常常作為人食的資料呢。稻根可作為燃料，而稻梗有時作為紙的原料。

對於歐洲的農民講來，簡直是夢想不到的，爲了要經濟多少的穀粒，爲了要利用稻，高粱或是棉花的根起見，而竟不惜浩大的犧牲，做了這樣的苦工。西方的農民，已從厩舍的糞料，過渡到礦物質的肥料，而遠東的農民還是要無限量的勞動去搜集一切的廢料，用來作為肥料和燃料。在西方，已用機器來代替犁，而遠東則有以鋤代犁和以人力代牲畜的傾向。在西方，機器代替了鎌刀，而在遠東的很多地方，鎌刀還不能夠代替刀。西方以煤代替木柴，並且在農村經濟中，甚至已開始爭

以煤油，電氣和水力來替代煤。

這種地獄般的手工和腳力的勞働，也成爲遠東農村經濟中的特點。土地使用上的分碎，更加緊了手工勞働在農業上佔統治的地位。遠東農村經濟的普遍的恐慌，農民流離窮乏的加增，使農業技術上的改良變成爲不可能，如果不把現有的土地關係很堅決地加以改造。祇有日本一個國家，在灌溉方面，在種子改良方面以及肥料方面，才有進步的表現。現有的社會關係，斷絕了遠東農民採用農業技術上新發明的果實的可能。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便是機器侵入農業的一個勝利的開始。這種戰利品，遠東的農民都完全博不到。其理由是很多。小的和最小的農民經濟，是不適于機器的採用。尤其因了遠東土地掌有上的分散和隔離，使勞働力和牲畜以及農具不能合理地使用。然而機器缺乏的主要原因，便是資本的缺乏。不但單個的農民，甚至合作的農民的團體，也沒有力量去購買機器。遠東的水田經濟，早就教訓農民要向集體的道路，天災更是助長農民的集體的要求。印度，日本，爪

哇，和中國的農民，比較他們同階級的歐洲的弟兄，更容易組織起來。其顯明的例子，便是印度，日本，爪哇的合作運動的發展。中國的農民運動，真是表現農民的團結性的最光耀的例子。然而就在那些合作運動發展的地方，其主要的力量，却集中與高利貸者作爭鬥，與連結了高利貸的商業資本作鬥爭，所以組織生產品銷售的合作社。遠東的農民還想不到採用機器；他的窮乏，困頓，和壓迫，還是機器採用上不可消滅的障壁。

相對的人口過剩，奴隸般的低賤勞動，同樣的阻止了技術的發展。就是這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在印度，在爪哇，在台灣，存在着偌大的農場，然而也沒有採用機器。所以在歐美的遊歷者看來，機器的缺乏，耕畜相對的缺乏，整個農業完全依靠人力，便是東方以及熱帶的農業上最主要的特徵（註：見古本萊特著 200頁）。「在菲律賓，鏟了不少的機器農具，這些農業簡直很少用過，其用度還不能夠抵當運輸的費用」（註：見前書）。日本的一個大農業學家依屋開很悲傷地講：

『日本的農民，沒有去購買新式的機器，因為這些機器太貴了，他們實在買不起』。法國人會想在印度支那採用機器農具，然而結果還是失敗。荷蘭人從不去思索把農業的機器運到它的殖民地上去，還不如運到自己的農場去。美國現在也拋棄了在遠東找出售農業機器的市場的奢望了。且看一看一個美國的公使，對於中國經濟中採用機器的前途的一段話吧：—

『中國的農具——最原始的。據漢口的公使館聲稱，這樣的農具，可以與以色列時代相比較』（註：見阿爾諾耳特著 *China 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book* 第146頁）。

美國的一位駐廈門的公使道：『耕種的方法和耕作的農具，再原始不過了。一般地都是用粗笨的鋤來耕種，而且用手，雖然有：時亦用木製的犁和耙』（註：見前書第336頁）。

直接隸屬於日本的關東州，『小塊的土地，由人力用鶴嘴鋤和鏟來耕種』（註：

見前書第518頁)。駐南京——商品農業的中心區域——的美國公使曾有下列的記載：—

『普通所用的都是最原始的農具。現代的農具和耕種方法，正等待着農民購買能力的增加』(註：見前書第584頁)。

講到農業機器的深入農村問題，我們祇要看一看海關的統計就明白了。一九二三年農業機器輸入中國共值304,333兩，一九二四年——219,911兩，一九二五年——161,388兩，一九二六年——311,340兩。自一九二三以至一九二五年，輸入的全數，祇等於745,000兩，并且其中472,000兩都是屬於大連的。這樣看來，在三年中全中國所輸入的農業機器祇值273,000兩，然而運入滿州的反值472,000兩之多。(註：見 Foreign Trade of China, 一九二五年第一部第625頁，一九二六年第一部第136頁)。

我們敢斷定，在灌溉方面所輸入的機器，大部分一定是抽水器。按海關的統

計，抽水機以及其他的機器，在一九二三年輸入值404,319兩，一九二四年——381,287兩，一九二五年——612,222兩，一九二六年——523,224兩。最近五年來，在上海杭州的附近，已開始使用抽水機了。現在沿滬寧路一帶，亦已採用了一千個小的抽水機，普通祇為10—50馬力。站在節省人力上講來，甚至這些微乎其微的原始的機器，已可稱為農業上很大的進步了。就是十馬力的發動機，已能夠替代100—150工人了。有時將抽水機和發動機放在船上，這樣便能更順利的更廣大的使用。在上海甚至已有這樣的工廠，專門製造此項機器，一九二六年這些工廠已出售了幾百架機器。浙江和安徽等省，在城市四郊，還是很少使用灌溉的機器。這些機器，大部都是由商人和官僚所組織的合股公司來經營的。灌溉一畝田須繳洋一二元不等。自然，單個的農民是沒有力量去購買此項機器的。而且中國現在還沒有合作運動。美國的賑災會所發起的合作社，其恩澤亦祇及于二千多的農戶而已。當湖南湖北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農民自動的起來組織合作社，而且成績亦極為可觀。

然而他們還沒有想到購備機器。他們祇是購備槍械以自衛而已。中國的農村，老早就知道各種舊式的合作社。例如『借錢會』，無錢者邀其朋友，而提議創立借錢會。還有『防賊會』，以保護其田地，『祈神會』等等。這種種舊式的合作社，主要的盛行於農村中的上層分子中間，絲毫沒有帶着生產的需要和改良生產技術的性質。

採用機器灌溉的地方，其成績顯然不同，其收成有時增加兩倍。一九二四年時，在常州的附近，用電力來進行灌溉，一九二五年，曾用機器和電力灌溉了3000畝。每畝稻田，用電力以灌溉者，祇費一元半，用人力者則需二元。這樣看來，電力省了五角。自從採用機器和電力灌溉後，收成驟然增加了二三倍。在沒有灌溉和缺乏灌溉的稻田上，每畝收穫祇等於十元，在用機器方法以灌溉的，則為三十元。而每畝地價亦可以增加至100——150，甚至200——300元者（註：此項統計，取自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第十卷第318號第158頁）。

改良了水量供給之後，收成竟增加三倍——這對於陳舊的中國的土地講來，是

多麼奇異的一回事，祇要他們能夠推翻一切阻窒生產力發展的社會關係後，這些奇異的事都變爲平常了。在中國，電氣化加上了蘇維埃政權——社會主義——的實現，比任何地方一定來得快。然而如果把中國農業中機器的採用，看做含着雖少亦多的意義，或是看做確定的一種傾向，那便是完全不懂得中國經濟的特性。不錯，廿世紀農業技術和農業化學上驚人的發展，並不是對於遠東農業經濟上沒有絲毫的影響。在日本，在印度。在爪哇，在高麗，和在印度支那，灌溉技術上，很慢很慢地已有所改良。日本的農民，已過渡到使用礦物質和豆餅的肥料。講到種子改良方面，在爪哇，印度以及日本，確有極大的成績。在抵抗一切災禍上，同樣也有極大的進步。印度現在已採用機器以鑿井。然而最大的進步，就在於灌溉和排水的機器的建築。埃及，中國，日本和土耳其的歷史，乃是創造浩大的灌溉工程的歷史，至今還深印在我們的腦海中。而且這些浩大的建築，都是成千百萬的奴隸一般的農民的手力所創造成功的。修濟這些巨大的建築，和補償這全部農村經濟的固定

資本，又需要幾千百萬的農民。機器現在征服了石子，浩大的山壁可以穿貫而取水，雜草蔓延的荒地可以變爲肥沃的耕田。現代的技術，展開了一條擴張耕地面積的大道。然而在中國，在這方面我們祇是看見退化和衰落。中國固然也有幾百富於經驗的農業試驗場和農業大學，然而這還是滄海之一粟而已。如果把這些機關的記載和報告看一看，那就可以看出，他們的活動正在收縮，他們的影響正在減少，總言之亦趨于衰落。祇有那些技術的栽培品，如煙艸，落花生，才看到多少的進步，然而舊時商品農業也是趨向於衰落。茶葉受到了空前的崩壞；桑樹處在停滯的狀態；戰後的棉花也遭到迅速的凋落。各種主要的植物的栽培，現在也縮小了。糧食水平線，更尖銳地趨于入超。

在財產的關係中，在生產條件對直接生產者的關係中，隱藏着最深的奧秘，隱藏着整個社會制度和某種特殊的國家形式的奧妙的基礎。這種關係中的某一種形式，自然與勞動方法的某一種發展的階段相適應，所以也與社會勞動生產力相適

應。因之我們應當始先敘述與某種土地關係相適應的勞働方法的問題。據我們對這問題研究的結果，認為在遠東的主要國家以及中國的勞働方法上，可以發現出異於歐美農業勞働方法的主要的共同點。

我們這裏所講的，祇論及中國農村經濟的整個，而沒有分述到社會上的階級關係，和農村中的土地關係。我們更可以看到，富農所灌溉的土地，所施的肥料，實遠勝于貧農，農村中富有的階層的耕畜在經濟上作用，亦遠過于貧農，并且在比較大的農業經濟中，不但生產者的勞働力，能夠更合理的使用，并且還可以剝削僱用勞働，同時又能更合理，更經濟地去使用死的農具。然而我們覺得，首先應當把整個的農村經濟的特性提示出來。我們對於這方面的結論便是：農業經濟上的水田性質，肥料的特殊意義，森林，牧場和草地的缺乏，畜牧事業的缺乏，耕畜作用的微小，以及廣大的人力勞働的採用——便是中國本部的農村經濟上主要的特徵，并且因了這樣廣大的採用人力勞働，形成了全國農業資本上很低的構成。

既然我們在研究農村經濟，自然就不能忘却土地關係。然而在沒有講到土地關係以前，讓我們先來看一看中國的墾荒區域，在這些區域內，農業生產上的外部條件，和社會關係，帶着多少特殊的性質。

第七章 移殖的區域

中國第三個大的區域，在生產過程的關係上，在社會關係上，都顯露出很多的特點的，便是移殖的區域；東三省，內蒙古——分爲綏遠，熱河，察哈爾的特別區。這些區域，就是中國的土地的藏庫，近數十年中往這些區域去移殖的，其範圍之大，其速度之高，真可以掩沒當時往美移殖的歷史。東三省因受帝國主義影響之深入，遠過於中國其他各省，所以其情形亦比較複雜。然而在我們研究移殖問題上，可以丟開這些情形，而專去探求這些區域與中國其他的區域有什麼不同，在何種條件下形成了移殖的過程，這些空餘的土地的藏庫對於全國土地問題的解決上，將給以多少的影響。

滿州人征服了中國，強迫中國人納稅，奪去了北京，直隸，山東諸省內大批的

土地，按等級的高下，而將這些土地分給滿州的武士。自十八畝以至一千八百畝不等。然而滿州人自己却停止耕種。他們把中國的農民變成爲農奴，其剝削的殘酷竟達到這樣的程度，曾有過三萬個中國的農奴，不怕死地從滿人的領土上奔逃出來（註：見韓良華著 *Landtax in China*）。按中國的年鑑，屬於滿州旗人（旗——便是滿州和蒙古軍隊的單位，是依照民族的原則而組成的）的土地，有 15,335,000 畝，並且對於此項土地是禁止出賣的。然而我們知道，（統治被征服的民族是與氏族公社的原則不相容納的），『貨幣的統治，君主制度，奴隸制，克制其他的民族，都足以使氏族公社徹底的崩壞』（註：見昂格斯著 *家庭——私有財產——國家的起源*）。這種寄生蟲的生存，終把滿州的統治破壞了。於是在一七四六年，皇帝便不得不再從中國人那裏收買旗人的土地，再把這些土地重新分配，再下令禁止出賣。然而中國的商人，錢莊主，官僚們，用抵押，典當，高利貸的方法，又把這些土地，據爲己有了。中國的農民用英勇的努力，才一步一步地從滿州農奴主那裏贖回來。在一八

五〇年，就允許土地自由的出賣。

中國人就把自己的土地從掠奪者那裏取回來了。

此時滿州政府就下令禁止中國人往滿州移殖，它想把滿州作爲自己力量的基礎，作爲供養後代的戰士的食邑。然而遭受土地飢荒的中國農民，絕不受帝皇旨諭的阻擋，而還是連續不斷的往東三省移殖。『現在東三省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國人了，原有的滿州人都被擠到松花江的上流，蒙古人則被擠到興安嶺一帶了。北滿州現在不是滿州人，而且是中國人。滿州人用武力來征服中國，而中國人則用和平的方法來佔據滿州』（註：見高麗銀行出版 *Economic History of Manchuria*）。中東路的建築，給移殖上很有力的推動力；日俄戰爭後的移殖過程，洵是日激日厲，然而主要的却由於中國北部的國民經濟的衰落，竟有江河日下之感。東三省的人口，在一九〇六年時，爲13,265,882人，一九一六年增至19,639,671人，至一九二五年，竟達29,500,000人。在原有的居民眼簾中，映照着大批的新興的城市。往吉林，黑龍

江移殖的，祇在二十世紀初葉才開始。當十七世紀的末年，滿州的年鑑上說，全滿州的耕田面積等於2,117,000畝。按一九二四年的統計，滿州全部的耕田面積已爲25,500,000畝。

水旱的天災，再加上軍閥的戰爭，把山東直隸弄得破壞無餘，因之移殖的速度也隨之驟增。在最初的時候，大部分的移民還是回到本鄉，祇有很小部分在田忙之後仍留居滿州，作永久的居住。現在呢，永久住居於滿州的移民，愈趨愈多了。現在往滿州去的，還有河南，山西甚至江蘇的移民。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往滿州去的平均每年有400,000人，一九二五年——500,000人，一九二六年則平均有3,000,000以至600,000人。在一九二七年時，應田忙而去餉和常久居住而移去的，爲數竟達一百萬人云（註：此統計取源于Chinese Economic Journal，出版于一九二七年第一卷第七期。此統計是由芸格從各種正確的調查而很審慎地計算出來的）。還有一點應當指出的，便是移民中的回歸原籍的，日見減少：一九二四年，回歸本鄉的

佔移去者全數的百分之六十五，一九二五年——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二六年——百分之五十二。現在的移民，都是牽了妻子，抱了孩子而不遠千里而來；成千成萬地的死於半途者，然而還是接踵而來，因為那裏是能夠給土地，工作和糧食的天國。東三省日本的煤礦和工廠，同樣的能吸收成千成萬的移民。據一般的計算，自一九〇六到一九一六年中間，東三省的人口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四至五，自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六年，則增加百分之五至六。東三省人口的增加，竟超過了美國人口發展的三四倍。這裏還須提到的，就是成千的高麗移民，他們被日本帝國主義和高麗的高利貸與封建地主剝盡了土地，所以都奔向東三省來，以免其一死（註：按可靠的統計，認為祇在吉林一省，已有一百萬以上的高麗的移民，并且高麗的移民，大多數祇在十五年前才開始移入的。）講到人口的密度，那麼整個的東三省超過於美國，奉天的人口密度，已能與愛爾蘭並駕齊驅，吉林的可與蘇聯的歐洲部分相比。這些祇在近三十年中造成的！移民的浪潮，開始祇波及於奉天，後來才到吉林，現

在已到了黑龍江，並且就在奉天本身，現在也已很銳利感到相對的人口過剩，而已將移民推到其他的省份。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七年，東三省的耕田面積，增加了百分之十八。

關於移民的浪潮，對工商業的影響問題，我們在下文中當詳述。這裏祇提及一點，就是東三省在日俄戰爭結束之前，與俄國高麗以及中國其他部分進行貿易者，祇有一個通商口岸——牛莊。在開始開闢這個商埠的時候（一八七二年），東三省整個的對外貿易，其出入口總數等於3,371,000兩，而在一九〇五年——35,173,000兩。自日俄戰後，開闢了很多的通商口岸，東三省的對外貿易，在一九〇八年為95,812,000兩，一九一八年為267,203,000兩，一九二八年，更增至447,356,976兩。（註：一九二六年全中國的對外貿易，出入口合計為2,908,000,000兩）。這些空空的數字，固無多大意義。然而祇要一看東三省在整個中國對外貿易的總數中所佔的部分：一八七二年，佔百分之五，一八八八年佔百分之四又六，一八九八年，佔百

分之八又七，一九〇八年，佔百分之十四又五，一九一八年，佔百分之十一又五，一九二六年，佔百分之二十二又三，那就很明顯知道滿州在全中國經濟上的作用，真是蒸蒸日上。的提高。大連因了東三省的豆而發展的，正好比天津因了往蒙古移殖和京綏鐵路的築成使天津和京綏連繫的緣故，仍舊保持它的地位。

東三省的人口，佔全中國人口的十五分之一，或是二十分之一，其對外貿易則佔全國五分之一以上。這個區域祇在二十年中已發展到這樣程度（註：在我們蘇聯的中國問題的論壇上，在研究中國對外貿易時，往往輕視了這一點，所以對於全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上得出了很謬誤而虛張的結論）。

往蒙古移殖的過程，其開始則較遲而較慢。然而自鐵路交通建成後，移殖的速度，驟然增加起來，近年來已步滿州之後塵。怪不得張作霖在一九二六年時，從蒙古的皇侯那裏購買了8,000,000畝的土地，以買給或租給新來的移殖者。在這區域內農民經濟的數量之增，不以年計而竟可以月計。

那一些是中國移植區域內農業上的特點，在土地關係上可以看到那種過程？

東三省的氣候和地質的條件，整個講來，與蘇聯的遠東區域相一致。講到這裏中國農民的耕種技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移民，到這裏來的都帶着自己農業勞働的習慣，這是他們幾千年來積疊成功的經驗，完全異于西歐和俄國的習慣。其最顯著的特點，便是死的農具的低賤和原始，在耕作與收成中，依靠牲畜的力量比較少，耗費很多的人力勞働，在調濟土質的換耕中，並不採用休耕的方法……』

肥料在他們的農業經濟上，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據我們觀察和探訪的結果，認為肥料灌施的強度，恰與該區域內的人口成正比例。

他們耕作技術上主要的特徵，便是平耕的方法。

……平耕法的主要意義，就在於它能夠取消休耕的必要，因為在平耕法底下，地層的翻耕，實際上使土地每年能得到休息，並且不像俄國的三田制那樣三年一耕，它可以使耕地面積的一半都休息，同時仍舊不失一寸一分的耕種的面積。

在舊的耕熟的土地上，中國犁不需要把土地顛倒翻動，祇要將它翻在一邊，然而遇到土地堅硬結實的，那這種犁便不中用了。

這就是爲什麼中國人在墾殖新地時，同樣的要去創造真正的埃及式的農具。：

……中國農業生活上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便是創造農具，例如『犁』——可以稱之爲犁——等等。

……現在墾植新的土地時，普通還是用此種犁，祇是比較巨大和比較堅固而已。駕這個犁的至少需六匹馬。在墾植的時候，它將土地分爲散塊，彼此堆疊起來

（註：見東省雜誌一九二五年第〇〇期，孔四丁德諾夫的『中國的犁的考察』一文）。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在比較廣闊的空隙的土地如東三省，中國的農民還是用本部的小農的耕種方法。我們更可以看到，耕種荒地時還是用舊式的中國犁，這種犁完全不適用於荒地的墾殖；此外，在東三省所灌施的肥料，也是與『一定區域內的

人口成正比例』，可是日本的稻田，反而用東三省的豆餅以作肥料。耕作的牲畜，也祇有最低限度的數量，并且每年要把蒙古附近的馬匹，輸出達幾萬匹以上。雖然這些馬匹，利于騎不利於耕作，然而至少對於農業上是有用處的。我們更看到東三省農業上的一切，都是依靠人力，換耕方法也是很正確的實行，然而如果講到投資（耕畜和肥料）呢，那立刻就覺得很大的困難了。

牙什諾夫曾把蘇聯的遠東區域和北滿州的農業資本的構成，製成下列的比較：

	資 本 的 構 成			
	屋 宇	牲 畜	農 具	家 具
蘇聯的遠東區域………	25.4%	27.7%	13.3%	33.2%
北 滿 州………	35.0%	21.7%	14.0%	29.3%

『註：』牙什諾夫曾在北滿州調查過七十個農民經濟，并將他自己所得的

的統計，與米希根關於『蘇聯遠東區的農民的收支預算的調查』相比較。米希根曾在貝加爾河流域調查了八十五個農民經濟，在阿姆河流域調查了四十九個，在近海省調查了六十七個農民經濟。牙什諾夫所調查的大部分都是中，上等級的農民經濟。

這種含糊的比較表，很少有所作用，它反而把農民經濟中按着社會成分的分配掩蔽了。并且牙什諾夫所得到的結果，非常不正確，因為他忘掉了一件重要的事實，就是俄國的移民，可以完全不支付地價，或者支付很少，然而中國的農民爲着土地必須支付高利貸的價格。如果我們看一看土地的價格，那就得到下列一表：—

農民經濟	資本的構成				
	土地的價格	住宅	牲畜和家禽	無生命的農具	家具
蘇聯遠東區的二百零一個農民經濟……	——	25.4%	27.7%	13.7%	33.2%
北滿七十個中國農民經濟……	69.8%	11.6%	6.4%	3.9%	8.6%

從這張表中，可以看出中國的移民，曾化費百分之七十的資本，用在購買土地，而俄國的移民可以一錢不化的得到土地。就因了這種原因，所以在俄國的經濟中，每一俄畝的耕田，牲畜的價值，佔了47.61盧布，而在中國祇等於25.20盧布。在俄國經濟中，每一俄畝的耕田，無生命的農具的價值佔23.37盧布，而在中國的——12.50盧布。在俄國經濟中，家具佔37.06盧布，中國的——34.50盧布。這裏應當注意的，就是這些統計的時代，正當着蘇聯的遠東區的農民經濟還沒有脫離革命後的破壞，然而中國的農民經濟却已遇到戰後興旺的狀態。

馬克斯在資本論說：『與自由的土地財產相接連的小農經濟，其特殊的壞處就在於耕種者要化費資本來購買土地』。

『在這樣情形下，土地的價格，造成了個別的非生產的生產費上主要的成分，或是單個的生產者所生產的物品的生產費』。

『……這主要的成分並不把農業上作為固定的或是流轉的資本的成分包含在

內，反而祇是給購買者以每年獲得地租的權利，但是完全不去顧到這地租的生產；因爲投在購買土地的資本，對於農業上講來，實際上已停止了其存在了（註：見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冊，第324——340頁）。

中國的農民在滿州不得不化其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費用去購買土地。就在這一點上便蘊藏着滿州農業生產上的停滯性質的根本原因，自然不用講滿州經濟上其他的花樣——高利貸，賦稅，貨幣低價，對外貿易的，被日本壟斷，商人的詐取，土匪盜賊，高度的稅則以及人民的無權的狀態。所以農民弄得毫無餘資以投入各項的主要的生產範圍。這裏我們還要講到移民的成份。這般移民或是完全破產的貧農，或是直隸山東破產的農民，將土地出賣，然後移到東三省來的。東三省的土地，至少比直隸山東的土地便宜，所以在東三省可以購得比較山東多的土地。然而他們因了缺乏生產工具，所以不能適當地耕種。並且隨了人口的增加，新的移民浪潮的緊迫，東三省的被吸入世界商品流轉的漩渦，城市與鐵道的發展——使地價也日漸

上升了。在十一年中間，北滿的地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南滿的，增加百分之一百以至一百五十（註：中國農業經濟第22頁。）

現在來問一問，誰來分配這土地的積蓄（註：見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 第十卷第88號上載有吉林的督辦的廣告，土地出賣，最低限度爲150畝）？移殖是如何組成的？關於這二個問題牙什諾夫曾有下列的答覆：—

『國家按着低賤的價格，把那些預備墾殖的荒地出售。這大部的土地，都由官僚（甚至極高等的）商人買去，他們並不想自己成爲務農者，祇是乘賤價的時候把巨量的土地收買下來，或是待高價而轉售，或轉租旁人以取巨利。

很少部分的土地，是由移民來直接購買』。

牙什諾夫所講的，感覺到太有禮貌了。他所指的『國家』，就是張作霖，吳俊升等等的將軍。他們以賤價把土地出賣了，這買價就從這一個錢囊流轉到別一個錢囊。他們就是代表『墾荒委員會』，攫取了荒地。每個東三省的督軍，都擁有幾十萬

的田畝。這些土地更大批的轉賣給高利貸，銀行家，官僚，他們再轉賣給商人，富農和移民，或是轉租旁人。這般督軍們往往在預備築鐵路的地方收買土地，以求高價而沽。另一方面，投機商人勾通了日本的資本家，把鐵路築在他們佔有土地的區域。因了順利的地理位置所造出來的級差地租——表現在高度的地租，或是地面價格的提高——完全流到這般土地佔有者和投機商人的袋子裏。所以在土地沒有落到直接生產者——或是小的私有土地的農民，或是佃農——以前，總要經過五個六個至十個投機者的手呢。

移民的浪潮，異常迅速從奉天波及到阿姆爾河，然而督軍，將領，官僚，商人以花花樣樣的土地投機者總是先移民而將空地捲取無遺了。

『私有者擴張他的土地佔有，佃農變成爲私有者，積壘了住宅和農具的資本。然而這是不能常久的，人口自然的增加，移民陸續的加添，就使佃價和地價很快的高漲』。

將來的過程，一定是如此：

『地價以及一部分佃價的提高，主要的乃由於移民的要求的增高，并且地價和佃價的提高，超過了經濟的收入的增長，這經濟的收入就以強度的大小來決定。因了人口的增加和市場的關係的發展，使經濟的收入也增高了，然而還不如地價增高之速。反之，農業以外的職業（工業，商業）的一般市面和收入，在資本不足的條件下，發展得比較顯著。結果使專爲着利潤而活動的資本，開始從農業中流出來』（註：見 Jamison 著 Land Tenure etc. 第 82 頁）。

這一幅圖畫大足以表示出滿州農村中社會的經濟的發展的過程。

我們把一八八〇年代魯斯所調查的結果與現代的統計比較一下，那就可以看到資本從農村中流出的情形。

遠在一八八〇年前，已看到資本從農村中流到城市，流入工業，商業，主要的流入于高利貸。『練糖廠的主人和當舖的主人，比較地主更受到人家的尊敬，因爲

經營這些事業所需要的資本，普通遠多過于投在農業中的資本（註：見牙什諾夫著中國農業經濟第53—56頁）。

當時的當舖主人能這樣的『受人尊重』，看看現在呢：

『東三省到處可以看到當舖……當舖是唯一的接近農民，小商人與一般的社會下層的經濟組織。大的當舖，往往與銀行相連貫，開設的人往往就是任重大官職的人仕。在奉天，牛莊，安東，開設很多的大當舖，這些當舖都是隸于東三省銀行。吉林的省立銀行（屬于吉林的督辦）同樣的有分設的當舖。牛莊的當舖，大都是受大官的財政上的接濟。這些當舖的利率，大約按月2.8%（對於商業的借款）。小的當舖的利率更高，平常按月為4%——8%，并且借款的期限，很少有超過四個月者（註：見Economic History of Manchuria第267頁）

資本就是這樣地從農業中流出來。然而還有些資本仍舊留在農村中。

牙什諾夫說：『在當地的農村中，還有一種好似我們俄國的富農一樣的重利盤

剝，其數量亦不見很大」（註：見牙什諾夫著中國農村經濟第25頁）。

牙什諾夫更指出：『在東三省的農村中，除了富農外，還有二種階層；一是那些佔有土地者，他把自己的農村工業（狹義的）的資本，散布於邊境區域，并把這些工業與農產品製造的生產（如東三省的榨油，麵坊……）或是與商業相聯繫起來。

第二個階層，便是軍民政治上要人或是他們的親族，握着巨量的土地，他們可算是中國農村內資本主義分子中比較堅強的部分』。

牙什諾夫還安慰我們說：『上面所講的那些分子，其數量並不巨大，主要的——在他們中間，並不存在着往前發展的前提』。這位勇敢的牙什諾夫竟起來替中國的高利貸資本，強掠的官吏，和一切掠奪者辯護，毫無疑義的他還想到，或許數量上尚有更多的圈取地盤的地主，軍官，官吏，重利盤剝者（註：牙什諾夫在他的中國農村經濟一書的第25頁上，用東三省的例子來作證，認為在分析土地問題

的結果，正確的却是民粹派而不是馬克斯主義者，正確的屬於勃林斯敦，馬斯洛夫，素哈諾夫而不是馬克斯，考茨基和列寧。在這辯論中間，可以看出，牙什諾夫祇讀了『論馬克斯』而沒有真正讀了馬克斯。結果就使他跳到擁護高利貸資本。

實際上決不是如此，這些地主官吏……：數量上常是佔少數，然而却具有他們的作用的增長的前提。

遠在一八八〇年前魯斯曾說過：『大部分的經濟是屬於土地佔有者自己』（註：見查米斯著 *Land Tenure etc* 第30頁）。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牙什諾夫自己關於黑龍江與吉林的調查的結果：—

	祇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種的	耕種自己的并佃租的	祇租佃的	總計
黑龍江的二十個縣份 (1918年)	185,0	58,2	85,5	328,7
吉林省的二十縣 (1920年)	160,3	35,3	36,9	302,5

總計	345,3	113,5	172,4	631,2
以百分數計算	35	18	27	100

牙什諾夫對上表更有這樣的補充，他認為佃農經濟的數量，很明顯地不是絕對的便是相對的被我們減縮了。近年來盜匪的恐怖，使佃農的數量很大的增加，在有些縣份中，佃農加上了寡有的土地私有者，其總數竟超過全部農村經濟的半數。

講到黑龍江與吉林的農民分化上，牙什諾夫亦有一統計：

經濟的數量	與總數的百分比	土地佔有的界限 (以口响為單位)	土地佔有的平均數 (以响為單位)	農業經濟的面積的總數 (以百萬响為單位)	與總數百分比
5,000	0,7	150以上	200	1,0	8,7
20,000	2,9	75—100	100	2,0	17,3
75,000	10,7	30—75	40	3,0	26,0
300,000	24,8	10—30	15	4,5	39,0

250,000	35,7	1—10	4	1,0	8,7
50,000	7,2	1以上	0,5	0,03	0,3
700,000	100,0	—	16,5	11,53	100,0

這便是牙什諾夫的目光中的『社會平原』。按他們的統計，百分之四十二又九的農民。掌有農村經濟的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九；百分之三又六的農民，掌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土地。在吉林與黑龍江，一方面移殖的過程，以及農民分化的過程，另一方面私有主的農民的轉變為佃農的過程，其發展的程度尚不如奉天，在奉天，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是由佃農來耕作。在這樣情形下，還要說『單個的私有農民擴大其佔有的土地，單個的佃農進而為私有者』，那便是完全不懂得，農村中的分化過程就是這樣進行的。單個的暴富者雖得到了成功，然而大部分還是貧窮。在移殖的過程中，不免有單個的幸福的農民能一躍而為富農與高利貸者。正如馬克斯所講

的說：『在資本主義發展幼稚的時代，同樣的在中世紀的城市生活幼稚的時代，從農奴主的羈軛下逃出來的人們中，誰能成爲主人，誰能成爲役僕，往往以誰先離開了封建主來決定的』（註：見資本論第一卷第24頁）。

同樣的，在移民中間，誰能成爲主人——富農，誰成爲奴僕——僱農，誰成爲佃農，普通就以誰先離開直隸山東等省而先往東三省來決定。

在一八八〇年，當時人口已經比較稠密的奉天省，每畝地價等於250元，而當時的吉林，土地簡直不值錢的。現在的奉天，每畝的地價爲300—400元，吉林與黑龍江則爲45—80元。一八八〇年代的時候，魯斯曾告訴我們，奉天土地的租金，佔收成的三分之一，或是五分之二，或是七分之三，而現在牙什諾夫告訴我們，那裏的租金，已佔着收成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一八八〇年時，據魯斯的計算，奉天每畝租金，以貨幣計算則爲1.50元，而現在呢，牙什諾夫告訴我們，在吉林與黑龍江，每畝租金爲8.4—9.5元。牙什諾夫認爲自一九一一年以至

一九二二年中間，租金已增加20——25%。隨着移殖的加強，於是對土地的要求也增高，結果租金與地價因之亦上漲。

在一八八〇年時已很正確的指出來，土地愈是肥沃，經濟的範圍亦愈小，然而當時南滿州，最少的經濟，還是有三畝的土地，現在每人的耕地面積，列表如下：
 ——（以畝為單位）

省 名	按關東州的省政府的統計	按南滿鐵道的統計
奉 天……………	0,75	0,938
吉 林……………	1,42	1,347
黑 龍 江……………	2,46	1,503

事實上這些數字，一定還有很大的減少。尤甚因了東三省地主的嚴酷的剝削，土地買賣的投機，強圈空餘的土地，高利貸和商人的欺詐，再加上帝國主義在糧食

和豆的市場上的壟斷。(註：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時，日本人壟斷了東三省豆的市場。張作霖會想由東省銀行採辦豆以奪取日本的壟斷權。爲了這問題引起了日本與張作霖之間嚴重的衝突)。

在內蒙古(綏遠，熱河，察哈爾)移殖過程的發展上更帶着病態。往這些區域移殖的開始亦比較他處爲遲，直到現在其進行亦比他處爲慢。然而京綏路的建成，確與此以極有力的動機。(註：在一九〇八年此路祇築至張家口，迄一九一四年更延長到大同，一九二一年延長至綏遠，以至一九二三年則直抵包頭)。在這些區域內，有兩種經濟和社會的系統發生劇鬥。

這些區域內的基本人種爲蒙古人，他們是呻吟在蒙古王侯與統一的佛教教堂的兩重壓迫之下；同時這雙重的壓迫就以封建氏族制度的關係的薄膜來蒙蔽着。這殘酷的雙重壓迫是由中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來統率，而它自己本身則由外國的商業資本來統率。傳統的賦稅，以供養親王的門庭，是非常繁重；爲供養親王的軍隊，這

些軍隊是用來保護牧場以抵禦外族的侵犯，所抽的賦稅，雖不見十分繁苛，然終是在蒙古遊牧人的背上。然而中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就依靠這般蒙古的王公貴族以進行對蒙古族以剝削。這般腐敗的貴族把自己的收入浪費浪用於北京，張家口以及其他的中國都市中，并與中國商人高利貸，官吏締結借款，而其利息則由他們隸屬的旗——就是縣交付、蒙古的執政者劃分其區域，以交付利息。資本是不需要交付，祇要利息，然而利息每年為百分之五以至百分之十。王公貴族們的債台日益高築，浪費民族的收入日漸加厲，民族因之就陷入於繁重的債款的苦海中。這樣一來，對貨幣的要求愈趨愈甚。以畜牧為生的遊牧民族，就被捲入到交換的漩渦中去了。蒙古人需要將更多的皮革，酪油，牲畜，羊毛，駱駝肉出賣，更需向外購買茶葉，氈料（以製蓬帳），烟草，皮和絲。市場的關係發展了，消費也增加了，剝削的限制，已經不以王侯與其門庭的『肚子的寬緊』為標準，而以儘量銷售其『商品』的可能為標準。族長的氏族制度，變成爲罩蓋剝削的工具。族長式的生產品的剝削，又加上了

商業的剝削與交換上的欺詐。整個的商業與整個的交換都操在中國人手裏。貨幣的權力增強了，蒙古的畜牧者都落入于商人高利貸者手中，正好比蒙古的王公貴族，都落入於官僚銀行家與商業高利貸者之手。

畜牧經濟中的家庭工業，已被商業所動搖。在中國人勢力所及的區域內，那些酪油，牛油的生产，馬鞍，皮革，氈的製造，已完全操於華人之手。在這些區域內，所用的氈已是工廠製造的商品了。蒙古經濟之衰疲已達到這樣的程度，甚至剪羊毛事業，雖有禁令，然終落于華人之手。蒙古的畜牧者，須將其百分之三十至六十的羊毛交給中國人，而所得的，祇是氈而已。那裏羊毛的貿易，是建築在一種直接交換的原則上。牲畜的買賣，是被詐騙出名的回教商人所壟斷。在市場上與直接生產者接近。因之就成爲不可能。所以自己的商品不能換得等量的價值。內蒙古便是重演歷史上商業高利貸資本盤踞的黑暗的慘劇。

市場，高利貸和天災（如時疫，與因了雪下凝冰而使牲畜遭到冬餓）使畜牧生活

中的時常搖動的自然經濟，變成爲商品的以及貨幣商品的經濟了。賦稅的壓迫更加强了此種過程。親王貴族們的奢侈浪用，就形成這樣的連環：如果旗民窮得再不能搜括的時候，中國的官僚，商人，高利貸便向親王們收買土地。蒙古的遊牧人因之被逐於窮鄉僻縣，好的牧場換之以壞的，這些被奪的牧場就成爲墾殖的積蓄地。舊有的旗荒蕪了，生長了另一種人口。與中國接壤的那些原有旗屬，已很少見三四十個蓬幕。反之，在荒僻的旗屬，過去祇有三四百，現在已有一千餘的蓬幕了。遊牧的制度被破壞了。新起的旗的親王，自然要抽稅，然而舊的親王同樣的不肯放棄自己的『權利』。

有時激起了民族起來反對親王，便召集氏族的會議。親王與他的家族就坐在五千六千以至一萬怒目而視的蒙古人中間，衆人都起來埋怨親王的浪用，責其不『義』。這種會議往往由寺院來召集。有時親王被殺。然而大部分都不致死，祇要親王認過，并宣佈改正，再不負債，保護氏族財產。於是來會者都紛紛退散。然後親

王密謀取締召集會議的首領，有時用錢收買，有時設法謀害。現在的蒙古新興的智識分子，企圖號召民衆會議。然而離散的遊牧人民，深印着幾十世紀的傳統的影響，薰染着喇嘛的迷毒，更浸潤着很野蠻的習慣，很難能接受他們的影響。

在綏遠的西部，此種運動日漸發展，日趨激厲。受了蒙古民主共和國的革命的影響，現在在蒙古已形成了國民革命黨了（註：他們曾企圖把蒙古的國民革命運動與國民黨聯合起來，其結果必陷于失敗）。

蒙古人從好的牧場被排擠到壞的牧場，而這些草地就變爲耕田。有些地方蒙古人自己也變成爲務農者。然而一般的講來，他們是過着喪失土地的過程。中國商人高利貸者捲取了蒙古的氏族土地。

蒙古人被排擠而土地落入於商人，高利貸，官吏與將軍之手後，他們便組織壟殖的機關。蒙古的土地往往是很低賤的由親王來出賣，蒙古的親王祇得到土地賣價的30%，而50%則交給壟殖的機關，其餘20%則由壟殖機關扣留下來，以作爲鑿井

之用。沒有井的土地是很難出售與出租。『鑿井也就是中國的一種特殊的職業』

(註·見斯米脫著 *A Village Life in China*)。

在近十年來中國移民之往內蒙古者，已漸見發展。無錢的移民，就成為佃農——『折付的佃農』。商人地主，高利貸地主和官僚地主們將土地租給這般無錢的佃戶，并供給以器具和種子，而佃戶必需將其收成的50——60%繳納於地主（註：這種租佃的形式，譯之名謂『折付的佃租』）。在這些區域內，此種租佃形式是常常遇到的，然而在中國本部各省內幾乎完全沒有，更正確地說，在中國本部這已成爲已經完全消滅的資本主義以前的形式（註：在東三省的有些地方，還有此種形式）有錢的移民（在本鄉時會變賣了自己的土地），他可以很低廉的購買比較大塊的土地。然而他不能都去耕作，因爲他的農具是限于小塊的經濟，并且他不能夠去得到灌施全部土地的肥料，所以他祇將其所有的土地的一部分拿來耕種，拚命的墾植，竭盡其膏腴，然後把這塊土地讓它荒着，而再耕其所有土地的另一塊。當着新的移民浪潮

又到來的時候，他就把自己多餘的土地出租，或是把大部分的土地出賣。這樣一來，移民中的一部分很少數的階層，就變成爲富農與土地投機者。後來就繼續的重演東三省所經過的過程：地價和佃價都增高，農民經濟愈變愈小，過渡到強度的肥料耕種的農業，增強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勢力，它們以前剝削和排擠蒙古人，現在便來壓迫中國的農民了。

在內蒙古現在也正重演着中國本部的土地關係。人口愈加增多，那麼其土地關係亦愈像中國本部的那種關係。在那裏社會的壓迫更加上一重民族的壓迫。那裏中國人和蒙古人的比例，等於5:1（註：這些區域的人口，大約在6,000,000——10,000,000人之間）。城市的人口，幾乎都是中國人。中國的軍閥和官吏，統治了這種族長的氏族制度，實際上這制度已絲毫沒有族長民族的氣味，而祇是中國的商业高利貸資本攫取了畜牧經濟的命脈而已。

除此以外，更加上了戰爭與軍閥的壓迫。戰爭就是賦稅，強掠，劫取，耕者與

牲畜的勞役，土匪，紙幣，軍用票，蹂躪農民的財產物件……然而在這這些區域內，還有其他的厄運。例如一九二六年的中間數月內，馮玉祥便是這些區域的督辦，他所統治下的墾植機關，便把土地售給投機的軍官，官吏，商人，再由他們轉售給移民，或出租給移民。後來奉軍驅逐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後，委派了奉軍自己的督辦，於是宣佈國民軍時代所締結的一切據約完作廢，而重新進行登記，於是一般購土地者必需重出一批買價。從這時候起，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完全墮入於高利貸者的掌握之中。這就是中國土地私有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例子。

這樣的制度，很容易使土地迅速地枯竭，使生產者的勞働力完全耗盡。地主，高利貸，軍閥，商業，帝國主義把生產者所有的一切都奪盡了，使生產者完全不能去改良生產。

中國的農民，甚至在東三省的，都無力去進行經濟上的再生產。在內蒙古也脫不了這一幅圖畫。

農民經濟的再生產，已處在縮小的範圍中。勞働力的再生產也祇能在縮小的範圍中進行，關於這一點，我們祇要看一看土匪的猖獗就夠了。在那些移殖的區域內，祇是無限制的剝削和束縛，生產者的困頓和愚昧，在那裏進行不斷的再生產的，祇有帝國主義和軍閥制度，在那裏進行擴張的再生產。

我們對於移殖區域的估量上，或可以更詳細的說明。然而很多的中國人——不但是中國人，認為中國本部是『沒有地主的』，『分配得很好』，『實際上以土地關係講來中國無所謂有土地問題的存在』，『中國所有的祇是人口過剩問題，祇要用移殖就可以解決的』。俄國自由黨人，立憲民主黨人的理論，現在也重現之于中國。在俄國，這般先生們認為，『並不是因了農奴制度下的大領地成爲剝削幾千百萬農奴的工具，成爲束縛和奴使他們的工具，成爲生產力發展上的障礙物，而是爲了現在不應當立刻把幾千百萬的農戶，漂泊到西比利或是土耳其斯坦，所以要消滅農奴制度下的大領地』，（註：見列寧的論文集第九卷第51頁）在中國，很多人認為不必去

驚動租佃關係，不必去驚動『小地主』，祇要把成千百萬的農戶，漂泊到東三省或是內蒙古。這般先生們祇是忘却了一點，中國的土地積蓄——就是空餘的土地，不需耗費特別的資本，而即可耕種的土地，其數量比較不大。雖然，按最近官廳的統計，在奉天尙有可以耕作土地13,695,000畝，吉林——32,161,000畝，黑龍江——88,844,000畝，其總數即等于134,693,000畝。在內蒙古三特別區內，按官廳的統計，尙有2,230,000立方里的可耕的土地，至少可以養活6,000,000人。空地現尙不少，在目前的技術水平線底下，不需化費特別的資本而可耕種的土地還是很多。土地的積蓄，絕對講來，還算很大。然而對於中國，對於人山人海的中國，對於土地飢荒的中國，雖不是滄海之一粟，然終不是普濟的救藥。中國的農村經濟上，技術能夠改善，創造巨大的灌溉工程，開濬河道，浩大的沼澤使排去其水……總言之化費需要的資本而不適于耕的土地變為可耕的土地，那麼中國的土地藏庫，不是有二倍便是三倍的增加哩。然而這方面的先決條件，便是要消

滅中國現有的土地的制度。『因爲單去推測那些數量的土地是可以變爲耕作的土地，這是毫無用處的。我們應當很澈底的去明瞭這個事實，它是整個俄國經濟史上所證明的事實，它是成爲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一個最大的特點：俄國是擁有很浩大的移殖的土地藏庫，這個藏庫，不但在農業技術每一步的進展上，而且在俄國農民從農奴制度的壓迫下每一步的進展上，都能成爲養活人口，養活植物的浩大的寶庫』（註：見同前書）

列寧所講的這些話，亦能適用於中國。如果不消除這些新的移殖區域內的亞細亞的舊制度，那麼一定會重演中國本部的土地關係。那裏現在也豎植了地主的壓迫，奴使，佃租的苦楚，無權的狀態，軍閥制度，饑荒，和幾千萬的農民的死亡。最後便有帝國主義出現于舞台。日本現在已正式的宣佈、『向東三省與內蒙古進行積極政策。日本從南滿所榨得的超度的利潤，現在已經減少了。日本與張作霖（註：張氏于一九二八年六月死）的共合統治東三省，現在已進到了財政與經濟恐慌

的門口了。小的和中等的日本企業，現在已受到損失了，并且正趨向着倒閉的道路，最大企業的超度的利潤，也已減低了。日本對滿的出口也見減色。日本帝國主義在國內已遭到嚴重的危機，所以要找求新的經濟活動區域。它不去管中國革命的叫喊，終是眼對着滿州和內蒙的特殊利益。

不但亞細亞的制度，而且還有帝國主義，都耽耽虎視來伺候中國的移民。這個連環，祇有革命才能把它打斷。

同時，我們必需指出，在這些移殖的區域內，首先就是在東三省，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實比中國任何一處都迅速。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盡量地榨取這些區域內所有積聚，雖然國內戰爭造成了農民的破產，雖然有土匪，賦稅，掠奪，劫取，雖然高利貸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好比中國其他各部一樣，然而在這些區域內，比中國任何那一處迅速，產生了資本主義式的農業經濟，展開了這些區域內資本主義發展的先途。



三版 政治概論 喬爾寧著 實價一角

二版 美國帝國主義外交 顧琪影著 實價二角半

二版 一九二八年的國際 喬平等譯 實價二角半

二版 經濟學概論 實價一角

資本主義的玄妙 山川均著 實價一角八分

帝國主義 定價七分

二版 列強與中國 喬平龔彬編 實價三角

二版 國際新局面 陳翰笙著 實價二角二分

二版 列強在華經濟的政治的 呂一鳴編 實價一角半

勢力及其外交政策 呂一鳴編 實價一角半

列強武力對華的開端 芮思玲著 實價七分

二版 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 章進編 實價六角五分

帝國主義的內幕和衝突 陳儒平編 實價三角半

二版 最近世界經濟與經濟政策 劉穆編 實價三角

中日經濟關係論 郭真編 實價三角

版權所有

一九三〇年五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七月出版

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性

每冊實價六角

譯者 宗華

出版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重慶天主堂街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開封新華北街

北新分局

#55

309044

309044